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共軍事現代化對印太軍備競賽之影響（2012-2021）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L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n

Indo-Pacific Arms Race (2012-2021)

郭諺儒

Yen-Ju Kuo

指導教授：陳世民博士

Adviser: Dr. Shih-Min Chen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中共軍事現代化對印太軍備競賽之影響(2012-2021)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L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n

Indo-Pacific Arms Race (2012-2021)

本論文係 郭諺儒 君 (學號：R06322042) 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  
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12 月 26 日承下列考試  
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世民

(簽名)

(指導教授)

李宗農 魏百谷

# 謝辭



2022 年是我論文進度最多的一年，也是許多重要人士離開的一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作為「印太戰略」的發起者之一，不幸因意外離世，但他推動台日關係友好、捍衛印太地區民主自由價值的理想，以及讓我有論文題目可以寫，會永遠留存在包含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自由國家人民心中，並最終擴及至尚未解放的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民眾。此外，去年也適逢祖母及外婆相繼過世，我也想將這份喜悅與在天上的祖母們分享，以感念他們對我照顧，才能造就今天的我。

因為邊工作邊念書的關係，導致我 2016 年就考上的碩士班，最終搞到 2023 年才能畢業，恰巧兌現我通過論文大綱時「把政研所當醫學系唸」的玩笑。由於剛好是沒人寫過的題目，所以論文比對相似性才只有 1%（因為是沒人寫過的題目根本沒人可以抄），也因此施工時間很漫長。這段期間，在台北市咖啡廳、GBA Baseball Advance 電腦遊戲及 Youtube 的爵士樂頻道中度過漫長的「菸酒生」時光，也歷經四任 ROA 內閣政府的不懈努力，才能有今天的碩士學位。

我想在此特別感謝家人、朋友對我的支持，激勵每個禮拜沒有周末、平日晚上休息時間，且一度很想放棄的我繼續堅持下去。尤其感謝我的未婚妻，體諒我每次約會都是在陪我讀書、寫論文中度過，接下來我就可以專心娶妳回家了！只是從今以後，台北市的咖啡廳要自求多福了！最後，感謝陳老師的指導，引導我如何在浩瀚的學海中找尋想探討的主題，我也因此受益良多。

# 摘要



冷戰結束後，印太國家伴隨經濟成長，相繼進行軍事現代化，引發多位學者自 1990 年代起開始質疑印太是否出現軍備競賽情形。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共軍快速現代化加劇印太各國間的不信任，加上中共在東海、南海、台海、印中邊境的強勢作為，引發印太國家競相以增強自身軍力方式回應，多國政府及官員亦表達對印太出現軍備競賽的擔憂。鑑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2012 至 2021 年期間日本、台灣、印度、澳大利亞、越南、菲律賓等 6 國對中共威脅認知變化，進而分析上述 6 國是否在國防預算、武器數量及質量等方面，存在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現象，並釐清印太區域安全機制及倡議在阻止印太出現軍備競賽所扮演之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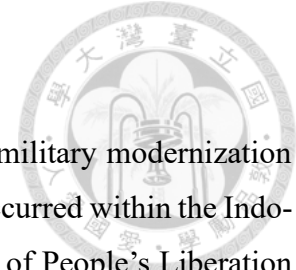
本研究結果顯示，共軍自 2012 年起出現具對外攻擊傾向的全方位異常快速增長，更加著重對外投射能力，而印太 6 國亦於 2012 至 2021 年間一致負面看待共軍現代化，部分國家甚至將中共視為長期威脅，台灣、澳大利亞則明顯自 2016 年起因與中共關係惡化而陷入敵意螺旋。對此，日本海軍每年都有明顯軍備競賽情形，2019 年後則擴大成三軍都存在異常快速增長跡象。台灣自 2017 年起大量採購攻擊性武器，並加速推動國造機艦計畫。印度海軍及陸軍除 2018 年外，每年都至少有一項裝備出現快速增長情形。澳大利亞自 2016 年起每年至少有兩個軍種出現快速增長跡象，與 2016 年前判若兩國。越南除 2015 年外，每年國防預算都有超過 4% 的快速成長現象，且海軍 2014 至 2020 年間每年都有快速增長情形。菲律賓則於 2017 年後出現海空軍飛彈化的快速增長現象。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 2020 年爆發後，大部分國家經濟發展都受到重大負面影響，卻未影響各國軍備發展意願，在特定領域武器裝備甚至出現更快增長現象。印太 6 國自 2012 年以來也都跳脫以往僅與特定國家建立軍事合作關係的架構，並積極強化與其他印太國家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以增強抵禦共軍威脅的能力。印太安全機制亦因大國博弈、各國國家利益及能力差異、共識決文化等因素，而無力阻止印太軍備競賽的發生。

值得一提的是，俄烏戰爭爆發加劇印太國家對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的擔憂，未來需有納入更多國家及武器裝備的相關研究，以利更精確研判印太軍備競賽的實際情況。

關鍵字：軍備競賽、印太地區、共軍現代化、中國威脅論、區域安全機制

#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o-Pacific countries started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cess, which initiated the debate on whether or not an arms race has occurred with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fter Xi Jin-Ping took power in 2012, the rapid growth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military strength, along with Chinese aggressive measures toward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has led to military modernization response from the Indo-Pacific countries.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among Japan, Taiwan, India, Australia,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from 2012 to 2021,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n ongoing arms race with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This study shows that PL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has an all-sphere, offensive, oversea projecting characteristic, and all six nations negatively perceived PL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some even considered it as a long-term threat. In order to counter the PLA threat, arms race trend was discovered from the Japanese navy every year from 2012 to 2021, expanding to the air force and army after 2019. Taiwan has started procurement of offensive weapons and indigenous weapon systems since 2017. Apart from 2018, the Indian navy and army has seen at least one weapon system with arms race tren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ustralia has at least two services caught up in an arms race since 2016. Vietnam defense budget grew over 4% every year, apart from 2015. The Philippines gained missile-firing capabilities since 2017.

Moreover, although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aused negative impact on most Indo-Pacific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it did not slow down the pace of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mong the six nations. Apart from military response, all six nations developed new security ties with other Indo-Pacific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However, the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failed to fulfill its function due to great-power rivalry, lack of common interest among the Indo-Pacific nations, and the culture of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

Looking beyon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raised doubts among the Indo-Pacific countries on whether or not China would change the status-quo by force. Therefore, there should be more related research with more countries and more weapon systems included,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actual scale of the Indo-Pacific arms race.

**Keywords:** Arms Race, Indo-Pacific Region,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ina Threat,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	I
謝辭 .....	II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架構與方法 .....	12
第四節 研究定義、範圍與限制 .....	18
第二章 共軍現代化及印太國家威脅認知 .....	20
第一節 共軍現代化之發展 .....	20
第二節 習近平上任後對外政策及作為的日趨強硬 .....	38
第三節 印太國家對中共之威脅認知 .....	48
第三章 印太軍備競賽現象及過程分析 .....	63
第一節 印太各國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63
第二節 國內經濟之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 .....	91
第三節 軍備競賽過程之分析 .....	106
第四章 遏止印太軍備競賽之努力及侷限 .....	113
第一節 印太重要安全機制及倡議 .....	113
第二節 印太安全機制及倡議之成效評估 .....	128
第三節 相關安全機制及倡議之侷限 .....	142
第五章 結論 .....	149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發現 .....	149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	153
參考文獻 .....	155

# 圖表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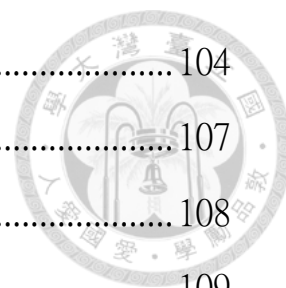
圖 1	本文研究架構圖.....	16
表 1-1	依變項說明.....	15
表 1-2	自變項說明.....	16
表 2-1	中共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21
表 2-2	中共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24
表 2-3	中共海軍軍備競賽情形.....	25
表 2-4	中共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28
表 2-5	中共空軍軍備競賽情形.....	29
表 2-6	中共火箭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31
表 2-7	中共火箭軍軍備競賽情形.....	32
表 2-8	中共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34
表 2-9	中共陸軍軍備競賽情形.....	35
表 2-10	中共軍備競賽指數.....	37
表 2-11	中共國防報告中的外擴內容.....	42
表 2-12	中共軍事行動中的外擴趨勢.....	47
表 2-13	印太6國對中共威脅意識一覽表.....	62
表 3-1	日本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64
表 3-2	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65
表 3-3	日本航空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66
表 3-4	日本陸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67
表 3-5	台灣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69
表 3-6	台灣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70

表 3-7	台灣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71
表 3-8	台灣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72
表 3-9	印度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73
表 3-10	印度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75
表 3-11	印度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76
表 3-12	印度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78
表 3-13	澳大利亞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	79
表 3-14	澳大利亞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0
表 3-15	澳大利亞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1
表 3-16	澳大利亞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2
表 3-17	越南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83
表 3-18	越南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4
表 3-19	越南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5
表 3-20	越南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6
表 3-21	菲律賓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87
表 3-22	菲律賓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8
表 3-23	菲律賓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89
表 3-24	菲律賓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	90
表 3-25	日本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	92
表 3-26	台灣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	94
表 3-27	2012年以來美國宣布對台軍售項目列表 .....	95
表 3-28	印度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	97
表 3-29	澳大利亞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99
表 3-30	越南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	102





表 3-3-1	菲律賓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	104
表 3-3-2	日本軍備競賽指數 .....	107
表 3-3-3	台灣軍備競賽指數 .....	108
表 3-3-4	印度軍備競賽指數 .....	109
表 3-3-5	澳大利亞軍備競賽指數 .....	110
表 3-3-6	越南軍備競賽指數 .....	111
表 3-3-7	菲律賓軍備競賽指數 .....	112
表 4-1	印太重要安全機制及倡議之發展及成效評估 .....	141
表 5-1	印太軍備競賽指數 .....	152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

### 壹、研究動機

冷戰結束後，美蘇自印太撤軍留下權力真空，印太國家則伴隨經濟成長，相繼進行軍力現代化，引發多位學者自 1990 年起開始質疑印太是否出現軍備競賽情形。21 世紀後，中共軍力快速發展加劇印太各國間的不信任，尤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逐年惡化，包括日本 2012 年國有化釣魚台、中共 2013 年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國際海牙法院 2016 年發布南海仲裁案判決結果、印中邊界衝突 2020 年爆發，導致亞洲及大洋洲國家軍費支出在 2012 年開始超越歐洲 (IISS, 2013: 33)，並在 2010 至 2021 年間成長 48%，成為該時期全球軍費成長率最高的區域 (SIPRI, 2022c: 3-5)。

與此同時，區域內的主要平衡者—美國也從歐巴馬前總統的「亞太再平衡」轉移至川普前總統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積極在印太地區部署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並於 2019 年退出中程彈道飛彈條約，加上印太各國之間原有的歷史仇恨、領土爭議等不穩定因素，引發多國政府及官員表達對印太國家競相增加軍備支出的擔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中共 2012 年單邊劃設防空識別區之後，表示當前「中日關係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和德國」，擔憂中共恐造成兩國關係緊張 (Takenaka, 2014)；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亦於 2014 年指當前中日關係緊張加劇，猶如「19 世紀列強爭霸的歐洲」(Bloomberg, 2014)。此外，德國外交部 2020 年 9 月發布的「印太政策準則」中也首度提及「關切印太地區軍備競賽及潛在軍事衝突」(尚國強, 2020)；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 (Richard Marles) 2022 年 6 月更指共軍「二戰以來最大增幅」的軍費增

長恐造成印太區域「擴軍競爭」(楊明珠, 2022a), 顯示共軍軍力崛起下的印太軍備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問題, 並對印太區域和平穩定構成威脅, 甚至可能導致戰爭, 成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 貳、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有三：

- 一、梳理 2012 至 2021 年的中共軍力快速現代化情形及對外政策之轉變, 並嘗試釐清其對印太各國對中共威脅認知的影響。
- 二、藉由分析印太各國投入軍備的發展過程及其與中共威脅認知之關係, 評估當前印太軍備發展是否係因中共而出現全面或特定領域軍備競賽情形, 以及各國國內經濟與外部結盟因素對其軍備發展扮演何種角色。
- 三、解釋為何印太各國在意識到區域已有軍備競賽風險, 且已嘗試各種努力後仍然效果不彰的原因。

## 參、研究問題

面對共軍戰力的迅速提升, 以及日益強勢的對外政策, 相繼造成印太各國增加軍費, 是否導致印太區域出現軍備競賽已在學界掀起許多辯論。因此, 本研究將藉由回答下列問題, 探討當前共軍軍力快速現代化之下的印太軍備發展情形及顯示意涵。

第二章將檢視中共軍力及對外政策的變化, 並分析印太各國如何看待。其中應對的問題包括 2012 至 2021 年中共軍力快速現代化情形為何? 中共對外政策同時產生何種轉變? 印太各國如何看待共軍軍力崛起? 是否出現對中共威脅認知明顯上升之情形?

第三章將承繼前一章所分析的印太各國對中共威脅認知情形, 經由觀察 2012 至 2021 年的各國軍力增長, 分析共軍軍力成長對各國軍備發展的影響。其中應

對的問題包括印太軍備成長情況為何？是否有異常增速情形？是否構成全面或特定領域的軍備競賽現象？軍備增長異常國家是否同時出現對中共的明確威脅認知？印太地區在何時曾出現軍備競賽情形？各國國內經濟與外部結盟因素對其軍備發展扮演何種角色？

第四章則將探討何以印太軍備競賽難以化解與抑制，並羅列當前可能的解決方案，分析其發展歷程，評估其成效。從中應對的問題包括當前印太各國官學界曾嘗試何種努力抑制當前的軍備競賽？印太區域安全機制發展情形為何？印太軍備競賽為何仍難以化解？未來有哪些選項可以解決當前印太安全困境？

針對結論的部分，本文將綜合共軍軍力現代化及印太軍備發展情形，點出導致當前印太軍備競賽的主要原因，並嘗試對化解印太安全困境提出建言。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壹、軍備競賽概念之相關研究

#### 一、軍備競賽現象之相關理論與解釋

軍備競賽的研究源自於 20 世紀初期英國數學家理查森 (Lewis Richardson) 的軍備競賽模型，主要以數學模型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列強軍備成長與後來發生戰爭的關聯，並將軍備競賽定義為「兩個或以上行為者之間，基於不信任或既有矛盾，不斷增加自身軍事力量，以防範對方可能發動戰爭的過程」，其中包含「一方增加軍備導致另一方軍備增加速度更快」、「彼此敵視且每一方都存在增加軍備的固有潛力」、「任一方軍備實力越強對自身軍備增長的約束力越大」等 3 個條件 (Richardson, 1960: 14-16)。

其後，多位學者分別在他的基礎上，研究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及其對爆發戰爭的影響，並提出自己對軍備競賽的定義。其中，以 3 位英國學者的討論最具代表性。首先，Hedley Bull 針對各國軍備競賽目的進行更加詳細的定義，除了繼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者之間」的定義之外，加上「非常緊湊的軍備武器競爭，各自想在質與量取得軍事優勢」的內容 (Bull, 1965: 5)；然而，他卻沒有定義什麼是「非常緊湊」。與此對照，美國學者 Samuel Huntington 的理論則奠基於「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恐懼，造成兩個或以上的行為者在和平時期大幅增加軍備，並形成競爭關係」，但其也提出「在和平時期大幅增加軍備有 90% 的目的是為了追上或超越對象國的軍力」(Huntington, 1958: 57-64)，補上國家可以為了追上特定國家的軍事發展水準而發展軍備的定義。

其次，針對軍備競賽參與國的部分，另一位英國學者 Colin Gray 則提出 4 項原則，並對軍備競賽行為者進行更詳細的定義，包含「對彼此有敵意的多個行為者」、「各自在其他行為者軍備擴充基礎上發展軍備」、「彼此在質與量上進行競爭」、

「各自軍力在質與量上均有大幅增長」(Gray, 1972: 39-41)，但指出可以是多邊競爭關係，不一定是傳統的雙邊，且敵意可能出現在同盟陣營中，而非僅限於敵對陣營(Gray, 1972: 48)，此推翻了原本僅限於雙邊及敵對陣營之間的傳統定義。

另外，針對軍備快速成長的定義，部分學者認為應以國防軍費與經濟成長的相對關係來辨別是否是經濟成長導致軍事現代化，其中布贊(Barry Buzan)，Geoffrey Till, Jae-Jung Suh 及 Andrew Tan 認為國防軍事花費中的 GDP 占比若有明顯成長就構成軍備快速成長的定義，因為這代表各國願犧牲其他機會成本投入軍備支出，較強調國防安全的重要性(Buzan, 1998: 31; Suh, 2009: 102; Till, 2012: 48-49; Tan, 2014: 52-53)，相關中文文獻也多引用上述看法(劉俊彬，2011：21-48；鍾盛康，2003：17-18)；少數學者則對「明顯成長」進行更明確的定義，如 Michael Wallace 認為軍費支出成長率大於 4% 才構成明顯成長(Wallace, 1979: 5-6)、Paul Diehl 則指出國防軍費「三年內超過 8%」才算是不正常的軍備成長(Diehl, 1983: 207-210)；然而，Desmond Ball 卻認為軍費支出的 GDP 占比具誤導性，因為實際軍備競賽情形可能會因國家經濟大幅成長而被忽略，並指出亞洲國家軍備支出在 1980 年代的 GDP 占比反而比 1990 年代高，但 1990 年代卻是亞洲國家軍備快速成長的開始(Ball, 2010: 31-32)，凸顯學者之間對於快速成長的定義仍使用不同標準，亦反映學者間對是否存在軍備競賽有不同結論的原因之一。

最後，學界對於軍備競賽與戰爭的關聯也有眾多辯論。理察森認為「軍備競賽即發動戰爭前奏」，Michael Wallace 也指出「82%軍備競賽導致戰爭」，且超過十年、快速、雙邊共同增長的例子與戰爭發生機率具有重大關聯性(Wallace, 1979: 13-15)。Toby Rider 等人則藉由研究 1816 年到 2000 年間的軍備競賽與戰爭的關係，發現軍備競賽容易導致軍方影響力上升，增加先發制人的誘因及降低對敵人的信任度，且在既有對立及長期軍備競賽情況下更容易導致戰爭(Rider, Findley & Diehl, 2011: 86-97)。然而 Paul Diehl 卻質疑 Michael Wallace 有重複計算之嫌，指出部分案例甚至無法找出共同軍力成長情形(Diehl, 1983: 206-210)。對此，

Samuel Huntington 將軍備競賽區分為質與量上的競爭，並發現數量上的競爭因較易被其他國家察覺，而更容易導致戰爭；質量上競爭因較難衡量故不易導致戰爭。然而，其卻認為軍備競賽的時間越長反而越容易形成權力平衡，且較不容易形成戰爭（Huntington, 1958: 71-79），此推論與其他學者看法不同。Colin Gray 對此則不置可否，認為軍備競賽可同時促進或取代戰爭，視情況而定（Gray, 1972: 41）。

## 二、軍備競賽成因的相關討論

針對軍備競賽發生的成因，在第三位布贊的「行動－反應」模型基礎上，美國學者傑維斯（Robert Jervis）也對國家基於外部威脅認知而發展軍備的不同型態進行更詳細的分類，除了一國針對他國軍備增長而提升軍備，進而造成雙方都競相增加軍備，形成惡性循環的「螺旋模型」之外，亦提出「國家藉由加強軍備嚇阻他國，以防範戰爭」的「嚇阻模型」。前者是指國家以發展軍備方式回應他國軍備成長卻反而會惡化情勢，後者則是指國家以發展軍備方式回應他國軍備增長可以展現防守決心，嚇阻侵略者（Jervis, 1976: 58-77）。以上兩者動機雖然都出自於「行動－反應」的邏輯，卻分別因競爭、自我防衛的不同出發點而發展軍備。

然而，布贊除了「行動－反應」模型外，也另外提出「國內結構」及「科技發展」兩種模型。其中，「國內結構」為國家基於內部因素而發展軍備，如經濟成長所帶動國防現代化、國防自主政策、軍方部門及軍工複合體既得利益、國家尊嚴、貪腐、內亂等（Buzan, 1998: 203-218）；「科技發展」則是國家為提升自身科技實力而帶動國內軍工產業成長，如軍民融合戰略（Buzan, 1987: 159），凸顯除外部威脅因素外，軍備發展也可以是來自國內科技發展、國家尊嚴等內部因素。

對此，Geoffrey Till 也呼應布贊的「國內結構」理論，指出一國發展軍備的過程需經過「確認國家戰略、制定政策、分配預算、實際執行」等過程（Till & Supriyanto, 2018: 2），且在特定開發中國家較容易反映決策者及國防部門的個人意志與既得利益，並非完全出自於理性決策作為，甚至時常會出現朝令夕改、貪汙、執行效率不彰等狀況（Till & Supriyanto, 2018: 7-13）。以上內容顯示各國發

展軍備無法完全以外部威脅為唯一因素來解釋，國內政治人物及軍方的部門利益亦為國家決定軍事化的重要成因，顛覆先前各國發展軍備都是外在驅動的假設。

### 三、如何制止軍備競賽之相關討論

除了針對軍備競賽現象及成因的討論之外，多位學者也針對如何制止軍備競賽進行討論，雖然多數都有提到歷史仇恨的既有因素，然而布贊認為除了歐洲之外，其他區域缺乏區域安全機制來促進政治溝通才是導致軍備競賽的主因，並可能因大國擔憂對區域的影響力、害怕與世界其他區域脫離，而暗中阻撓區域安全機制的建立（Buzan & Segal, 1994: 14-20）。此外，即便有區域安全機制，但許多僅為外交部長及民間二軌對話機制，論壇性質居多，且多停留在雙邊機制（潘振綱，2007：44-47），未見其發揮實際功能，凸顯缺乏區域安全機制是導致各國無法有效溝通，深化既有不信任感的主要因素。對此，大陸學者朱鋒除了指出基於全球包含多元文化及政體，故各自需要一個穩定的區域安全機制之外，亦提到必須有效控管大國在區域內的權力競逐，以及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如反恐及跨國犯罪，才能有效解決當前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Zhu, 2009: 29-42），顯示區域內大國影響力的競逐反而深化全球各地的安全困境，不利於區域和平穩定。

有鑑於此，針對解決方案的部分，Malcolm Davis 及 Christian Le Mière 都認為未來中國崛起或美中對抗加劇都可能造成軍備競賽情形越來越嚴重，故必須試圖解決大國博弈對各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方能緩解特定區域軍備過度增長情形（Davis, 2014: 17; Le Mière, 2014: 151-154），大陸學者朱鋒及美國學者 John Ikenberry 也提及美、中兩國須加強對話、增加軍費支出透明性，並採取行動有效控管兩國分歧（Zhu, 2009: 41-42; Ikenberry & Liff, 2014: 88-91），可見多數學者仍認為特定區域軍備競賽的動力源自美、中兩國，並強調美、中之間的危機控管、甚至和解才是全球和平的鑰匙。

然而，Desmond Ball 則在大國競逐之外，指出區域安全機制的建立及完善才能根本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安全困境，尤其呼籲東亞各國透由增加軍備支出透明性




及區域安全組織的軍備管控機制，才能有效解決該區域安全困境深化的問題（Ball, 1993: 105-111）；莫大華也指出區域安全機制必須促進多邊軍事合作，且納入區域內的主要軍事大國，才能緩解軍備競賽的情形（莫大華，1996：61-62），兩者較強調從體制層面著手，不同於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論點。

總結而言，上述學者基本認同軍備競賽的主體是兩個或以上的行為者，起因是基於認知到彼此的敵意與威脅，即各國之間互相刺激的外部因素所致。然而，各學者在軍備競賽的特徵及目的上有一定的歧見，在特徵方面，學者之間雖取得「各國在軍備武器上具有明顯的質與量成長」的共通點，但 Hedley Bull、Desmond Ball、Geoffrey Till 之間卻有緊湊、快速成長、明顯增長等不同的詮釋。此外，在軍備競賽之目的方面，Barry Buzan、Hedley Bull、Desmond Ball 主張是為了取得軍事優勢，而 Robert Jervis 及 Colin Gray 則認為是為了取得軍事平衡，但最終仍達成軍備競賽的目的是為了「抵禦對方軍事威脅」的共識。由此可見各學者對軍備競賽的定義僅具部分共識，亦可做為後續軍備競賽研究參考，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學界迄今仍沒有一致的定義。

## 貳、近期印太軍備競賽研究成果

先前大多軍備競賽論文多集中在西方國家間，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包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德軍備競賽、冷戰時期的美蘇核武競賽，關於印太軍備競賽的探討要直到 20 世紀末期才開始因中共軍事花費逐年增長而獲得學界關注，並以東北亞、東南亞、朝鮮半島為主要研究對象。1990 年代研究印太軍備競賽的學者大多認為印太軍力發展只是單純現代化，雖然有形成軍備競賽的潛力，但幾乎沒有人認為印太有軍備競賽現象。直到 21 世紀初期才開始有印太區域出現軍備競賽的聲浪，尤其到 2010 年代有更多學者指出印太地區有明顯軍備競賽情形，其中包含長期關注印太軍備發展，且在 1990 年代時認為沒有軍備競賽現象的學者。

### 一、構成軍備競賽之相關論點



首先，就是在 21 世紀之後重新檢視印太軍力增長情況，並得出與先前截然不同的 Desmond Ball，他曾在 1993 年指出雖然亞洲國家軍事預算佔比從 1984 年的 15.5% 提升至 1993 年的 34%，但大多是亞洲國家經濟成長所形成的補償性增長 (Ball, 1993: 94)，單純為軍事現代化，而非競賽。然而，在 2010 年的研究中卻發現由於印太國家在軍艦、巡弋飛彈、長程攻陸飛彈等軍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各國之間的軍力增長已具備互動及競爭性質，並超越傳統現代化的範疇，與 1990 年代時期不同」(Ball, 2010: 42-49)，顯示印太已有軍備競賽的徵候。同樣地，Andrew Tan 雖然在 2006 及 2011 年出版的專書中提到印太國家軍備發展有超出現代化的情形，但仍未構成全面軍備競賽 (Tan, 2006: 74-75; 2011: 177-178)；2014 年後卻指印太國家的軍備發展已「具備 Colin Gray 的三個條件，符合軍備競賽的定義」(Tan, 2015: 30-31)，尤其在神盾艦、匿蹤水面艦艇、無人機、潛艦、反潛作戰能力、飛彈等攻擊性武器方面，已出現「極大的全面軍備競賽風險」(Tan, 2014: 200-202)。Richard Bitzinger 亦曾在 2009 年撰文指出亞洲國家軍備發展只是單純的軍事現代化，有別於軍備競賽 (Bitzinger, 2009: 35)，卻在 2016 年改口承認印太軍備的多方及不對稱競賽已超越傳統現代化範疇 (Bitzinger, 2016: 36)。

此外，澳籍學者 Malcolm Davis 及韓籍學者 Jae-Jung Suh 也分別在 2014 年及 2017 年中的研究得到類似結論，指出印太各國在海軍、空軍高科技裝備及飛彈防禦系統方面出現令人擔憂的競賽性質 (Davis, 2014: 4-14; Suh, 2017: 6-7)。莫大華更是在 1996 年就指出東協國家基於「美國安全承諾不確定性、中共軍事現代化、東協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國內軍工複合體影響力提升」等因素，而出現「以經濟成長為動力、外購傳統武器為主、無明確敵人、無區域安全機制監督」的軍備競賽情形 (莫大華, 1996: 61-64)。上述六位學者中，有四位不約而同提到許多印太國家在特定武器上已出現「異常發展」情形，且都指出在海軍、空軍、飛彈等領域，共同提及「多邊」、「超越現代化」等概念，凸顯 2010 年之後的印太軍備競賽已有惡化趨勢，且值得進一步探討。



## 二、不構成軍備競賽之相關論點

雖說如此，也有部分研究認為印太不存在軍備競賽情況，其中包含許多長期觀察印太軍備發展的學者，如 John Ikenberry 直至 21 世紀仍認為亞洲軍備增長只是更新自身較為落伍的軍事裝備，尚與軍備競賽有所區別 (Ikenberry & Liff, 2014: 88); Geoffrey Till 更在 2012 及 2018 年的兩次研究中都承認印太各國在海軍領域有超過現代化的情形，且具備軍備競賽潛力，但因未構成全面競賽，故不算軍備競賽 (Till, 2012: 217-218; 2018: 26); 法國學者 Christian Le Mière 則認為亞洲軍備增長多以防衛性武器居多，指出中共的「區域拒止」(A2AD) 是純粹的防守戰略，不是為了控制或領土擴張，因而不構成安全困境 (Le Mière, 2014: 140)，反映部分學者雖然一方面承認印太各國軍備增長的事實，但認為仍與軍備競賽定義有所差距，不願將其與軍備競賽畫上等號。

此外，部分學者雖然也承認有軍備過度增長情形，卻指出與威脅認知無關的原因，如長期鑽研朝鮮半島軍備發展的韓籍學者 Jae-Jung Suh 在 2009 年曾點出南韓是為了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跟上美、日的軍事實力才發展軍備，並非出自威脅認知，不構成軍備競賽定義 (Suh, 2009: 125)。部分學者甚至點出個別印太國家曾出現軍事預算減少，未有明確、連貫的異常軍備增長情形，而不算是軍備競賽，如 Robert Hartfiel 及 Brian L. Job 直接點出台灣國防預算在部分年份不增反減、未見明顯增長趨勢，菲律賓及泰國的國防預算也沒有明顯增加 (Hartfiel & Job, 2007: 2-4); 陳亮智也指出日本軍費在 21 世紀後有幾個年度出現連續逆成長、中共軍費成長也連續 16 年呈現穩定增長情形，未有異常增長情況，且兩者增速不同 (陳亮智, 2017: 495-496)，不符合軍備競賽所要求的明顯增長定義。

## 三、過往文獻不足之處

本文認為在不構成軍備競賽的論點中有兩點值得提出反駁，首先針對與美國同盟關係的質疑，韓籍學者 Jae-Jung Suh 提到兩韓軍費支出差距早在 1990 年代就已迅速拉大 (Suh, 2009: 105)，故南韓主要是為了維持與美國關係才發展軍備，

但本文認為，南韓之所以與美國建立安全盟約就是出於認知到北韓軍事威脅，而試圖抵禦，與他國建立同盟本身並不會讓一個國家增加軍備，故與美國共同抵禦北韓軍事威脅才是南韓軍備發展的主因，屬於外部威脅驅動。

其次，針對防衛性武器的質疑，許多學者對此有所爭論，Johan Galtung 認為防衛性武器是射程及破壞力有限，且只能在自身領土使用的武器，攻擊性武器正好相反，故不應將防衛性武器納入 (Galtung, 1984: 127)，但傑維斯認為各國難以透過單純防衛得到安全，仍需藉由部分攻擊性武器來增加進攻方的成本及自身防衛優勢 (Jervis, 1978: 140)。本文認為，在有明確威脅認知前提下，國家大量增加防衛性武器目的也是為了抵禦威脅，故仍符合「有明確的威脅認知，且有抵禦威脅意圖」定義，屬於軍備競賽討論範疇，不應區分攻擊性或防衛性武器。

另外，本文認為現有文獻仍有幾點不足之處。首先，由於 2010 年後的印太局勢較新，仍缺乏相關研究成果，但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共軍力及對外政策出現明顯變化，當前印太安全局勢值得重新探討。其次，在指標方面，以往研究多以國防預算為主，但許多先進武器具備攻擊性質，故相關武器的採購及數量變化也是構成印太軍備競賽現象的重要因素，有必要與國防預算變化共同納入評估範圍。最後，過往研究多未有明確的軍備競賽定義，尤其對於「明顯的軍力增長」的定義仍缺乏明確、統一的說明，難以客觀評斷印太軍備競賽發展情形。

綜合上述主要學者看法，1990 年代的多數學者都認為印太國家頂多具備軍備競賽潛力，並未出現明顯競賽徵候，然而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對外展現強硬姿態，導致近年印太軍備競賽情形惡化，2012 年後亦有更多學者指出印太軍備發展具明顯競賽性質，且集中在海空軍及飛彈領域，其中包含許多之前不認為有競賽情形的學者，但由於近期資料較新，過往文獻較少論及，故 2012 年以來的發展是本文認為值得探討及彌補的地方。整體來說，目前已可確定印太國家軍備發展已超越傳統現代化的範疇，在部分領域甚至有明顯軍備競賽的跡象，即便部分學者認定沒有軍備競賽情形，但也都承認印太區域已經有不穩定因素存在。

### 第三節 研究途徑、架構與方法



#### 壹、研究途徑

本文將以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布贊的「行動－反應」理論、傑維斯的「螺旋模型」理論及理察森的軍備競賽模型做為研究途徑。現實主義從國際結構層面去解釋各國之間不信任彼此的原因，並指出各國在無政府狀態下，會以理性、自助的方式來提升自身權力，以抵禦可能的威脅。其中攻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即使沒有安全威脅，仍會以軍事力量做為擴充自身實力的手段，因為「各國都有求生存的動機，必須追求更多權力確保自身安全」(Herz, 1959: 4)，並無時無刻「關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設法增加自身權力」(Mearsheimer, 2014: 34-56)。

與此同時，根據權力平衡理論，國家會反對「任何單一國家或聯盟取得優勢地位」(Kaplan, 1957: 22-23)，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雖然不會無限擴充自身軍力，但仍會以抗衡或扞從的方式試圖維持現狀(Walt, 1987: 17-25)，抗衡則主要以「提升經濟及軍事實力的內部平衡方式」來抵禦外部威脅(Waltz, 1979: 118-121)，顯示無論出於極大化自身權力或平衡威脅的動機，國家都會以發展軍力來保障自身安全，淪入安全困境中。

在軍備競賽的情境中，A 國面對 B 國增加軍備，難以分辨 B 國增加軍備的意圖是出於防衛或進攻，故被迫以最壞情況去假設 B 國意圖，並根據 B 國軍力增長情形，相應在相同或相似的武器上提升軍力，從而陷入布贊的「行動－反應」模型中(Buzan, 1987: 76-93)。然而，A 國自我防衛反應卻被 B 國視為具有攻擊意圖，導致 B 國也以增加軍備方式回應，反而削弱 A 國安全感，並加深 B 國的不安全感，進而構成傑維斯的「螺旋模型」，即「國家基於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加強武裝，卻被他國視為攻擊意圖」的惡性循環之中(Jervis, 1976: 66-67)。軍備競賽即屬於一連串「行動－反應」而成的「螺旋模型」，各國皆假設以暴制暴能增進自身安全，卻反而使局勢更加惡化。

在印太的脈絡中，中共以軍事現代化方式，藉以擴大自身安全，並追求自己認為應有的國際地位。與此同時，區域內的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面臨區域安全體制不完善及區域外平衡者安全保護傘不夠明確的困境，只能選擇以自立自強或結盟方式平衡威脅，卻反而因為既有歷史仇恨、領土爭議、對中政策變化等因素造成中共對自身意圖的懷疑，進而激發各國競相以增加軍備的方式來抵禦威脅，形成競爭，使區域的緊張情勢更加惡化。

然而除了會因為應對威脅而增加軍備之外，依照理察森提出的軍備競賽數學模型，一國軍備增長是基於外部威脅、由工業化程度與人口組成的經濟負擔能力、以對現狀不滿程度所構成的國家意圖組成，並強調一國的國防支出將受到自身經濟負擔能力所限制（Richardson, 1960: 14-18）。余宗基則在理察森的基礎上，依現代情境將一國軍備增長的要素改成包含外部威脅、由國內生產總值（GNP）及存款成長率組成的內部經濟環境、與外國軍事合作關係（Yu, 2003: 156-158），顯示一國經濟實力及外交關係也是決定是否投入軍備之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參考此模型，評估印太各國在共軍軍力快速增長威脅下的軍備增長情形，其中，一國經濟成長率及政府稅收越高，或政府赤字越低，將有利於該國發展軍備，反之將構成限制；與外國軍事合作關係越多則將提升一國抗衡共軍威脅能力，並減緩其發展軍備之意願，詳如下列方程式。

$$\text{軍備增長程度} = \text{外部威脅} + \text{國內經濟限制} + \text{外部結盟}$$

綜合以上假設，雖然仍有許多理論可被用來解釋國際關係中的國家行為，但在印太軍備競賽中的解釋力仍不如現實主義，例如自由主義強調國際建制在平衡威脅中所扮演的角色，假設各國經貿互賴會促進各國合作，現實主義者卻認為無政府狀態及國家之間的不安全感將限制跨國合作力度，國家仍不願依賴自身以外的力量來保護自身安全（Waltz, 1979: 107），並批評自由主義無法解釋為何國家仍會以發展軍備方式回應他國軍備擴張。此外，建構主義亦嘗試以國家錯誤認知來解釋部分國家發展軍備的原因，但各國基於害怕亡國，寧以最壞打算假設他國

意圖，故本文選擇理察森的軍備競賽模型、布贊的「行動－反應」與傑維斯的「螺旋模型」理論做為分析印太軍備競賽的研究途徑。



## 貳、研究架構

本文將以印太各國對共軍威脅認知做為本文的自變項，並以印太各國軍備發展情形做為依變項，依照本章第四節的研究定義及範圍，檢驗共軍軍力快速發展下的印太軍備競賽發展情形。

### 一、依變項：印太各國有明顯大於以往的軍力增長，且具延續性

針對依變項的部分，國防預算為相關文獻最常納入的指標，部分文獻也將主要武器的質與量增減單獨納入指標中，然而較少見到兩者同時納入指標中。本文認為武器的質與量同等重要，故將藉由比較主要武器在不同時期正式服役及規劃籌購數量上的增減，以及武裝、防禦、動力、偵測能力等質量數據變化，做為衡量各國軍力增長的指標，並加上過往文獻時常納入的國防預算指標。

此外，由於國家經濟能力將對一國發展軍備構成限制、國家對外結盟能力亦將影響一國發展軍備的程度，故本文將把各國重要經濟指標及與外國安全合作關係做為影響其軍備發展之重要指標，詳如表 1-1。

表 1-1：依變項說明



類別	指標	指標定義	主要資料來源	觀察方式
軍力發展情形	國防預算	各國政府的軍事支出	1.IISS Military Balance 2.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各國在特定領域及時間內的前後變化，若與過去軍費支出、三軍武器裝備數量及質量有明顯增長，即構成軍備快速發展的定義
	主要武器數量	主戰車、裝甲車、戰鬥機、預警機、直升機、作戰艦艇、潛艦、兩棲登陸艦等武器正式服役及籌購數量的變化	1.Global Security 2.Global Firepower 3.IISS Military Balance 4.Jane's Fighting Ships 5.Flight International 6.US Annual Report of China 7.US Foreign Military Sales	
	主要武器質量	主戰車、裝甲車、戰鬥機、預警機、直升機、作戰艦艇、潛艦、兩棲登陸艦等武器攻擊力、動力、偵測力升級及預計升級之情形	8.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 9.三軍學術期刊 10.綜合新聞資料	
限制因素	國家經濟實力	各國經濟成長率、政府稅收及赤字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用以與國防預算成長率進行比較
	外交結盟能力	與外國軍事合作關係	1.美國及各國國防報告書 2.綜合智庫及新聞資料	各國與外國加強高層交流、駐軍、軍購、演訓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二、自變項：共軍快速現代化且各國對中共具明確威脅認知及抵禦意圖

針對自變項的部分，構成對中共軍事威脅認知包含共軍本身快速現代化、中共更加強勢之對外政策、印太各國在官方文件及與中共互動言行中對中共具明確威脅認知及抵禦意圖等三項，而文獻中常提到威脅認知類型包含領土爭議、歷史仇恨、專屬經濟海域爭議等，故本文將找出上述因素對各國軍備發展的影響，詳



如表 1-2：

表 1-2：自變項說明

指標／說明	指標定義	主要資料來源	觀察方式
共軍快速現代化	共軍國防預算及主要武器之質量增長情形	同依變項之資料來源	各國在特定時間內，於官方報告或言行上對中共有明確威脅認知及抵禦意圖
中共更強勢之對外政策	中共官方公布之外交及軍事政策之轉變	1.中共國防政策之轉變 2.中共外交政策之轉變	
印太各國對中共之威脅認知	官方言行提及對共軍威脅及與中共領土爭議等	1.各國國防白皮書 2.ASEAN Security Outlook 3.Jane's Defense Weekly 4.NIDS East Asian Review 5.綜合新聞資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此外，針對多個文獻提到各國國內因素對國家發展軍備構成重大影響，按軍備競賽定義，只要外部威脅認知及軍備快速成長同時存在，即構成軍備競賽；故本文將不就各國經濟成長、科技發展、內亂、貪腐、國家尊嚴等因素進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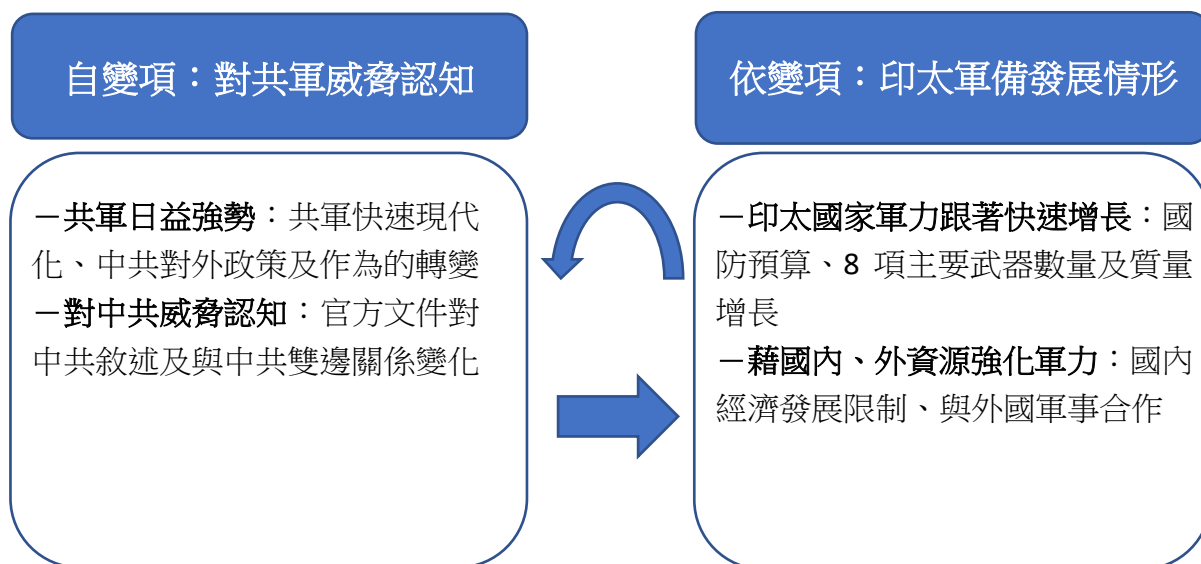


圖 1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參、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將利用既有中、英文有關印太軍備競賽發展成因、印太國家軍力發展之期刊、專書、論文、官方檔案、報導、網路資料等，使用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探討共軍軍力快速發展下的印太軍備競賽發展過程，以及遏止軍備競賽的有關努力。

###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 是指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歷史資料，並針對過去現象提出因果解釋。本文將利用歷史研究法，從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各國國防報告書等智庫報告及官方報告書中，歸納刺激印太各國軍備發展的成因及與共軍軍備發展及對外政策變化之關聯，以探究中共威脅因素對各國發展軍備的影響。

###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 是以既有官方文件、研究報告、報章雜誌等資料進行分析。本文將利用文獻分析法，參考各國國防白皮書及 Global Security、IISS Military Balance、SIPRI、Flight International 等研究報告，探究共軍及印太各國軍備發展情形，評估是否符合軍備競賽的定義，並梳理各界試圖阻止軍備競賽的有關努力及成果，進而探討這些努力仍然成效不彰的原因。

## 第四節 研究定義、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定義

首先，本文「軍備競賽」指「國家間對彼此有明確威脅認知，且軍力出現明顯的質與量增長，用以抵禦彼此威脅」。故凡是同時出現符合上述的定義，即代表有軍備競賽現象。

其次，本文「軍力」包含國防預算、主要武器的質與量變化，主要武器以主戰車、裝甲車、直升機、戰鬥機、預警及反潛機、作戰艦艇、潛艦、兩棲登陸艦等 8 項為主。

最後，本文「軍力出現明顯質與量增長」指的是各國國防預算較前一年成長逾 4% 或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sup>1</sup>在相同或對應領域的武器數量上較前一年數值成長逾 4%，以及在相同或對應領域武器系統質量上進行升級換代，而整體武器數量並未減少，且前一時期未出現類似升級情形。

### 貳、研究範圍

#### 一、區域範圍

依美國國防部 2019 年 6 月公布《2019 年印太戰略報告》中的定義，廣義的印太指「美國西岸到印度西岸的區域」（US Government, 2019b: 1），包含中共、北韓、俄國等競爭對手（US Government, 2019b: 7-14），以及日本、南韓、蒙古、台灣、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紐西蘭、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馬爾地夫、尼泊爾、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寮國等國（US Government, 2019b: 22-42）。然而，過往文獻中文萊、緬甸、寮國等印太國家因國防預算資料

---

<sup>1</sup>本文以 4% 為指標是參考 Michael Wallace 對軍備明顯增長的定義，有關 Wallace 的文獻回顧請參見第 5 頁說明。

不足、進口武器數量太少而時常被排除於相關研究中 (Hartfiel & Job, 2007: 18)，故為了檢驗印太國家是否因中共威脅而增加軍備，本文將以與中共有領土爭議，或經常被過往文獻納入研究對象的國家為印太區域研究範圍，包含日本、台灣、印度、澳大利亞、越南、菲律賓等 6 個行為者以及中共，此將覆蓋兩岸、南海、東海、印中邊界爭議等印太區域熱點。

## 二、時間範圍

基於先前文獻皆以 2012 年前的印太軍備發展狀況為主，本文選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以及亞洲軍費支出首度超越歐洲的 2012 年至預計完成寫作時間前一年的 2021 年，做為時間範圍，藉以釐清這 10 年來的印太軍備競賽情形。

## 參、研究限制

首先，在資料來源方面，各國國防軍備實際發展情形屬於國家機密，公開資料難以反映事實全貌，尤以中共、北韓軍備發展的透明性時常為人詬病，基於官方公開資料的缺乏，且官方資料中仍有準確性與可靠性的問題，本文將盡可能尋找齊全資料，並找出其中的趨勢變化。

其次，由於本文不會使用中文、英文以外的語言，故僅能仰賴各國官方或智庫的中、英文資料。有鑑於此，本文將參考國內、外的學術研究，輔以各國的中英文官方資料。

最後，由於各國發展軍備決策複雜，無明確因果關係完全歸咎於外部威脅因素。然而，本文將檢視不同國家外部威脅對軍備發展之影響，說明清楚其中的因果邏輯。

## 第二章 共軍現代化及印太國家威脅認知

蘇聯 1991 年垮台後，美軍仍維持在東亞 10 萬人駐軍規模，但自菲律賓蘇比克灣、克拉克空軍基地撤離（Kane, 2012: 259-261），加上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反恐（朱安南，2005：43-45），造成印太區域出現一定程度權力真空；與此同時，中共軍力的快速現代化逐步改變印太區域權力平衡，各國紛紛以自主發展軍力方式試圖抵禦中共威脅，引發各界質疑印太區域是否已出現軍備競賽。尤其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逐步展現對外強硬姿態，引起周邊國家對共軍意圖及美國安全保障之質疑，本章將從 2012 年以來的共軍現代化情形，聚焦於新型攻擊性武器的發展，以分析共軍發展是否有異常快速增長情形，成為更具侵略性的軍隊，並從 2012 年後中共日益強硬的對外言行，以及印太各國官方文件、官員言論中對中共威脅的相關描述，探討印太各國對中共威脅認知程度，並釐清是否構成軍備競賽條件。

### 第一節 共軍現代化之發展

本節將從中共國防預算增長及海軍、空軍、火箭軍、陸軍在 2012 至 2021 年間快速現代化情形，探討共軍增長是否屬於單純現代化，尤其聚焦共軍是否發展具對外投射能力、非單純國內防衛使用的攻擊性武器，試圖釐清共軍現代化是否超出正常現代化範疇，且是否具對外攻擊性，進而對印太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 壹、共軍國防軍費增長情形

根據中共官方軍費支出數據，中共自 2008 年起成為全球第二大軍費支出國，不僅軍費支出在 2012 至 2021 年間翻倍，除了 2016 年受到裁軍 30 萬人影響，僅

成長 0.8%外，每年成長率都穩定在至少 4%以上（請見表 2-1），已符合超過 4% 的快速增長定義。對此，中共官方宣稱此係為因應逐年增加的國家安全利益及海外威脅，且軍力增長與大陸經濟實力同步提升，有效反映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然而，中共軍費支出成長率除 2016、2017、2021 年外，皆高於其國內生產總額（GDP）成長率（請見表 2-1），顯示共軍 2012 年以來大部份年份的軍費增長並非為了追上經濟發展程度或正常更新換代，而係為滿足習近平上任後不斷外擴軍事戰略所需，故須投入超越經濟成長率的大量經費進行擴軍。

表 2-1：中共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中共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大陸 GDP 成長率	SIPRI 推估數據 億美元(差距)	GDP 占比
2012	1026.43	+7.86%	1,451.28(1.4 倍)	1.25%
2013	1158.44(+12.8%)	+7.77%	1,640.71(1.4 倍)	1.28%
2014	1294.08(+11.7%)	+7.43%	1,821.09(1.4 倍)	1.30%
2015	1424.09(+10.0%)	+7.04%	1,965.39(1.4 倍)	1.27%
2016	1436.68(+0.8%)	+6.85%	1,985.38(1.4 倍)	1.28%
2017	1504.58(+4.7%)	+6.95%	2,104.43(1.4 倍)	1.26%
2018	1705.04(+13.3%)	+6.75%	2,325.31(1.4 倍)	1.23%
2019	1811.35(+6.2%)	+5.95%	2,403.33(1.3 倍)	1.23%
2020	1932.95(+6.7%)	+2.30%	2,523.04(1.3 倍)	1.27%
2021	2073.40(+7.2%)	+8.10%	2,930.00(1.4 倍)	1.23%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SIPRI（2012-2021a）；世界銀行（2012-2021）。

備註：中共官方國防預算及 GDP 占比參照指標為 IISS Military Balance 的 Defence Spending in Current US Dollar & Defence Spending % of GDP。

此外，共軍聲稱海外安全威脅不斷增加，但共軍軍力增長反而刺激周邊國家的不安全感，並引發渠等以增強軍備方式回應，尤其冷戰後逐步撤出亞太的美軍亦於 2011 年宣布將 60%海軍軍力部署在印太區域、2019 年退出《中程彈道飛彈條約》、2021 年正式在第二島鏈部署中程彈道飛彈等，都是為了應對日益增加的共軍威脅，反而加劇中共安全威脅，並形成惡性循環。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官方軍費支出數字並非實際花費，仍不包含軍事武器研發、外購武器、軍工企業、太空產業、國防動員、部分軍事基地設施、武警等支出（US

DOD, 2020a: 140; China Power Team, 2015)，其中 SIPRI 的推估數字皆為中共官方數據 1.3 倍以上，實際支出差距亦可能達到 2 倍以上（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33），遠高於其所公布數據，再次反映中共實際軍事花費恐較其公布數字更高，並有意藉此淡化國際對中國威脅認知。


## 貳、中共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中共海軍為共軍自 2012 年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軍種，並更具大型化、遠海化等特色。在航母方面，從 2012 年前沒有任何一艘航母，至 2021 年已有遼寧、山東號 2 艘航母服役及 2022 年下水、尚未服役的福建號（Gan & Lendon, 2022），大幅提升共軍遠距打擊能力，具明顯海外投射軍力目的，且無論在噸位數或搭載飛機數量都有顯著提升，凸顯共軍航母數量及質量上都有快速增長情形。

艦載機方面也出現相同趨勢，改裝自 Su-33 的殲-15 自 2016 年開始服役，採滑躍方式在遼寧、山東號航母上起飛，迄今已有超過 45 架，且殲-15 也依序完成日間、夜間、航訓期間起降訓練；另搭配福建號航母的首型匿蹤艦載機殲-35 及空警-600 艦載預警機仍持續開發中（Flight International, 2021: 16; Vavasseur, 2021b），在攜彈量、作戰半徑、匿蹤化等領域進行升級，上述裝備發展顯然並非自我防衛所需，亦顯示中共艦載機數量及質量上也存在快速增長情況。

兩棲突擊艦艇數量雖然從 2012 年的 87 艘下降至 2021 年的 55 艘，呈現數量大幅減少趨勢，但 071 型大型登陸艦在過去 9 年期間由 1 艘暴增至 5 艘，乘載量由 072 型的 10 輛裝甲車及 250 名人員大幅增加至 60 輛裝甲車及 800 名人員（IISS, 2021: 253），2021 年更見到首艘 075 型兩棲突擊艦正式服役，噸位數突破 30,000 噸，載運直升機數量亦從 071 型的 4 架暴增至 28 架（Vavasseur, 2021a），搭配航母陸續服役，大幅增強共軍登陸的載運能量及投送距離，並呈現大型化、載運量提升等質量上的大幅提升，符合質量快速增長特徵，且具對外投射能力。

驅逐艦方面，中共海軍自 2012 年以來連續 9 年以每年至少 1 艘的速率增加



驅逐艦數量，並從 2012 年的 13 艘大幅增加至 2021 年的 32 艘（請見表 2-2）。與此同時，共軍新增驅逐艦從 052C 到 2015 年以 052D 為主，除全面換裝主動相位陣列雷達外，垂直發射系統數量亦從 48 枚增加至 64 枚（IISS, 2015: 240），2020 年則開始量產排水量超過 10,000 噸的 055 型巡洋艦，垂直發射系統數量再次擴增至 112 枚。反艦能力也從搭載鷹擊-82、鷹擊-83 等次音速反艦飛彈升級成射程更遠的鷹擊-62 次音速及鷹擊-18A 超音速反艦飛彈，強化反艦飛彈打擊範圍及突破能力，並陸續淘汰 051 型驅逐艦、以安裝垂直發射系統方式升級現代級驅逐艦（IISS, 2020: 262），反映中共海軍驅逐艦在 2012 至 2021 年間每年同時存在數量及質量上的快速增長現象，並具備在更遠距離之獨立作戰能力。

巡防艦方面，雖然整體數量由 2012 年的 65 艘下降至 2021 年的 46 艘，並未出現數量上的成長，但這段期間共軍連續 9 年增建 054A 型巡防艦、056 型飛彈巡邏艦<sup>2</sup>等新型艦艇，大幅淘汰較舊的 053H 型巡防艦，使共軍巡防艦從沒有防空能力，到擁有 8 聯裝防空飛彈系統，甚至到具備 32 具垂直發射系統（IISS, 2014: 233-234），再加上 2014 至 2019 年間整體數量並未減少，顯示共軍巡防艦在上述期間每年都有質量上的快速增長情形。

潛艦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2 年的 71 艘下降至 2021 年的 59 艘，但中共海軍於同期淘汰大量 035、039 型舊潛艦，並自 2014 年起新增 12 艘 039B 型潛艦，相較原本 039 型增加絕氣推進系統（AIP）、鷹擊-18 超音速反艦飛彈（IISS, 2020: 252），大幅延長潛伏於水下時間，並強化潛射反潛飛彈射程及突破能力。與此同時，中共核動力潛艦也有大幅增長，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由 2012 年 3 艘增加一倍至 2021 年 6 艘，大幅強化中共核威懾能力，核動力攻擊潛艦亦從 2012 年的 3 艘 091 型、2 艘 093 型，進化至 2021 年 6 艘全是 093 型，並搭載鷹擊-18 超音速反艦飛彈（IISS, 2021: 251），顯示中共海軍核動力潛艦在數量及質量上都有大幅增長。

---

<sup>2</sup>056 型巡邏艦經 Military Balance 判定為飛彈巡邏艦，故不納入巡防艦統計範圍中。



表 2-2：中共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航母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b>1(+1)</b> <b>001+1</b>	87	71	13	65
2013	1	87 首見 071+1、 淘汰 079	65(-6) 094+1	<b>14(+1)</b> <b>052C+1</b>	62(-3) <b>054A+4</b> 、 淘汰 053H
2014	1	88(+1) <b>071+1</b>	<b>70(+5)</b> <b>039B+5</b>	<b>15(+1)</b> <b>052C+1</b>	54(-8) 054A+2、 淘汰 053H
2015	1	88	70	<b>17(+2)</b> 首見 052D+1、 <b>052C+1</b>	54 <b>054A+1</b> 、 淘汰 053H
2016	1	50(-38) 淘汰 079	61(-9) 039B+3 淘汰 035、 039G	<b>19(+2)</b> <b>052D+1</b> 、 <b>052C+1</b>	54 <b>054A+4</b> 、 淘汰 053H
2017	1	<b>56(+6)</b> <b>071+1</b> 、 <b>072+13</b> 、 淘汰 074、	57(-4) 淘汰 035G	<b>21(+2)</b> <b>052D+2</b>	<b>57(+3)</b> <b>054A+2</b> 、 <b>053H+1</b>
2018	1	57(+1) <b>072B+1</b>	<b>62(+5)</b> <b>093A+4</b> 、 <b>039B+1</b> 配備 <b>YJ-18</b> 飛彈	<b>23(+2)</b> <b>052D+2</b>	59(+2) <b>054A+3</b> 、 淘汰 053H
2019	1	54(-3) 071+1 淘汰 074	59(-3) 039B+2、 淘汰 035G	<b>27(+4)</b> <b>052D+4</b>	59 <b>054A+3</b> 、 淘汰 053H
2020	1	55(+1) <b>071+1</b> 、升級 074B	59 <b>039B+2</b> 、 淘汰 035G	<b>29(+2)</b> 首見 055+1 及 現代級加裝 <b>VLS</b> 、 <b>052D+1</b>	52(-7) 054A+2、 淘汰 053H
2021	<b>2(+1)</b> <b>002+1</b>	55 <b>075</b> 下水	59 <b>094+2</b> 、 淘汰 035B	<b>32(+3)</b> <b>052D+3</b> 配備 <b>Z-20</b>	46(-6) 054A+1、 淘汰 053H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參考自 IISS (2012-2021)。

備註：粗體字代表有整體數量或軍備質量快速增長的年份。

綜上所述，中共海軍驅逐艦 2012 年以來共新增 19 艘新型艦艇，每年都有 4%以上數量成長及新型裝備入列，尤其新增 052D、055 兩款大型艦艇，在數量及質量上都有快速成長情形。巡防艦方面，雖然部分年份汰除艦艇數量大於新增數量，但 2014 至 2019 年間都有更強防空、匿蹤能力的艦艇補足汰除艦艇，具有質量快速增長趨勢。中共潛艦則以汰換老舊裝備的質量增長為主，2018 年以來新型潛艦大量服役且整體數量未減，使中共潛艦在 2018 至 2021 年具有質量快速增長跡象。航母及兩棲艦方面，航母自 2012 年前 0 艘增加至 2021 年 2 艘服役、1 艘在建，無論是質量或數量都符合快速成長定義，而兩棲突擊艦雖僅 2017 年符合超過 4%以上快速成長定義，但 2012 年以來透由不斷新增具更大載運量的 071、075 型兩棲突擊艦，且其中 6 年符合數量未減少、升級艦艇種類增加的質量快速增長情形，故整體來說符合質量快速成長特徵。

表 2-3：中共海軍軍備競賽情形

年份	航母及兩棲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3	新、質		數、質	
2014	質	數、質	數、質	
2015			數、新、質	質
2016			數、質	質
2017	數、質		數、質	數、質
2018	質	數、新、質	數、質	質
2019			數、質	質
2020	質	質	新、質	
2021	數、新、質	質	數、新、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備註：「數」代表數量快速增長、「質」為質量快速增長、「新」為新裝備服役。

整體而言，中共海軍自 2012 年以來聚焦從具備「近海防禦」能力升級成具「遠海防衛」能力，新增艦艇多為具有更大載台、更遠航程、搭載更多射程更遠之攻擊性武器等特徵，投射範圍更加擴大。此外，共軍艦艇如同「下餃子」般建造快速，尤其航母及驅逐艦等具備遠洋作戰能力的艦艇是在數量及質量同步大幅增長，都已明顯具軍備競賽及對外攻擊性質。

## 參、中共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中共空軍同樣具備大型化、遠距打擊化的趨勢，且機種更多元，更有利共軍從事多元對外打擊行動。在戰鬥機方面，雖然 2012 至 2021 年整體只增加 9%、共 151 架，其中僅 3 年有年增率超過 4% 的數量快速成長（請見表 2-4）。然而，中共 2012 至 2021 年間大量淘汰殲-7、殲-8 等舊式裝備，並增加 622 架第四、五代新型戰鬥機，新增擁有國產航電、武器系統機型，例如分別在 2017、2018 年首度列裝殲-16、殲-10C，以及推出具更大射程及偏離軸發射角度的霹靂-10、霹靂-15 型空對空飛彈（IISS, 2016: 222-225）。同時向俄羅斯採購 Su-35 戰鬥機及發動機設備，以進口、自產雙軌方式同步提升戰鬥機作戰性能，使得第四、五代戰鬥機逐漸成為中共空軍主力，<sup>3</sup>質量上已具明顯快速成長趨勢，共軍戰鬥機整體戰力亦未因數量減少弱化，反而因航電、武器系統升級而有所強化。

此外，中共空軍仍持續朝具匿蹤能力的第五代戰鬥機方向邁進，如殲-20 自 2017 年開始少量服役，2019 年開始列裝殲-20A，殲-31 也持續研發中，日後更可能轉成中共首款匿蹤艦載機殲-35（Vavasseur, 2021b），兩者皆有減少雷達反射波之匿蹤化外型及內置彈艙，有利中共空軍進行遠距對地打擊任務，未來研發成功將可與美軍 F-22、F-35 處於同一個世代。另外，殲-16D 電子作戰機在 2021 年公開亮相（IISS, 2021: 232），成為中共首型具電子作戰能力戰鬥機，充分反映共軍戰鬥機 2012 至 2021 年間在質量上是處於跨越兩個世代的快速成長，明顯具有質量軍備競賽跡象，且不限於爭奪制空權之目的。

轟炸機整體數量自 2013 至 2021 年暴增 109 架，幾乎翻倍，且除 2017 年外，每年都有至少 8 架及 4% 以上數量成長，具有數量快速成長情形。此外，轟炸機新增機種也不斷進化，包含自 2015 年開始換裝轟-6K、2020 年起新增搭載空中加油系統及空射巡弋飛彈的轟-6N、轟-6J 機型，航程從 5,800 公里擴大至 8,000

---

<sup>3</sup>依美國空軍定義，第四代戰鬥機指裝備渦輪扇發動機、多功能雷達、電子儀表板等設備之戰鬥機，如 F-16 及 Su-30；第五代戰鬥機則主要包括匿蹤、超音速巡航、超機動、資訊化等能力，如 F-22 及殲-20。

公里、作戰半徑由 2,000 公里增加至 3,500 公里，並開始研發轟-20 型匿蹤轟炸機（IISS, 2020: 237; iMedia, 2022），突出中共遠程打擊需求，也使轟炸機逐步朝向多用途化、匿蹤化發展，顯示中共轟炸機 2013 年以來是同時在數量及質量上的快速成長。

預警及反潛機方面，2013 至 2021 年間共增加 48 架，除 2015、2018 兩個年度有數量減少之外，其餘年份皆處於大於 4% 以上快速成長情況，尤其 2019 年起處於每年至少 10 架以上的增長，符合數量快速成長定義。此外，中共新增機種包含分別於 2016、2021 年首度列裝的空警-500、空警-600 預警機等，其中後者恐成為中共航母艦載預警機（Vavasseur, 2021b），顯示共軍不斷提升預警機航程及探測距離，可有效輔助中共戰鬥機遠距指揮管制、目標獲取需求，亦反映共軍在預警及反潛機方面也具有整體數量未減少、升級機種不斷服役的質量快速成長情形。

大型機方面，運-8T 空中指揮機在 2014 年首度列裝、具更大航程及載重的運-20 運輸機也在 2016 年服役，未來將推出空中加油機、預警機等衍生機種，並取代俄製 IL-76（IISS, 2021: 232），進一步擴大共軍戰鬥機作戰距離。2022 年 4 月更首度載運防空飛彈至塞爾維亞（黃國樑，2022），充分驗證其遠距投射能力，顯示共軍側重發展多用途之大型平台，同時提升戰略投送、電子作戰等綜合作戰能力。

無人機方面，中共持續研發翼龍、彩虹、利劍、翔龍、雲影、BZK-005 等多型號無人機，同時具偵察、攻擊、反輻射等功能（US DOD, 2020a: 52），反映共軍無人機朝匿蹤化、更大航程、武裝化方向發展。

表 2-4：中共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轟炸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1669	132	144
2013	<b>1777(+108)</b> <b>J-10A/S+44</b> 、 <b>J-11B/BS+64</b>	112(-20) 淘汰 H-5	100(-44) SH-5+4、 淘汰 JZ-6
2014	1769(-8) J-11B/BS+20、 J-7G+24、 淘汰 J-8F	<b>120(+8)</b> <b>H-6+8</b>	<b>108(+8)</b> 首見 C2+5(Y-8T+3、 B737+2)、GS-5+4、 淘汰 SH-5
2015	1787(+18) <b>J-11B/BS+12</b> 、 <b>J-10A/S+30</b> 、淘汰 J-7E	<b>136(+16)</b> <b>H-6K+16</b>	108
2016	<b>1866(+79)</b> 首見 J-15+14、 首見 J-10B+53、 <b>J-11B/BS+12</b>	<b>150(+14)</b> <b>H-6K+14</b>	<b>114(+6)</b> 首見 KJ-500+2、 首見 Y-9JB+4
2017	1865(-1) 首見 J-20+2、 首見 J-16+2、 <b>JH-7A+20</b> 、 淘汰 Su-27SK、 J-10S、J-15 墜毀	150	118(+4) 首見 Y-8Q+4
2018	1908(+43) 首見 Su-35+14、 首見 J-10C+24、 <b>J-15+7、J-16+14</b> 、 <b>J-20A+4</b> 、 淘汰 Q-5	<b>189(+39)</b> <b>H-6K+42</b> 、 淘汰 H-6G	114(-4) KJ-500+3、 淘汰 HZ-5
2019	1884(-24) Su-35+10、J-10C+56、 J-11B/BS+20、 J-16+20、J-20A+6、 淘汰 J-8、Q-5	<b>203(+14)</b> <b>H-6K+10</b> 、 首見 H-6J+4	<b>124(+10)</b> <b>Y-9XZ+2、Y-9-JZ+6</b> 、 <b>KJ-200+11</b> 、 <b>KJ-500+6</b> 、 淘汰 Y-8G、J、Q、W
2020	<b>1976(+92)</b> <b>J-10C+20、S+22</b> 、 <b>J-16+40、J-20+10</b>	<b>211(+8)</b> <b>H-6N+4、H-6J+4</b>	<b>134(+10)</b> <b>KQ-200+10</b>

2021	1820(-156) J-10C+20、J-15+14、 J-16+50、J-20A+2 淘汰 J-7、J-8、Su-27	221(+10) H-6J+10	148(+14) KJ-500+14、KQ200+1 Y-8DZ+2、Y-9G+3、 淘汰 SH-5、Y-8H
------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參考自 IISS（2012-2021）。

綜上所述，中共空軍中的轟炸機軍備競賽跡象最為明顯，2013 至 2021 年間僅 2017 年未見數量或質量上的增長，其餘年份則因數量成長皆超過 4%且不斷有新轟-6 機型服役，整體而言符合數量及質量同時快速成長定義。共軍預警及反潛機也處於類似情況，2013 至 2021 年間僅 2015、2018 年因汰除數量大於新增數量，而沒有明顯數量或質量成長外，其餘年分都有升級裝備入列的質量增長，包含空警-500、空警-200 等機種，其中 5 個年份更有超過 4%以上數量快速成長。然而，在戰鬥機方面，由於戰鬥機整體數量並未明顯增加，且有部分年份退役飛機數量超過升級機種的服役數量，難以判定屬於軍備現代化或快速成長，但因增加殲-15、殲-16、殲-20、殲-31 等第四、五代戰鬥機，且整體數量並未減少，故在部分年份仍具有質量快速增長情形。

表 2-5：中共空軍軍備競賽情形

年份	戰鬥機	轟炸機	預警及反潛機
2013	數、質		
2014		數	數、新、質
2015	質	數、質	
2016	新、數、質	數、質	數、新、質
2017	新、質		新、質
2018	新、質	數、質	
2019		新、數、質	數、質
2020	數、質	數、質	數、質
2021		數、質	數、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整體來說，中共空軍主戰機型已由第三代戰鬥機為主，轉向以第四代戰鬥機為主，甚至邁入第五代戰鬥機的趨勢，無論載台或所掛載武器也進一步地拉近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且不斷強調匿蹤、大量載彈、遠距打擊能力，對外攻擊範圍正不斷擴大。與此同時，無論作戰或輔助機種也有朝向多用途化、匿蹤化、大型化

的發展趨勢，尤其聚焦發展轟炸機、預警機，大幅強化中共空軍偵察、打擊能力及距離，顯然是為遠距攻擊之目的，具有外擴攻擊性，而非單純國土防空用途。



## 肆、中共火箭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中共火箭軍前身為共軍二炮部隊，2015 年起改名為火箭軍，成為獨立軍種後，中共不斷強化中遠程飛彈數量、突防能力及種類，對周邊國家的核威懾及反介入能力不斷提升。在整體飛彈數量方面，由 2012 年的 460 枚暴增至 2021 年的 697 枚，尤其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及具備反介入能力的中遠程飛彈數量增加幅度最大，僅 2016 年出現數量減少情形，並不斷引進新型彈種。

在洲際彈道飛彈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7 年的 62 枚增加至 2021 年的 104 枚，增加 67.7% (請見表 2-6)，且核彈頭數量將由現在的 200 多枚擴增至 2027 年 700 枚、2030 年 1,000 枚以上 (US DOD, 2021a: 92)，2017 年之後的增長情況符合數量快速成長定義。此外，中共仍不斷研發、新增具道路機動、固態燃料、11,200 公里以上射程、多彈頭重返大氣層載具能力的東風-31A、東風-31AG、東風-41 等新型洲際彈道飛彈，其中東風-41 甚至可以鐵路、發射井方式發射 (US DOD, 2014a: 6-7; 2020a: 55-56)，並於 2021 年在甘肅省玉門市附近增建疑似發射井設施，引發國際對共軍核武擴軍的擔憂 (Hille, 2021)。上述顯示共軍不斷擴充自身核武質量與數量，持續加強核武發射器生存性、方便性、精確性，藉此強化共軍遠程精準打擊及核威懾能力，已非淘汰舊型彈種的單純現代化。

中遠程彈道飛彈是中共火箭軍中軍備競賽情形最為嚴重的部分，2012 年至 2021 年間已由 2012 年的 124 枚增加至 2021 年的 296 枚，增加幅度超過一倍，達到 138.7%，期間完全沒有淘汰舊型飛彈情形，僅部分年份暫時停止增加而已，故已符合數量快速成長定義。此外，新增飛彈多為新型彈種，包含具備切換傳統與核子彈頭及多彈頭重返大氣層載具的東風-26、遠程反艦能力的東風-21D、具備高超音速能力的星空-2 及東風-17 型飛彈等 (US DOD, 2020a: 55-56)，使共軍

中遠程飛彈射程延伸至第二島鏈，且不斷精進打擊精確性、突防能力(ROC, 2017: 36-37)，亦反映共軍中遠程飛彈在數量及質量上都具備明顯快速現代化趨勢。

短程飛彈是中共火箭軍軍備競賽特徵較不明顯的領域，整體數量並未見重大增幅，僅 2013、2020、2021 共 3 個年份出現數量快速成長情形。然而，火箭軍自 2020 年起大量新增具備高超音速、多彈種、可由陸地及空中發射的長劍-100 短程巡弋飛彈 (IISS, 2020: 234-235)，係火箭軍 2012 年以來唯一的新型短程飛彈彈種，並在兩年內大量服役，大幅強化共軍對印太區域的打擊能力，也凸顯短程飛彈在 2020、2021 具備質量上快速增長情形。

表 2-6：中共火箭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洲際飛彈	中遠程飛彈	短程及巡弋飛彈
2012	66	124	270
2013	<b>72(+6)</b> <b>DF-31A+6</b>	124	<b>306(+36)</b> <b>DF-15+36</b>
2014	66(-6) 汰除 DF-31	<b>140(+16)</b> 首見 <b>DF-16+12</b> 、 <b>DF-3A+4</b>	306
2015	66	140	306
2016	62(-4) 汰除 DF-31	<b>162(+22)</b> 首見 <b>DF-26+16</b> 、 <b>DF-21D+18</b> 、汰除 DF-3A	243(-63) 汰除 DF-15
2017	62	162	243
2018	<b>70(+8)</b> 首見 <b>DF-31AG+8</b>	162	243
2019	70	<b>188(+26)</b> <b>DF-26+14</b> 、 <b>DF-21D+12</b>	243
2020	<b>98(+28)</b> 首見 <b>DF-41+18</b> 、 <b>DF-31AG+10</b>	<b>246(+58)</b> 首見 <b>DF-17HGV+16</b> 、 <b>DF-26+42</b>	<b>259(+16)</b> 首見 <b>CJ-100+16</b>
2021	<b>104(+6)</b> <b>DF-31AG+6</b>	<b>296(+50)</b> <b>DF-26+38</b> 、 <b>DF-16+12</b>	<b>297(+38)</b> <b>CJ-100+38</b>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參考自 IISS (2012-2021)。

備註：依照美國國防部定義，洲際飛彈指射程 5,500 公里以上的飛彈；遠程飛彈指射程 3,000 至 5,500 公里之間的飛彈、中程飛彈則指射程 1,000 至 3,000 公里之間的飛彈；短程飛彈指射程 1,000 公里以下的飛彈。



總觀而論，中共火箭軍 2012 年以來除 2015 至 2017 年間外，每年都有飛彈符合超過 4% 的數量快速增長定義，尤其 2020、2021 年是各彈種都有數量快速成長情形，軍備競賽情形最為嚴重。在新型武器方面，中共火箭軍自 2014 年以來共引進 6 種新型彈種，其中 2020 年是各類飛彈都有新型彈種服役，2012 年以來也僅 2015 及 2017 年沒有新增彈種，故整體符合質量快速成長定義，並構成軍備競賽條件。

表 2-7：中共火箭軍軍備競賽情形

年份	洲際飛彈	中遠程飛彈	短程及巡弋飛彈
2013	數		數
2014		數、新	
2015			
2016		數、新、質	
2017			
2018	數、新		
2019		數、新	
2020	數、新	數、新	數、新
2021	數	數	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整體來說，中共火箭軍現代化領域著重在中遠程彈種，較少更新短程彈種，顯示共軍飛彈發展強調遠距對地、對艦攻擊能力，並不斷提升自身飛彈的生存性、突防能力、快速部署能力、彈種類型，以嚇阻外力接近中國周邊。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於 20 大報告中首度提及建立「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意圖加速提升共軍核武質與量（楊安，2022），此將不斷擴大共軍對外國軍隊核威懾及反介入的範圍，恐將使區域內美國盟邦質疑美軍對印太安全承諾，屬於積極拓展自身勢力範圍的攻擊性武器，故對印太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 伍、中共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中共陸軍 2015 年雖然歷經軍事改革，地位降至與其他軍種平起平坐，然在部分領域也有明顯現代化情形。首先，直升機算是中共陸軍增長最為快速的武器，

2012 至 2021 年間共增加 365 架、相較 2012 年成長 43.7%，平均每年成長超過 4%（請見表 2-8），在數量上符合快速增長定義。其中，新增機型包含直-19 攻擊直升機、分別於 2017、2020 年服役的直-18、直-20 運輸直升機，以及自俄國採購的 Mi-171、Ka-28、Ka-31 等多型直升機，並且衍生出新反潛機種，甚至海軍陸戰隊也於 2021 年首度納編直升機（IISS, 2021: 254），使得共軍直升機在攜帶火力、掛載重量、續航里程等方面都有巨大進步，大幅強化中共陸軍的空中攻擊及遠距運輸能力，也顯示共軍直升機在質量上具有快速成長情形。

裝甲車方面，中共陸軍自 2013 年起每年都有 88 輛以上的成長，其中有 4 年增長超過 1,000 輛，較 2012 年的 5,298 輛增加超過 1 倍至 2021 年的 12,364 輛，總計新增包括 1,750 輛 04A 式及 2,360 輛 08/09 式輪式步兵戰車<sup>4</sup>、580 輛 11 式輪式突擊車。其中 05 式、09 式是新型裝備，且在主砲火力、裝甲防護力、引擎動力都有顯著提升（IISS, 2021: 312），多項裝備甚至著重兩棲登陸及快速反應能力，顯見中共陸軍強調具向外投射、攻佔島嶼能力等攻擊用途，亦凸顯裝甲車無論在數量或質量每年都符合軍備競賽的快速增長特徵。

主戰車方面，中共陸軍 2012 至 2021 年持續汰除 59 式主戰車，並陸續新增 770 輛 99 式及 700 輛 96 式主戰車（請見表 2-8），無論在主砲火力、裝甲防護力、引擎動力都有顯著提升；此外，共軍於 2018 年首度列裝重量與 59 式相當，但具備空降能力的 15 式輕戰車（IISS, 2021: 251），並連續 3 年新增超過 250 輛，強化共軍主戰車在不同戰場與地形的作戰能力，大幅提高共軍主戰車在海外運用範圍。

---

<sup>4</sup>08 式及 09 式為同款步兵戰車，原先 09 式為外界流傳名稱，至 2018 年才改為 08 式。

表 2-8：中共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835	8324	5298
2013	830(-5) 首見 Z-19+12、 Z-10+14、KA- 28+6、KA-31+8、Z- 8+4、淘汰 MI-8	8354(+30) <b>99A2+30</b>	5298 <b>ZBL-09+200、</b> <b>ZBD-08+100、</b> 淘汰 86、92
2014	<b>916(+86)</b> <b>Z-10+30、</b> <b>Z-19+36、Z-8+39、</b> <b>MI-171+45、</b> 淘汰 Mi-17、Z-9、 SA-321、S-70	7663(-691) 96A+200、99+140、 淘汰 59、ZTD-05	<b>8152(+2854)</b> 首見 <b>ZTL-09+200、</b> <b>ZBD-04A+250、</b> <b>86+650、89+1150、</b> <b>ZBL-09+100、</b> <b>92B+550、</b> 淘汰 05
2015	<b>992(+76)</b> <b>Z-10+30、Z-19+12</b> <b>Z-8B+8、MI-171+26</b>	7363(-300) 96A+50、淘汰 59	<b>9222(+1070)</b> <b>ZBL-09+400、</b> <b>63+750、</b> 淘汰 59
2016	<b>1069(+77)</b> <b>Z-10+10、Z-19+40</b> <b>Z-8B+24、H225+3</b>	7263(-100) 96A+150、99+150 59+200、淘汰 59、79	9372(+150) <b>ZTL-09+50、</b> <b>ZBL-04A+100</b>
2017	1110(+41) 首見 <b>Z-18+1、</b> <b>Z-9D+1、</b> <b>Z-10+20、Z-19+20、</b> <b>Z-8B+4、</b> 淘汰 Mi-26	7463(+200) <b>96A+300、99+100</b> 淘汰 59	9672(+300) 首見 <b>ZBD-05+300、</b> <b>ZTL-09+150、</b> <b>ZBL-09+100、</b> 淘汰 ZBD-04A
2018	1131(+21) <b>Z-8B+20、</b> <b>AS365+7、</b> <b>Z-9D+11、Z-9S+2、</b> <b>KA27PS+3、</b> 淘汰 KA-28、Z-9C	7464(+1) 首見 <b>ZTQ-15+1、</b> 無淘汰	9762(+90) <b>ZTL-11+30、</b> <b>ZBL-08+60、</b> 升級 <b>ZTL-11</b>
2019	1161(+30) <b>Z-10+30</b>	6325(-1139) ZTQ-15+100、 淘汰 59、62、63	10092(+330) <b>ZTL-11+200、</b> <b>ZBL-04A+500、</b> <b>ZBL-08+700、</b> <b>ZSL-10+500</b> 淘汰 63、ZBL-11

2020	1173(+12) 首見 Z-20+12、 升級成 Z-18AEW	6273(-52) 99A+250、 ZTQ-15+100、 淘汰 59	<b>11314(+1222)</b> <b>ZTL-11+172、</b> <b>ZBD-04A+500、</b> <b>ZBD-08+300、</b> <b>ZBD-05+300、</b> 淘汰 ZBL-08
2021	1200(+27) 首見 Z-8C+5、 Z-18+4、Z-8L+6、 Z-20+12	6073(-200) 99A+100、 ZTQ-15+50、 淘汰 59	<b>12364(+1050)</b> <b>ZTL-11+150、</b> <b>ZBD-04A+400、</b> <b>ZBD-08+50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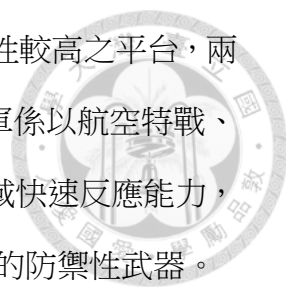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參考自 IISS（2012-2021）。

綜上所述，中共陸軍無論直升機、裝甲車自 2012 年以來每年都有快速成長現象，其中直升機 2013 至 2016 年間同時有大於 4%數量成長及質量的快速成長，2017 至 2021 年則有升級裝備服役、整體數量未減少的質量增長，顯示 2013 至 2021 年間每年都有快速增長情形。裝甲車也與直升機類似，2012 至 2021 年除了整體數量成長超過一倍之外，每年也至少有升級裝備入列，其中 4 年同時有超過 4%以上數量成長與升級裝備入列，可見直升機及裝甲車是數量與質量增長方面都有明顯軍備競賽情形。主戰車方面則因數量大幅減少而在數量上沒有快速成長跡象，但因每年都有 96、99 式等升級裝備服役，且部分年份整體數量並未減少，故仍有少數年份符合質量快速增長定義，整體戰力不減反增。

表 2-9：中共陸軍軍備競賽情形

年份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3	新	質	質
2014	數、質		數、新、質
2015	數、質		數、質
2016	數、質		質
2017	新、質	質	新、質
2018	質	新、質	質
2019	質		質
2020	新、質		數、質
2021	新、質		數、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整體而言，中共陸軍發展主要聚焦直升機及裝甲車等機動性較高之平台，兩者自 2013 年起每年在數量或質量都有快速成長，可見中共陸軍係以航空特戰、立體進攻、全域機動方向進行現代化，此將強化共軍在周邊區域快速反應能力，且明顯具有向外投射的攻擊性質，而非純粹用於自身國土防衛的防禦性武器。

## 陸、小結

綜觀上述，中共陸軍的 2 種裝備自 2012 至 2021 年間同時有數量及質量上快速成長，僅主戰車淘汰較多老舊裝備，但因大量發展直升機、具強大機動性之裝甲車，而有明顯對外攻擊企圖。中共海軍方面則是以驅逐艦的軍力增長情形最為嚴重，每年同時具大額數量及質量方面的快速成長，航母也在 10 年間從無到 3 艘，噸位及裝載量不斷升級也屬於數量及質量上的快速成長，上述兩種裝備的快速發展凸顯中共海軍有意朝遠洋獨立作戰能力方向提升，以增加在遠離中國周邊區域的作戰能力，而非單純用於「近海防禦」的防禦性質。中共空軍方面，3 種機型都有質量快速增長跡象，其中 2 種機型 2013 至 2021 年間在整體數量上也有快速增長情形，已超出現代化範疇，是軍備競賽最為嚴重軍種，且聚焦發展轟炸機、預警機、匿蹤戰機等具攻擊性質之空中平台，明顯具有遠距打擊考量。中共火箭軍方面，除 2015、2017 年外，每年都有數量快速增長或新型裝備服役，已符合快速增長定義，且所新增飛彈集中於中遠程彈種，亦突出共軍對地、對艦等攻擊需求。上述可見共軍各軍種都有特定裝備符合質量或數量快速成長定義，且各軍種新增武器都是朝可在海外運用的更大型、更快速、更大火力、更遠距投射的攻擊性武器，而非僅限國土防衛的防禦性武器。

最後，在國防預算方面，除 2016 年外，其餘年份都有超過 4% 及超過 GDP 成長率的成長，顯示多數年份都有超越正常現代化的異常增長，符合軍備競賽的定義。上述數據將於後續章節與印太 6 國軍備增長情形做比較，並據此判斷印太 6 國是否受共軍軍力增長刺激，導致印太區域出現軍備競賽現象。

表 2-10：中共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火箭軍
2013	有	戰	兩、驅	直、主、裝	洲、短
2014	有	轟、預	兩、潛、驅	直、裝	中
2015	有	戰、轟	驅、巡	直、裝	
2016		戰、轟、預	驅、巡	直、裝	中
2017	有	戰、預	兩、驅、巡	直、主、裝	
2018	有	戰、轟	兩、潛、 驅、巡	直、主、裝	洲
2019	有	轟、預	驅、巡	直、裝	中
2020	有	戰、轟、預	兩、潛、驅	直、裝	洲、中、短
2021	有	轟、預	兩、潛、驅	直、裝	洲、中、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備註：武器裝備名稱代表該年度出現超過 4% 的數量成長、整體數量未減少進行升級換代的質量成長、新裝備服役其中一種情形，符合快速增長定義。

## 第二節 習近平上任後對外政策及作為的 日趨強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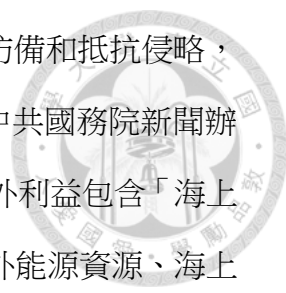
本節將分別從 2012 年以來的共軍國防戰略及在印太區域軍事活動之變化，分析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共對外政策如何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不斷擴大對外軍力投射範圍，並令印太國家日益感受到威脅。

### 壹、中共官方文件中的對外政策變化

本段將從共軍 2012 年以來官方國防政策中的現代化目標、海外利益定義、軍事改革內涵、對印太區域威脅之描述等面向，突出習近平上台後所呈現之外擴傾向，以及中共正當化自身軍事現代化之說詞為何缺乏說服力。

#### 一、共軍以捍衛國家利益之名包裝急速東擴野心

中共最新國防報告書提及「始終不渝奉行防衛性國防政策」、「無條件不率先使用核武」、「反對恃強凌弱」、「反對以武力相威脅」等防衛性立場，且建軍係為建設「同國際地位相稱」之軍隊，並願「履行國際義務與責任」，以「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看似共軍係以被動防禦為主，且積極為國際和平做出貢獻。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共軍不斷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中共在 2017 年十九大報告更新「國防三步走」戰略為「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2050 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2017)，2021 年「十四·五」規劃中更新增「2027 年建軍百年奮鬥目標」為「打造高水平戰略威懾和聯合作戰體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2021)，顯示共軍現代化具急迫性，力圖在 2027 年前達到一定程度聯合作戰能力，無法等到 2035 才達到國防現代化，顯然非出自於被動防禦、正常軍事現代化之目的，反而需要在短期內達成特定擴張目標。



此外，共軍也不斷擴大對海外利益之解釋，從 2011 年「防備和抵抗侵略，保衛領陸、內水、領海、領空的安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 等較防衛性的國防目標，2013 年開始明確定義海外利益包含「海上護航、撤離海外公民、應急救援」等海外行動，以利保障「海外能源資源、海上戰略通道及海外公民安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2015 年在上述基礎補上「為建設海洋強國提供戰略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2019 年再加上「彌補海外行動和保障能力差距，發展遠洋力量，建設海外補給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表明共軍任務範圍從東亞擴大到全球，國防任務也從「捍衛自身領土安全」擴大至「保護海外國家利益」，甚至可以在海外設置軍事基地，同時反映 2012 年以來共軍軍事部署更加強調向外擴張，逐步提升至服務國家戰略的層次，而非僅限防守自身勢力範圍。

## 二、共軍軍改強化海、空軍地位及指管效率

共軍 2015 年進行大規模軍事改革，並對外宣傳共軍裁軍 30 萬人，試圖降低國際中國威脅認知；然其中裁員目標大多為文工等非戰鬥人員(歐貝素，2015：71-73)，裁掉冗員後戰力反而不減反增。此外，共軍藉由此次軍改形成 1 個軍委、5 個軍種、5 大戰區的軍事體制，移除原先軍區行政、訓練、指揮、後勤、採購、動員等工作，使戰區只負責統合戰區內各軍種投入作戰，反而有助確立共軍「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分工型態(陳嘉生，2016：28-32)，更有效強化指管效率，為未來先發制人行動打下制度基礎。

與此同時，共軍 2012 年首次有空軍出生的許其亮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有助共軍拋棄過往的「大陸軍主義」，將陸軍地位首次降至與其他軍種平起平坐，並突出海、空軍地位(Lin，2016)，以利做到光靠陸軍無法達成的維護海洋安全利益目標，充分顯示共軍外擴企圖。

若從中共國防白皮書中對海、空軍任務描述變化亦可看出共軍外擴趨勢，在海軍方面，2015 年國防白皮書有提到「近海防禦」字眼，2019 年就再也沒提到



「近海」概念，反而聚焦強調「遠海作戰演練」，並多次強調「航母編隊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開展遠海作戰訓練」（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2019），反映中共海軍已從「近海防衛」向「遠海防衛」轉變，且從單純防衛及訓練演變為作戰導向，同時預示中共海軍未來將持續在上述區域加強常態軍事存在，已有明顯外擴趨勢。

空軍方面，中共 2011 及 2013 年國防白皮書提到「防空反導」、「偵察預警」等防衛性措施（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2013），顯示捍衛國土領空安全仍是當時空軍主要任務；然自 2015 年首次提及「由國土防空轉向攻防兼備」，2019 年進一步提及加強「體系化、實戰化全疆域訓練」，並組織空軍兵力「南海戰巡、東海警巡、前出西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2019），凸顯中共空軍 2012 年以來已從單純在自身領土進行防空作戰，擴大至西太、東海、南海等地的實戰訓練，警戒任務範圍不斷向外擴大，且不再強調自我防衛性質，也不避諱在官方文件中提及，其中甚至包含攻擊性質，具有明顯外擴情形。

上述顯示共軍不斷透由提升海、空軍地位強化兩軍之裝備，較以往更加強調「走出去」之能力，並以「實戰化演練」之名不斷合理化自身海、空軍外擴行為，亦反映習近平下的共軍更加著重向外擴張。

### 三、中共對印太威脅描述更加具體及強硬

2012 年以來中共國防白皮書對印太區域的安全威脅描述也逐年更加清晰且用詞強硬。針對東海及南海部分，2011 年國防白皮書僅提到中共「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壓力增大」（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2012 年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後，2013 年就直接點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2017 及 2019 年又分別提到「中日在東海存在釣魚島問題和海域劃界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及共軍「在東海釣魚島海域進行巡航，是依法行使國家主權」，並分別於 2015、2019 年批評日本「積極謀求擺脫戰後體制，大幅調整軍事安全政策」、「謀求突破『戰後體制』，軍事

外向性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5、2017、2019), 突出中共對釣魚台的所有權, 並加大對周邊國家安全政策的干涉力度。

與此同時, 中共在 2015 年前並未直接提及南海爭議, 直到 2015 年首度言及「個別海上鄰國在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採取挑釁性舉動, 在非法佔據的中方島礁上加強軍事存在。一些域外國家也極力插手南海事務」, 2017 年宣稱將對「蓄意挑起事端破壞南海和平穩定的挑釁行動」做「必要反應」, 2019 年則進一步宣示「南海諸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及「中國在南海島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部署必要的防禦性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5、2017、2019), 除明確證明中共在南海面臨安全威脅逐年升高外, 亦提到具體反制作為及其正當性, 回應力度更加強硬。

針對兩岸部分, 國民黨執政時期的 2011、2013、2015 年國防白皮書僅提到「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仍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1、2013、2015), 且多為幾句話、篇幅不多, 但 2019 年卻以兩大段、共約 450 字妄稱「民進黨當局在台獨道路上越走越遠」, 已成為「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 共軍對此已「組織繞島巡航, 對台獨勢力發出嚴正警告」, 並「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未來共軍針對「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將「不惜一切代價, 堅決予以挫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9)。此外, 習近平繼 2019 年於《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場合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 2021 年更以讓台獨份子「接受歷史審判」、「粉碎台獨」等字句恫嚇台灣民眾(伍逸豪, 2021), 凸顯中共除對台回應篇幅大幅增加外, 用詞上亦更加強硬。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國防白皮書原本不會點名特定國家, 2013 年也僅以「有的國家深化亞太軍事同盟, 擴大軍事存在, 頻繁製造地區緊張局勢」批評美國, 但 2015 年直接點名美國, 稱「美國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 強化其地區軍事存在和軍事同盟體系」, 2019 年再批判「美國嚴重破壞地區戰略平衡, 加大

軍事部署和干預力度，給亞太安全增添複雜因素」，並「嚴重損害地區國家戰略安全利益」(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2019)，除不避諱直接點名外，篇幅增加及批判言詞更加嚴厲，顯示中共對美態度日加強硬。此外，中共亦在 2019 年首度點名澳大利亞，宣稱「澳大利亞持續鞏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強化亞太地區軍事參與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皆顯示中共對外力介入日漸強硬的立場。

#### 四、小結

整體而言，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官方報告中的國防戰略出現 3 種變化。首先，不再堅守被動防禦策略，而更加強調先發制人概念，其中包含海軍向「遠海護衛」、空軍朝「區域戰巡」的轉變。其次，更加著重以海外利益包裝擴軍企圖，因此強化海、空軍地位，以做到陸軍無法做到的對外擴張目標。最後，中共對東海、南海、台海等區域的威脅認知已較以往遽增，對特定國家威脅描述皆較以往更明確、強硬，並因 2027 建軍百年目標而更具急迫性。由此可見中共官方戰略已較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前更具外擴趨勢，並增加主動性、向全球延伸現象。然而，中共擴大解釋海外利益定義、具體化外部威脅僅是為自身勢力擴張尋找藉口，並合理化自身軍事現代化作為，反而突出習近平擴大對周邊區域控制及強勢改變現狀之企圖，進而造成印太區域局勢更加惡化。

表 2-11：中共國防報告中的外擴內容

基本軍事戰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新增「2027 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li> <li>— 軍改優化共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li> <li>— 國防任務從捍衛領土安全擴大至保護海外國家利益</li> </ul>
海空軍發展規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著重提升海、空軍地位</li> <li>— 海軍從近海防衛轉向遠海護衛</li> <li>— 空軍從國土防空轉向區域戰巡</li> </ul>
印太威脅評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點名日本擺脫戰後體制、在釣魚台製造事端</li> <li>— 指出鄰國非法佔據南海島礁、域外國家挑起南海事端</li> <li>— 妄稱台獨已成台海和平穩定最大現實威脅</li> <li>— 宣稱美、澳強化亞太軍事干預，破壞亞太穩定</li> </u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貳、中共對外更為強硬姿態及作為

本段將藉接續探討共軍在東海、南海、台海、印中邊界、全球範圍等方向的實際擴張作為，突出 2012 年習近平上任後共軍如何逐步擴大在各區軍事存在及控制，進而對印太國家構成威脅。

### 一、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擴大共軍活動範圍

針對東海方面，自 2012 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台後，中共也於同年發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並派遣公務船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日本防衛省，2013：8）。2013 年 11 月中共更宣布成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日本、台灣、南韓的防空識別區重疊，並將釣魚台納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2013），擴大共軍活動範圍。此後，2016 年 1 月共軍軍機首度飛越日本海（日本防衛省，2017：8）、2021 年 10 月中俄軍艦首度共同穿越日本本島和北海道間的津輕海峽及九州島附近的大隅海峽（陳品潔，2021），不斷擴大在東海軍事存在，並分別於同年 2、9 月施行《海警法》、更新《海上安全交通法》，規定進入中共領海須通報中共，且賦予中共執法機關向不明船隻開火權力（中共人大網，2021a、b），反映習近平上任後，中共不斷增加軍事存在擴大對東海控制，同時逐步建立在東海區域動武之法律基礎，增加釣魚台爆發衝突風險。

### 二、在南海大規模填海造陸及軍事化作為

針對南海方面，中共亦於 2012 年 7 月設立三沙市，將南沙群島的地位提升至地級市，負責管轄西沙、中沙、南沙等包含南海爭議島礁的區域，並於 2013 年頒布《海南省沿海邊防治安管理條例》，賦予中共公務船對外國船隻登船盤查、扣押、驅逐等權利（中華民國國防部，2013：48），以及在 2020 年 4 月設立西沙、南沙 2 個市轄區（中共民政部，2020），成立下轄行政單位、擴大執法權限，強化中共管轄依據。另一方面，中共自 2013 年開始在華陽礁、永暑礁、南薰礁、東門礁、赤瓜礁、美濟礁、渚碧礁等地展開填海造陸工程，建造港口及機場跑道

設施，並相繼部署飛彈、雷達、防空設施、轟炸機，期間更多次以「海軍巡弋，海巡驅離外船，海上民兵佔領」模式，派遣公務船盤查外國漁船、干擾外國鑽油平台探勘工作、派遣機艦驅離外籍艦船（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17-19；US DOD, 2019a: 52-54; 2020a: 59-76），藉此強化中共 2016 年宣布不承認南海仲裁案結果的政治立場。上述顯示習近平上任後，中共以單邊立法、填海造陸、增加執法力度等方式，強化在南海軍事存在及事實管轄權，且較以往更加強勢，不惜干擾、破壞他國民間捕魚、探勘油氣等活動。

### 三、對台日益密集軍事騷擾

針對台海方面，中共自 2016 年因民進黨上台後不斷加大對台軍事威嚇力度，頻繁派遣機艦進行「繞島巡航」（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38），2020 年 9 月首度派遣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12 月首度進入台灣東南空域，2021 年侵入共機架次亦由 2020 年 380 次暴增至 961 次（羅添斌，2022），2022 年 8 月圍台軍演後更常態化跨越台海中線（陳政錄，2022），不斷擴大軍機擾台範圍，逐步擴大在台海周邊區域的常態軍事存在。此外，中共透由 2018 年 1 月逕自啟用 M503 航線、2020 年 9 月外交部首度公開宣稱不存在海峽中線、2022 年 6 月宣稱台灣海峽非國際水域等方式（Cole, 2020; 呂嘉鴻，2022），不斷壓縮台灣的空防縱深及預警時間，反映習近平上任後共軍持續擴大共軍機艦在台海周圍區域活動範圍，更加強調以軍事脅迫方式逼迫台灣政府接受中共片面設立的政治前提。

### 四、印中邊界衝突日增

針對印中邊界方面，共軍在 2013、2015、2017、2020 曾 4 度進行軍事挑釁，導致對峙時間從 2013 及 2015 年洞朗 2 次衝突不到 1 個月，到 2017 年洞朗事件暴增至 72 天，2020 年拉達克事件則長達超過 9 個月，且為印中雙方 1967 年以來首次開槍及有人員傷亡，期間中共亦不斷強化邊界軍事部署及基礎建設（US DOD, 2021a: 159-160），顯示共軍在印中邊界較以往更加強勢。此外，中共不斷派遣軍艦進入印度洋，並與斯里蘭卡簽署漢班托塔港 99 年租約（中華民國國防

部，2019：15），有意作為軍事用途，以擴大在印度洋軍事存在，又於 2021 年 10 月通過《陸地國界法》，賦予中共採取「有效措施」強化邊境建設及「防範和打擊任何損害領土主權和破壞陸地國界」，而由於與中共陸地接壤 14 個國家中僅印度未與中共劃定陸地國界或簽署諒解備忘錄（邱國強，2021），<sup>5</sup>此舉旨在藉由國內立法提升中共對印中邊界防衛力度，針對印度意圖明顯。上述凸顯習近平上任後中共企圖如法炮製在東海、南海作法，以單邊立法、增加活動範圍方式破壞印中邊界現狀，力求在印中邊界上鯨吞蠶食，取得實質突破。

## 五、共軍活動範圍逐步外擴至全球

共軍 2012 年來也不斷藉國際維和行動、參與海外演習方式不斷向海外投射軍力，擴大在全球軍事存在及影響力。在海外軍事基地方面，中共 2017 年 7 月在吉布地成立「海軍保障基地」，<sup>6</sup>宣稱將協助共軍執行亞丁灣反海盜任務，成為共軍海外首座軍事基地（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40）。此外，共軍亦規劃在索羅門群島、赤道幾內亞、柬埔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設立軍事基地，引發美、澳、紐等國表達反對（Perry & Rising, 2022），也顯示習近平上任後不斷強化共軍對全球軍事投射能力，且擴張行為係以全球為範圍，而非僅止於印太區域。

在國際維和行動方面，共軍 2012 年首度派遣步兵 50 人進入南蘇丹執行維和任務，2014 年 12 月擴大至步兵營規模，2017 年 5 月更首次派遣直升機分隊赴蘇丹，同年在黎巴嫩等 11 國執行維和任務，成為 2017 年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中派遣最多維和人員的國家，其中包含不同軍警部隊（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41），並自 2015 年起一直維持在至少 8 個國家部署 2,500 人以上維和部隊規模。此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5 年 9 月宣布中共將建立「8,000 人規模維和待命部隊」，並於 2017 年 9 月由中共國防部宣稱完成部署（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38），雖展現中共對國際社會責任，但也凸顯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積極利用維和

<sup>5</sup>不丹雖然也尚未與中共劃定陸地邊界，但已於 2021 年 10 月與中共簽署諒解備忘錄。

<sup>6</sup>共軍宣稱吉布地僅為支援中共海外維和、反海盜、撤僑等任務之後勤保障基地，但因持續擴建碼頭及基地設施而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共軍首座海外軍事基地。

等名義，讓共軍在全球進行部署，藉機向海外投射軍力。

在海外演習方面，共軍自 2012 年以來，除 2013、2015 年外，每年都有至少 10 場海外軍演活動，除與俄羅斯「海上聯合」、印度「攜手」、「上海合作組織」、「和平使命」等例行性軍演外，中共 2014 至 2016 年期間首度與泰國空軍、馬來西亞陸軍、新加坡海軍、柬埔寨海軍等國展開聯合軍演，甚至在此期間二度獲邀參加由美國主導之「環太平洋」海上聯合軍演（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40），不斷強化與周邊國家之軍事互動。此外，中俄之間軍演合作規模及活動範圍同時也不斷在擴大，其中共軍 2018 年 9 月派遣 3,200 人參加「東方演習」，創下兩國軍演最大規模，2019 年 7 月首度在波羅地海與俄軍軍演（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15），2021 年兩國海軍更首度共同繞行日本一圈（陳品潔，2021），顯見共軍無論是軍演合作國家、參演規模、活動範圍，2012 年習近平上任以來都有擴大趨勢，不斷藉機強化在印太區域軍事存在及影響力。

最後，在軍備輸出金額方面，雖然 2016 至 2020 年較 2011 至 2015 年軍武輸出金額下降 7.8%，但仍是全球第 5 大武器出口國，僅次於美、俄、法、德，全球軍武市占率達 5.2%（SIPRI, 2021b: 2-7）。中共軍武輸出以亞洲、非洲國家為主要市場，其中出口至巴基斯坦、緬甸、孟加拉等 3 國占 63.4%，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奈及利亞、摩洛哥、蘇丹等非洲國家占 19.1%（China Power Team, 2018）。在軍售裝備方面，主要為主戰車、防空飛彈、潛艦、預警機、無人機、長征系列火箭等裝備為主，包含空軍 JF-17 戰鬥機及運-8 運輸機、海軍 054A 巡防艦及 035 型潛艦、陸軍 ZSL-92 型裝甲車，以及彩虹無人機（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38；China Power Team, 2018），顯示中共除了出售陸、海、空武器裝備，也藉由提供運載火箭支援相關國家衛星發射需求，擴大在全球軍備及政治影響力。

## 六、小結

整體而言，中共在習近平上任後實際軍事作為方面有 4 種外擴跡象。首先，共軍不斷擴大海、空軍在周邊區域活動範圍及頻率，對鄰國加大軍事威脅，企圖

藉此製造有利中共之既成事實。其次，藉設立防空識別區、地級市、填海造陸、新建村莊、啟用民航機航線等多元方式建立行政管轄權，以擴大自身控制範圍並破壞現狀，強化中共主權主張。再者，利用新增或更新國內法建立中共軍警單位管轄及動武基礎，以利增加中共可運用之反外力介入之手段及正當性，無視區域國家主權聲索，並嚇阻他國挑戰自身主權主張。最後，透過國際軍演、參與維和、對外軍售等方式，強化在全球軍事存在及影響力，將中共軍力投射至全球範圍。綜上所述，中共無論在東海、南海、台海、印中邊境都有具體外擴趨勢，甚至也不斷加強自身在全球軍事存在及影響力，手段不僅侷限在軍事、範圍也不僅侷限在印太，亦顯示習近平上任後中共已成為一個更具威脅的政權。

**表 2-12：中共軍事行動中的外擴趨勢**

東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2 年發布釣魚台白皮書</li> <li>－2013 年成立東海防空識別區</li> <li>－2021 年公布《海警法》、更新《海上安全交通法》</li> <li>－期間不斷擴大在日本周圍機艦活動範圍</li> </ul>
南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2 年設立三沙市</li> <li>－2013 年開始填海造陸工程</li> <li>－2016 年開始在島礁上部署飛彈、轟炸機，否認仲裁結果</li> <li>－2020 年設立西沙、南沙 2 個市轄區</li> </ul>
台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7 年開始派遣機艦進行「繞島巡航」</li> <li>－2018 年逕自啟用 M503 航線</li> <li>－2020 年首度派遣軍機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宣稱不存在海峽中線</li> <li>－2021 年進一步提高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頻率及架次</li> <li>－2022 年進行環台軍演、機艦常態化跨越台海中線</li> </ul>
印中邊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3、2015、2017、2020 年曾 4 度發生邊界軍事衝突</li> <li>－2021 年通過《陸地國界法》</li> <li>－期間不斷擴大在印度洋軍事存在</li> </ul>
全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2015 年宣布建立 8,000 人規模維和待命部隊</li> <li>－2017 年在吉布地成立首座軍事基地</li> <li>－2018 年起擴大中俄軍演規模及範圍</li> <li>－2020 年軍武輸出占全球軍武市場 5.2%，為全球第 5 大武器出口國</li> </u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第三節 印太國家對中共之威脅認知

本節將說明印太 6 國官方如何看待 2012 年以來共軍快速現代化及對外強硬作為，是否有明確威脅認知及依照自身力量抵禦共軍威脅之意圖，進而構成軍備競賽威脅認知條件，並以 2012 年以來印太國家與中共間的緊張關係作為輔助，說明雙邊關係惡化如何加深印太國家對中共之威脅認知。

#### 壹、各國官方文件對中共威脅認知

本段將先從印太 6 國重要官方文件，主要為國防白皮書，以及重要官員言論中分析該國是否對中共軍力增長具明顯威脅認知，該威脅認知是否逐年增長，且有以發展自身軍備方式反制之意圖。

##### 一、共軍超越北韓成為日本最大安全威脅

日本雖然自 2013 年以來每年都在防衛白皮書中提及對中共軍費「不透明」及以武力改變現狀的擔憂，呼籲中共「遵守國際法」，然而亦可從中得知中共對日本威脅正在逐年增加。首先，2013 年以來日本的首要外在威脅皆為北韓，威脅排序都在中共前面，然自 2019 年中共首度排在北韓前面（日本防衛省，2019：7-9），且自 2012 年起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起飛攔截中共軍機次數超過俄國後，除了 2014 年之外，至 2020 年為止皆為入侵日本領空次數最多的外國（日本防衛省，2021：25），中共海軍艦船 2013 年至 2020 年期間每年入侵日本鄰接區至少 600 艘，2019、2020 年甚至超過 1,000 艘，企圖改變釣魚台海域現狀（日本防衛省，2021：18），凸顯日本以往多以俄羅斯、北韓為主要威脅，但近年共軍對日本的安全威脅程度已超越上述國家。

此外，2014 年以來日本每年都提到對中共在東海及南海軍事活動之擔憂，尤其關切共軍海上、空中、飛彈、核武、太空、網路、電磁等領域的急速發展已

拉大與日本自衛隊的差距（日本防衛省，2021：17-18），2019 年更首度大篇幅提及兩岸局勢，除往年常提的「兩岸軍力失衡」外，補充蔡總統上台後中共對台軍事及外交施壓日增（日本防衛省，2019：7），並於同年稱中共「灰色地帶攻擊」威脅日本安全（日本防衛省，2019：17），反映中共對日本威脅更加多元且正逐年增加，不限於共軍對日本領土本身或海、空安全方面。

對此，日本自 2013 年以來每年都有提到要加強西南軍事部署，相繼提到要在那霸基地新增 1 個飛行隊、部署包含兩棲突擊車在內的水陸機動團、增加西南島嶼陸上警戒部隊<sup>7</sup>等（日本防衛省，2014：10；2017：18；2019：17；2020：14），涵蓋陸、海、空三軍，日本航空自衛隊 2021 年 11 月更考慮在宮古島市的下地島及宮古機場、石垣市的新石垣機場、與那國島的與那國機場等 4 處興建備用軍用機場，以分散遭中共摧毀風險，其中下地島僅距離釣魚台 200 公里（楊明珠，2021），顯示日本 2012 年以來除了意識到共軍威脅外，也採取具體作為回應中共威脅，符合軍備競賽中「意識威脅、抵抗威脅」的定義。

## 二、共軍灰色地帶威脅加重台灣防衛壓力

基於兩岸歷史緣故，台灣一向視共軍為最大威脅，並連續在 2013、2015、2017 年國防白皮書中提到共軍為最大軍事威脅（中華民國國防部，2013：57；2015：46；2017：32）、兩岸軍力正快速失衡（中華民國國防部，2017：32）。2019、2021 年更指出共軍藉強化陸軍機動作戰及立體攻防、海軍近海防禦及遠海作戰、空軍空中打擊及遠程巡航、火箭軍飛彈戰略威懾、戰略支援部隊聯戰指管等戰力，迄已具備封鎖台灣海空交通路線、攻擊台灣本島任何目標、三軍立體登陸、遲滯外軍在第二島鏈內行動等能力（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34-54），使其對台安全威脅晉升為構成「嚴峻挑戰」及「衝擊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40、44；2021：34、54）。此外，2021 年更新增包含機艦擾台、網路戰、以爭議訊息為主的認知作戰等 3 種灰色地帶威脅（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41-

---

<sup>7</sup>主要在奄美大島、宮古島、石垣島。

44)，顯示共軍在各軍種戰力全面提升增加對台灣生存威脅外，近年更積極以非武力的手段對台「開戰」，逐年壓縮台灣防衛空間，並增加對台軍事壓力。

對此，台灣政府自 2013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即開始提到組建一支具有「創新/不對稱」、能執行「高效聯合戰力」、支援「遠距精準接戰」的精銳國軍，包含可兼顧「空中截擊、聯合防空、基地防護」的空軍、具備「快速部署、遠距打擊」的海軍、強調「立體化、數位化、自動化、特戰化」的陸軍，以應對中共「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之威脅」(中華民國國防部，2013：25-40)。2019 年國防白皮書也重申要組建「機動、價廉、量多、快速生產、具可耗性之不對稱戰力」，以「嚇阻中共武力犯台」(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44)，2021 年國防白皮書提及以「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為軍事戰略，運用「小型、高速、機動」載台「攻擊或利用敵人之弱點及擾亂敵人作戰重心」(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62-63)，並「與理念相近國家積極合作」，以應對共軍日益增加的軍事威脅。上述反映台灣國防報告中自 2012 年以來每年都認知到共軍威脅，並以反制共軍威脅作為建軍方向，符合軍備競賽中「意識威脅、抵抗威脅」的定義。

### 三、共軍印中邊界挑釁作為已成印度最大安全威脅

印度國防部每年都會發表「年度報告書」(Annual Report) 闡述其國家面臨威脅及建軍規畫，雖然以往多以巴基斯坦及中東恐怖主義為主要威脅來源(MOD of India, 2018: 2-5)，且自 2018 年迄今並未再公布新的英文版「年度報告書」，但近年仍可以透過印度重要官員言論得知印度政府安全重心之轉變及對中共安全威脅之提升。首先，2013、2014 兩個年度都僅提到「意識到並密切關注中共在印度周邊軍事存在及基礎設施，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建立反制能力」(MOD of India, 2013: 7; 2014: 6)，然仍強調與中共舉行「年度印中防務對話」、「攜手聯合演習」等內容。然而，印度 2015 年起開始提到中共在印中邊境有「更強勢巡邏」行動 (MOD of India, 2015: 18)，2016 年則指「中巴經濟走廊挑戰印度主權」，並重申「南海是印度 55%貿易流經之地」，要求各方遵守國際法、避免非和平手段解決

爭議 (MOD of India, 2016: 4-5)，2017、2018 年更分別針對洞朗及拉達克的對峙情勢強調中共「好戰」、「越過邊境次數增加，顯示中共聲索主權作為更加強勢」(MOD of India, 2017: 18-19; 2018: 21-22)，反映印度對共軍威脅認知的提升。

此外，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在 2020 年 12 月稱共軍「違反雙邊協定的行為，極大程度地破壞雙邊關係」，導致印中關係「處於 30 至 40 年來最艱難階段」(康世人，2020)，而印度國防參謀長拉瓦特 (Bipin Rawat) 2021 年 11 月也表示中共是當前「印度最大安全威脅，遠大於巴基斯坦」(Patranobis, 2021)，顯示印度 2013 年以來都意識到共軍對印中邊界所構成威脅，且隨印中邊境衝突增加而在措辭上更加強烈。

對此，印度除表示將嚴密監視共軍動態、與中共對話、採取必要措施捍衛印度主權之外，也自 2015 年開始提到「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重申印度在印太區域利益，並將與美國「合作確保印太自由航行與海洋安全」(MOD of India, 2015: 3-4; 2017: 2-5)，顯示印度 2013 年以來都有針對中共安全威脅加強在印太軍事存在之作為，同樣符合軍備競賽中「意識威脅、抵抗威脅」的定義。

#### 四、共軍向南太擴張軍力壓縮澳大利亞防禦縱深

雖然澳大利亞傳統上並無立即安全威脅，以往多以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帝汶等區域局勢及反恐為主要安全考量 (NIDS, 2016: 39-41)，但從澳大利亞 2013、2016 的國防白皮書及在 2020 年發布《2020 國防戰略更新》中可發現澳國政府對印太區域的重視及對中共威脅意識的提升。

首先，2013 年國防白皮書主要論及共軍在潛艦、網攻能力、反艦飛彈、第五代戰鬥機、航母、反潛、反太空武器領域大幅增長，並在南海等重要海上貿易線的軍事存在可能會壓縮澳國的防禦縱深 (NIDS, 2013: 14-30)。2016 年則提到對美中角力可能在東海、南海、太空等地爆發衝突的擔憂，並批評中共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軍費不透明、在南海島礁填海造陸等作為，重申澳國反對單邊性作為及任何違反國際法主張，同時提及亞洲國家軍事支出總和在 2014 年超過歐洲恐

讓澳大利亞喪失軍事優勢，且部分國家甚至具備長程精準打擊能力，將使東南亞成為敵人可能進犯澳國的方向（NIDS, 2016: 40-61），明確表明對印太區域局勢的重視。《2020 國防戰略更新》除再度提及美中大國競爭對印太安全的變數外，也提到中共在南海軍事化、爭議訊息、干預他國內政、經濟脅迫等方面「灰色地帶活動」（NIDS, 2020: 5），明顯是指中共破壞印太區域穩定的作為對澳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也反映澳大利亞已從擔憂中共軍事能力增長進化至現實的安全威脅，且上述安全威脅也從較遠的南海，不斷向澳大利亞本土靠近。

對此，澳大利亞早在 2013 年就提到要建立具有「主動打擊能力」的戰力，並在必要時「協助東南亞盟友及美國的行動」（NIDS, 2013: 23-31）。2016 年則指出需發展「反飛彈及反潛能力」，以反制對「澳國本土及國家利益之威脅」，並對亞洲安全做出貢獻（NIDS, 2016: 49-75），上述言論明顯針對中共。2020 年提出「走進太平洋」倡議（Pacific Step-up），預計將在 2030 年之前將國防預算增加到 7,370 億澳幣，並在 10 年內投入 2,700 億澳幣在國防裝備上，以強化遠距打擊、網路攻擊、全球部署能力，並快速反制危害澳國利益的行為（NIDS, 2020: 7-22）。此外，澳國也在 2021 年 9 月與美、英成立「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AUKUS），規劃共同建造 8 艘核子動力潛艦，並在量子科技、網路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李靖棠，2021），上述作為雖未明言針對中共，但都明顯為反制共軍擴張之舉。

整體而言，在官方表態方面，澳大利亞都未直接指明中共，而是以間接方式點名共軍威脅，但澳國在 2013、2016、2020 年的官方文件中都有對共軍明確的威脅認知及抵禦威脅意圖，且逐年增強中，故 2013 年以來澳大利亞官方對中共都符合軍備競賽「意識威脅、抵抗威脅」的定義。

## 五、共軍強勢南海作為升高越中衝突風險

越南官方近年僅在 2009、2019 年發布國防白皮書，且雖然也有與柬埔寨、寮國的邊界衝突及國內反革命威脅，但共軍安全威脅排序較前面，並有增強趨勢（MOND of Vietnam, 2019: 15-20）。2009 年國防白皮書僅以未點名中共方式提到

「越南東海（我稱南海）領土爭議局勢更加複雜」，並「嚴重影響海洋經濟發展」（MOND of Vietnam, 2009: 15-18），但也提到「越中之間在東京灣的爭議已解決」，且越中之間有定期防務對話、《南海行為宣言》也即將形成行為準則（MOND of Vietnam, 2009: 17-26），雖然認知到中共威脅，但當時並未直接點名中共，也未見強硬言詞。然而，越南在 2019 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批評中共在越南東海單邊作為是仗勢欺人、違反國際法、以軍事手段改變現狀、侵犯越南主權，並指越中 2 國越南東海領土爭議是歷史爭議，需「謹慎處理並避免負面影響」（MOND of Vietnam, 2019: 19），凸顯越南官方對中共威脅認知有顯著提升，且用詞更加強烈。此外，報告也提到亞太區域因大國地緣政治競爭、領土爭議形成「有衝突潛力」的區域，甚至具「軍備競賽」風險（MOND of Vietnam, 2019: 11），反映越南官方對印太安全局勢惡化的擔憂也與中共有關。

對此，越南在 2009、2019 年國防白皮書中也有抵禦中共威脅的意圖，其中 2009 年提到越南「反對使用武力但準備堅定反擊任何攻擊」，並要求「越南獨立主權完整被尊重」（MOND of Vietnam, 2009: 19），2019 年除重申反對武力手段及遵守國際法等立場外，也重申越南將防範戰爭，但「準備抵死抵禦領土主權」（MOND of Vietnam, 2019: 23），都隱含越南將以軍事行動捍衛越南對南海主權立場，抵禦中共威脅意圖明顯。雖然越南官方僅在 2009、2019 年公布官方報告，且官員言論並未明顯提及共軍威脅，但因為都有「意識威脅、抵抗威脅」情形，故越南 2019 年後都符合軍備競賽的構成條件。

## 六、共軍超越反恐成為菲律賓「首要安全挑戰」

菲律賓政府近年僅在 2012、2017 年公布「國家安全政策報告」，分別闡述 2012 至 2016 年及 2017 至 2022 年的菲律賓國防政策，另於 2018 年公布菲律賓 2018 至 2022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報告」，從中亦可看出菲國官方報告中的中共威脅變化。首先，「重複的領土及海上主權主張」在 2012 年報告中僅為菲律賓的第二大外部威脅，僅次於「全球及區域地緣政治」，且菲律賓主要安全挑戰仍以

內部反恐為主；但在 2017 年卻變成第一外部威脅，且 2012 年僅提及西菲律賓海爭議只是侵犯菲國專屬經濟海域，2017 年卻變成菲律賓「首要安全挑戰」(Foremost security challenge)(NDD of Philippines, 2012: 11-13; NSC of Philippines, 2017: 12-13)。2018 年「國家防衛戰略報告」除重申上述立場外，再指中共於美濟礁、永暑礁、黃岩島等島嶼填海造陸破壞生態環境、影響漁民生計，更對菲國形成「致命威脅」(NSC of Philippines, 2018: 11-12)。與此同時，前總統艾奎諾三世 2014 及 2015 年曾公開批評中共在南海擴張作為如同納粹德國 (Takenaka, 2015)、杜特蒂 2020 年起多次在聯合國批評中共南海擴權行為。菲律賓在 2017、2018 年官方報告也提到台海及釣魚台局勢為菲國周邊不穩定因素，將影響菲國安全 (NSC of Philippines, 2017: 12-13; 2018: 13)，這 2 處區域熱點都與中共有關，同時反映中共對菲律賓安全威脅不限於南海區域，也擴大至整個亞太區域局勢。

對此，菲律賓官方的反制作為也有明顯升級，2012 年的報告書仍著重提升軍隊專業能力、增強法治觀念、推動軍隊文人化改革，2017、2018 年則提到要建立「海洋感知系統及快速反應能力」(NDD of Philippines, 2012: 29-30; NSC of Philippines, 2017: 7-12; 2018: 45)，明顯針對共軍在南海主權侵犯行為，上述顯示菲律賓在 2014 年後都有明顯抵禦中共威脅意圖。因此，菲國官方報告中 2014 年後皆符合軍備競賽「意識威脅、抵抗威脅」的定義。

## 貳、各國與中共緊張關係

鑒於部分國家在官方文件或官員言論中未明確提及對中共威脅認知，故本段將以印太 6 國與中共的雙邊緊張關係作為輔助，以佐證該等國家與中共存在外交齟齬，因而具備明顯威脅認知及抵抗意圖，尤其針對不常發布國防白皮書之國家。

### 一、釣魚台主權爭議使日中關係更加惡化

日中關係原本就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戰爭道歉賠償及慰安婦等問題結下歷史宿怨，然自 2012 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國有化後，中共一系列強勢反應使得



日中關係逐年惡化。首先，中共立即公布釣魚台白皮書、派遣公務船進入釣魚台 12 海里內、動員保釣人士在大陸境內上街「抗議」等，引發日本政府強烈抗議及兩國關係緊張（日本防衛省，2012：7-8）。中共 2013 年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中共軍機及軍艦不斷加大在日本周圍活動頻率，每年侵入釣魚台鄰接區，並在 2013、2014、2016 年發生兩國軍機或軍艦在東海近距離接觸，甚至以火控雷達相互鎖定（日本防衛省，2015：9；2016：6；2017：7），幾近爆發擦槍走火意外，事後雙方互控對方挑釁，也加深日本對中共威脅認知。此外，中共 2021 年公布《海警法》、更新《海上安全交通法》，意圖加大對日本在釣魚台的法律戰後，同年日本國防白皮書批評此舉違反國際法、加劇東海緊張局勢，強調日本「完全無法接受」（日本防衛省，2021：18），反映日中兩國自 2012 年釣魚台爭議檯面化後，每年都有釣魚台海域的外交衝突，亦更加佐證日本對中共具明確威脅意識。

其次，中共在 2015 及 2017 年國防白皮書都提到關切「日本擺脫戰後體制」，尤其日本在 2013 年創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賦予首相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權力（Williams, 2015: 153-163），並於 2015 年通過《新安保法》，其中「新武力行使三要件」允許日本在沒有遭受攻擊的情況下，可在與日本關係密切且鄰近國家受武裝攻擊、情勢影響國家存亡及危及國民基本權利、為排除威脅無其他合適應對手段 3 條件下，行使最小必要武力。同時新設美日情報分享、太空、網路、軍備防護、搜救、海上作戰、飛彈防禦、後勤支援等領域部隊協調機制，將日本對美軍支援範圍擴大至全球各地（李忠謙，2015），皆引發中共強烈批評日本意圖讓「軍國主義」復甦。與此同時，2012 年以來日本也不斷在其國防白皮書中提到對台海、南海等區域局勢擔憂，更在 2017 年首度派遣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至南海、2021 年多次由首相菅義偉、副首相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防衛大臣岸信夫、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等官員公開表達對台海議題關切，且都遭中共強烈批評（鍾辰芳，2021），也顯示 2012 年迄今日中在區域議題存在重大歧見及外交衝突，強化日本對中共軍事威脅意識。



## 二、中共續以「極限施壓」手法逼迫台灣承認「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在 2010 年因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而較為緩和，並在 2015 年因馬習會、我陸委會主委首度以正式官銜訪問南京而創下兩岸官方接觸最為密切的時刻，因此 2015 年前並未出現較明顯敵意氛圍。然而，自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 2016 年上台後，中共誣稱蔡總統承認 1992 年歷史事實的就職演說為「未完成的答卷」，並自此開始對台一連串文攻武嚇，以逼迫台灣政府接受其所片面設定的政治前提。

在軍事施壓方面，中共自 2017 年 12 月派遣機艦進行「繞島巡航」，2020 年派遣軍機常態性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2021 年提高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區的頻率及架次 (史書華、辜樹仁，2021)，2022 年更劃設 7 個演習區對台試射飛彈，並出動軍機常態化跨越台海中線 (陳政錄，2022)。在經濟施壓方面，中共 2019 年 1 月宣稱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遭蔡總統嚴詞反對後，遂於同年 7 月以兩岸關係不佳為由暫停陸客自由行來台 (中共文旅部，2019)。2021 年中共進一步擴大對台經濟施壓至鳳梨、釋迦、蓮霧等水果，聲稱台灣進口水果中被檢驗出有害生物 (中共海關總署，2021a&b)。在外交施壓方面，中共 2016 至 2019 年期間策動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布吉納法索、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尼加拉瓜等 8 國與台灣斷交，並要求航空公司、跨國企業更改對我稱謂為「中國台灣」，或要求與中共建交國政府更改台灣駐館名稱及遷離首都 (鍾佑貞，2021；黃艾比，2018)。綜上所述，中共自 2016 年起每年都在軍事、外交、經濟等層面打壓台灣，嚴重影響到台灣生存安全，兩岸關係也因此逐年惡化，故台灣亦對中共具明確威脅意識。

## 三、印中邊界衝突不斷發生

印中關係自 1962 年爆發戰爭後就一直未能解決兩國邊界劃定問題，但在 2013 年之前也並未爆發重大衝突。然而，2013 至 2021 年期間就已 4 度發生邊界軍事衝突，且對峙時間由 2013 及 2015 年洞朗兩次只延續不到一個月，暴增至

2020 年拉達克事件 9 個月，並創下雙方 1967 年以來首次開槍及人員傷亡。印度與中共又分別於 2019、2021 年將拉達克劃為中央直轄區（康世人，2019）、通過《陸地國界法》，再度加深兩國邊界緊張及印度對中共的不安全感。

此外，兩國除了邊界問題難解，也在國際場合爆發歧見，包括 2016 年 7 月中共阻止印度進入核供應國集團(NSG)，引發印度強烈不滿(BBC News, 2016)，以及雙方在印度洋共軍活動、中共支持巴基斯坦等議題存在嚴重分歧，顯示印度對中共威脅意識自 1962 年以來一直存在至今，且 2013 年後有持續擴大趨勢，僅 2014、2018 年未見重大衝突事件。

#### 四、澳中外交衝突使兩國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2015 年為澳中關係重要分水嶺，澳大利亞前總理吉拉德（Julian Gillard）曾於 2011、2013 年訪問大陸，習近平亦於 2014 年回訪澳國，並在澳國下議院發表演說，會後雙方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意向書（Griffiths, 2014），雙邊關係堪稱處於黃金時期。然而，澳中關係自 2015 年因澳國政府禁止陸企採購畜牧公司基德曼（S Kidman & Co）及澳國電網公司後開始出現衝突（NIDS, 2019: 17-19），經貿分歧也逐漸擴大至政治層面。澳國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2017 年 6 月公開在香格里拉論壇批評中共「對鄰國施壓且不按照國際法行事」、2018 年 1 月澳大利亞政府以收受中共賄賂罪名逮捕工黨籍參議員鄧森（Sam Dastyari）、6 月通過《外國影響力法》，引發中共外長王毅批評澳國「不應拿有色眼鏡看中共」。同年澳大利亞政府禁止華為及中興參與 5G 投標案，並阻止陸企投標連接巴紐、索羅門群島的海底電纜標案（NIDS, 2019: 18-21），凸顯澳大利亞政府自 2015 年起對中共立場開始轉趨負面，並具明確威脅意識。

上述澳大利亞對中作為也引發中共 2019 年以延緩澳國牛肉及紅酒進口、取消 20 個大陸學校訪澳、警告陸生赴澳風險等方式報復（US DOD, 2019a: 15），2020 年進一步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 80.5%關稅、暫停部分澳大利亞牛肉進口、對澳國葡萄酒展開反傾銷調查（Khalil, 2020），並逮捕澳大利亞公民華人作家楊恆

均、記者成蕾，澳中更因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布澳大利亞軍人殺害阿富汗百姓的推特貼圖而引發兩國網友論戰。對此，澳大利亞並未卻步，持續在新疆、香港、新冠肺炎起源等議題批評中共，並在 2021 年宣布取消維多利亞州與中共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導致中共以暫停澳中戰略經濟對話報復（張詠晴，2021）。2022 年中共與索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亦引發澳大利亞軍方及外交部門反對，澳國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警告中共此舉將造成嚴重後果（Perry & Rising, 2022），且緊張局勢迄今仍未減緩。

整體而言，澳中關係在 2015 年前並未有明確敵意，然自 2015 年後因中共的政經滲透作為引發澳大利亞政府反彈，而中共強勢回應也使雙邊關係惡化，形成惡意螺旋，故 2015 年後澳國對中共威脅認知也逐年強化。

## 五、越中相繼強化南海建設使衝突逐步檯面化

越中關係在 2012 年之前就有南海主權爭議，並已經解決東京灣劃界問題。然而，自中共 2012 年 7 月設立三沙市、2013 年頒布《海南省沿海邊防治安管理條例》後，越南國會隨即通過《越南海洋法》，將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劃入越南的領土範圍（中華民國國防部，2013：35），並於 2015 至 2016 年間開放旅遊團至南沙群島、延長南海島礁跑道、在島礁上部署多管火箭系統（Gady, 2015; Torode, 2016），不斷強化南海軍事部署，明顯為反制中共在南海擴權之作為。

此外，中共自 2013 年起持續在南海填海造陸，海警及漁船也不斷驅離越南漁船、干擾越南油氣探勘活動，導致越南多次與西班牙國家石油公司（Repsol）中止油氣探勘合約（Hayton, 2018），其中中共於 2014、2020 年撞沉越南漁船，引發越南國內反中示威及越南政府向中共提出外交照會。中共自身亦於 2019 年派遣「中國海洋地質 8 號」在越南專屬經濟海域進行探勘活動，遭越南政府提出外交抗議（鍾錦隆，2019；Hutt, 2020），凸顯越南官民皆對中共具明確威脅意識。

越南政府除了外交抗議外，也積極訴諸國際管道捍衛自身主權主張，包含在 2017 年 8 月東協外長會議中要求東協對中共在南海作為應有更強硬立場，導致

中共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外長王毅相繼取消與越南官員會面 (Ives, 2017)，2020 年越南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時亦於 6 月東協高峰會後聯合聲明中首度納入南海「所有海上活動需依據 1982 年國際海洋法執行」之內容，並稱將考慮循菲律賓模式提出南海仲裁 (Pham, 2020; Hutt, 2020)。值得一提的是，越南也在 2018 年開始拉攏美、印等國，除了讓美軍航母自越戰以來首度停靠外，國家主席陳大光亦訪問印度，期間重申支持南海航行自由及印度的東進政策 (Parashar, 2018)，意圖藉由國際平台、拉攏國際力量對抗中共在南海強勢作為，抵禦中共意圖明顯。

綜上所述，越中兩國 2013 年以來每年都在南海主權爭議上出現外交衝突，且彼此都有明確相互反制作為，符合軍備競賽「意識威脅、抵抗威脅」定義。

## 六、南海仲裁案激化菲中主權爭議

菲中關係與越中關係同樣都有南海主權爭議，2012 年來也經歷 2012 年黃岩島事件、2019 年禮樂灘事件、2021 年牛軛礁事件，而三起事件後菲律賓都有具體行動反制，包含黃岩島事件後時任菲國總統艾奎諾三世 (Benigno Aquino III) 簽署行政命令將「南中國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並將新版地圖送交聯合國、禮樂灘事件後菲律賓立即開工延長中業島跑道、牛軛礁事件後分別引發菲國外交部長及總司令公開要求中共「滾出南海」，並稱將在中業島設立後勤樞紐，強化監控南海能力 (Cheng, 2021; Robles, 2021)。除上述大型衝突外，中共自 2013 年起不斷在南海填海造陸，也持續驅趕菲國漁船作業、干擾菲國軍方進行物資運補，如 2021 年仁愛礁事件 (Gomez, 2021)，顯示菲律賓對中共具有強烈威脅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是第一個向國際海牙法院針對南海申請仲裁案的國家，並於 2016 年 7 月獲得有利於菲律賓的宣判結果，中共也於事後宣稱將不承認該判決結果 (中共外交部, 2016)。雖然菲律賓自 2016 年起便由較親中的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 擔任總統，執政期間宣稱「外祖父來自廈門」，因此自己擁有「華人血統」、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趙鑒華面前稱「讓菲律賓成為中國的一省」、公開表示「我愛習近平」，並於 2018 年由菲律賓國家電視台 PTV 引進中國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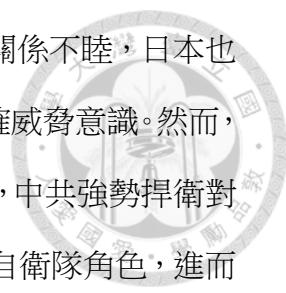
及電視劇，同時首度在 2019 年 1 月迎接共軍 3 艘軍艦訪問馬尼拉、4 月派遣軍艦參加中國主辦的國際閱艦式等（李宗憲，2019），企圖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

然而，菲律賓自 2020 年起卻開始在南海立場對中轉趨強硬，除在 4 月聲援越南漁船遭中共霸凌外，亦在同年 7 月透由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盼中共遵守南海仲裁案結果（Lee, 2020）。杜特蒂更於 9 月 22 日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上首度針對南海爭端指出「荷蘭海牙法院 2016 年對南海爭端仲裁結果已是國際法一部份，不容質疑跟妥協，菲方堅決反對削弱這項仲裁的企圖」（張子清，2020），係菲國在杜特蒂執政下首度公開強調南海仲裁案的效力，後續更在 2021 年「中國東協建立對話關係 30 周年紀念峰會」譴責中共海警干擾菲國軍方對仁愛礁進行運補，聲稱此舉將「不利兩國之間的關係」（陳韋廷，2021），顯見杜特蒂執政下並未在南海主權議題上讓步。

與此同時，菲律賓外交部於 2021 年 4 月表示杜特蒂自 2016 年以來已就南海議題向中共提出 78 次外交抗議（Cheng, 2021），並自 2018 年起在中業島上修建跑道（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19），且菲國亦透由延遲中止美菲《軍隊互訪協定》，讓美軍得以進出菲律賓從事兵棋推演和軍事演習（Garamone, 2021），反映即使杜特蒂言行較親中也未改變菲律賓強硬捍衛主權立場。2022 年新上任的總統小馬可仕也藉由同意美軍擴建在菲軍事基地設施、接待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訪問鄰近南海爭議島礁的巴拉望島，延續堅守南海主權立場（Strangio, 2022）。因此菲中關係自 2012 年以來都符合軍備競賽的「意識威脅、抵抗威脅」定義。

## 參、小結

綜整各國國防報告中對中共威脅描述及與中共外交衝突事件，本文將以官方報告或官員言論明確提及共軍威脅來認定官方對中共具威脅意識，並以兩國之間出現具體外交衝突事件輔助判斷各國是否對中共具威脅意識。若皆無屬於無威脅意識，若有其一則屬較弱威脅意識，若兩者皆有則屬強烈威脅意識，以得出各國



對中共威脅認知程度。首先，日中關係原先就因二戰歷史問題關係不睦，日本也在每年國防白皮書提及對共軍增長的擔憂，已有官方認證的明確威脅意識。然而，兩國關係自 2013 年起因 2012 年的釣魚台國有化事件逐年激化，中共強勢捍衛對釣魚台主權作為也加深日本對中共威脅意識，並引發日本強化自衛隊角色，進而觸發中共更大的反彈。雖然 2018 至 2020 年間較未見到明顯衝突事件，但共軍 2021 年又因在日本周圍活動及若干針對性立法再度引發兩國緊張。因此，2012 年以來除 2018 至 2020 年期間為較低威脅意識外，其餘年份皆屬強烈威脅意識（請見表 2-13）。

兩岸關係部分，基於中共始終不願放棄對台動武，故共軍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的最大外部威脅，但 2016 年之前因中共對馬英九政府較為友善，並未出現較大雙邊衝突事件。然而，2016 年之後中共片面拒絕與蔡英文政府溝通，並不斷透由各種軍事、經貿、外交等手段施壓台灣政府，使兩岸關係逐年惡化，台灣對中共威脅意識也因此自 2016 年起轉為強烈。

印中關係自雙方建政以來就有陸地邊界尚未完成劃界問題，並曾在 1962 年爆發過戰爭，但在 2013 年之前大致平順、未見到重大衝突。然而，印中雙方自 2013 年起陸續爆發 4 次邊界衝突，印度年度白皮書也都有提到對中共邊境強勢作為的擔憂，故 2013 年以來每年都有明確威脅意識，且除 2014、2018 年未出現重大衝突而屬於較弱的威脅意識外，其餘年份都有官方報告認證及實際衝突發生的強烈威脅意識。

澳中關係可以 2015 年為轉捩點，2015 年之前雙方關係融洽到領導人互訪，且並未有重大外交衝突，僅官方報告中表達對共軍增長的擔憂，故 2015 年以前屬於較低威脅意識；然 2015 年之後澳大利亞政府開始意識到中共對澳政經滲透對澳國的威脅，並開始以立法、否決併購案等方式反制，引發中共經貿報復及兩國關係緊張，尤其 2020 年後澳中緊張關係檯面化，兩國間外交衝突也不斷升級，故 2015 年以後皆屬官方認證及外交衝突都有的強烈威脅意識。

越中關係部分，兩國自雙方建政以來就有南海主權爭議，已有明確威脅意識存在，但由於越南 2013 至 2021 年間僅於 2019 年發布國防白皮書，且官方較少發表直接批評中共言論，故僅 2019 年後屬於同時有官方認證及具體外交衝突的強烈威脅意識，其餘年份都屬於較弱的威脅意識。

菲中關係方面，雖然菲律賓政府並未每年公布國防白皮書，但因 2014 年後的官方言論中皆可見對中共具明確威脅意識，加上菲中間持續有南海主權爭議，因此 2014 年後皆屬同時出現官方認證及外交衝突的強烈威脅意識。

整體而言，印太 6 國在 2013 至 2021 年間可至少從官方報告或具體外交衝突事件得知該國對中共不同程度的威脅認知，並構成認定為軍備競賽的先決條件，尤其 2016 年後除了日中關係外，其他國家對中共威脅認知有逐年強化的趨勢，其中 2021 年更是 6 國首度同時對中共抱有強烈威脅意識。

表 2-13：印太 6 國對中共威脅意識一覽表

年分	日中	兩岸	印中	澳中	越中	菲中
2013	強 V/V 東海 ADIZ	弱 V/X	強 V/V 拉達克衝突	弱 V/X	弱 X/V 中填海造陸	弱 X/V 申請仲裁案
2014	強 V/V 軍機互鎖	弱 V/X	弱 V/X	弱 V/X	弱 X/V 鑽油台事件	強 V/V 中發布文件
2015	強 V/V 新安保法	弱 V/X	強 V/V 拉達克衝突	強 V/V 否決併購	弱 X/V 越開放旅遊	強 V/V 中否定仲裁
2016	強 V/V 軍機互鎖	強 V/V 邦交國	強 V/V 核子供應國	強 V/V 否決併購	弱 X/V 越部署火箭	強 V/V 仲裁案宣判
2017	強 V/V 釣魚台	強 V/V 機艦擾台	強 V/V 洞朗衝突	強 V/V 總理批中共	弱 X/V 中取消會面	強 V/V 菲外交抗議
2018	弱 V/X	強 V/V 邦交國	弱 V/X	強 V/V 外國影響法	弱 X/V 越取消探勘	強 V/V 菲外交抗議
2019	弱 V/X	強 V/V 暫停陸客	強 V/V 拉達克劃界	強 V/V 中經貿制裁	強 V/V 中探勘石油	強 V/V 禮樂灘事件
2020	弱 V/X	強 V/V 西南 ADIZ	強 V/V 拉達克衝突	強 V/V 中經貿制裁	強 V/V 中撞沉漁船	強 V/V 總統批中共
2021	強 V/V 海警法	強 V/V 農產品	強 V/V 陸界法	強 V/V 澳取消協議	強 V/V 越外交抗議	強 V/V 牛軋礁事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第三章 印太軍備競賽現象及過程分析

面對共軍自 2012 年習近平上任以來的快速擴軍及強勢作為，印太 6 國相繼以強化自身軍力、擴大軍事結盟等方式進行回應。本章將從 6 國在國防預算及陸、海、空三軍相同武器裝備上的增長情形，分析各國是否與共軍同步出現軍備快速增長現象，以釐清上述國家是否有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並從各國經濟增長情況及軍事外交拓展情形，探討印太軍備競賽是否有進一步惡化。

### 第一節 印太各國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本節將分別從日本、台灣、印度、澳大利亞、越南、菲律賓 6 國於 2012 至 2021 年間的軍備增長情形中，尋找出現國防預算增長率超過 4%、三軍 8 樣主要武器數量年增長率大於 4%、在整體數量未減少情況下升級裝備等現象的年度，藉此說明 6 國各自於何時、在何種領域出現軍備異常快速增長情形，進而構成與中共從事軍備競賽的條件。

#### 壹、日本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日本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日本國防預算從 2012 年 590 億美元下降至 2021 年 492 億美元，其中只有 2016 年因通過《新安保法》及因應中共軍改而成長 12.9%，符合快速成長標準，其餘年份並未出現快速增長情形，顯示日本在軍費支出方面未見明顯軍備競賽的跡象。然而，受到俄烏戰爭影響，日本 2022 年國防預算突破 5.3 兆日幣，2023 年起更規劃逐年增加 1 兆日幣，在 5 年內達到 GDP 占比 2% 目標，續創新高（楊明珠，2022b），未來是否會出現異常快速增長情形仍值得關注。



表 3-1：日本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日本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日本 GDP 成長率	日本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590.77	1.38%	0.99%
2013	487.09(-17.5%)	2.01%	0.95%
2014	476.85(-2.1%)	0.30%	0.90%
2015	411.43(-13.7%)	1.56%	0.94%
2016	<b>464.56(+12.9%)</b>	0.75%	0.94%
2017	460.04(-0.9%)	1.68%	0.94%
2018	470.11(+2.2%)	0.58%	0.95%
2019	482.29(+2.6%)	-0.24%	0.95%
2020	496.53(+2.9%)	-4.50%	<b>1.01%</b>
2021	492.54(-0.8%)	1.62%	0.97%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IMF（2012-2021）。

備註：粗體字部分為國防預算成長率超過 4%或 GDP 占比較高的年份；官方國防預算及 GDP 占比參照指標為 IISS Military Balance 的 Defence Spending in Current US Dollar & Defence Spending % of GDP。

## 二、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日本海上自衛隊是軍備快速增長最明顯的軍種，尤其在航母、潛艦、驅逐艦方面最為明顯。首先，在航母方面，日本航母於 2016 至 2018 年間由 2 艘增加至 4 艘，且在噸位數、酬載飛機數量、飛行甲板面積等方面較前一代的日向級更大，未來將改裝成足以搭載 F-35B 戰鬥機（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21），強化空中打擊能力，在數量及質量上都有快速增長情形。其次，在潛艦方面，日本除 2015 年外皆維持每年新增 1 艘的頻率更新潛艦艦隊，但 2017 至 2021 年間卻有 4 個年度沒有汰除舊型潛艦，導致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18 艘增加至 2021 年 22 艘，2021 年新增的潛艦甚至加裝鋰電池（IISS, 2021: 271），進一步提升潛艦的續航力、降低充電時間，使日本潛艦 2017 至 2021 年間在數量及質量上都符合快速增長定義。在驅逐艦方面，日本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31 艘增加至 2021 年 37 艘，總計建造朝霧級、秋月級、朝日級、摩耶級等 4 型驅逐艦，並將愛宕級神盾系統升級至基線 9 等級（IISS, 2019: 278），提升雷達搜索能力，同時將反艦飛彈由射程

150 公里的 90 式換裝成最大射程達 400 公里的 12 式（郭正原，2022），顯示驅逐艦在 2013 至 2021 年間有質量快速增長跡象，其中 2014 至 2015 年間更同時出現數量及質量快速增長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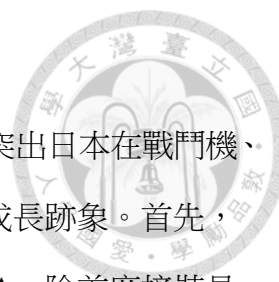


表 3-2：日本海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航母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2	24	18	31	15
2013	2	24	18 蒼龍級+1、 汰除春潮級	32(+1) 秋月級+1	13(-2) 汰除初雪級
2014	2	24	18 蒼龍級+1、 汰除春潮級	34(+2) 朝霧級+1、 秋月級+1	11(-2) 汰除初雪級、 阿武隈級
2015	2	23(-1) 汰除由良級	18	36(+2) 秋月級+2	9(-2) 汰除初雪級
2016	3(+1) 首見出雲級	11(-12) 汰除 LCM	18 蒼龍級+1、 汰除春潮級	35(-1) 汰除白根級	9
2017	3	11	19(+1) 蒼龍級+1	35	9
2018	4(+1) 出雲級+1	11	19 蒼龍級+1、 汰除春潮級	34(-1) 汰除白根級	9
2019	4	11 Yusotei x2 升級成 LCU-2001	20(+1) 蒼龍級+1	35(+1) 首見朝日級 +1(加裝 12 式飛彈)、 升級愛宕級 至基線 9	10(+1) 初雪級+1
2020	4	11	21(+1) 蒼龍級+1	36(+1) 朝日級+1	11(+1) 初雪級+1
2021	4	11	22(+1) 蒼龍級+1 加裝鋰電池	37(+1) 首見摩耶級 +1、愛宕級 升級至基線 9	10(-1) 汰除初雪級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

備註：粗體字表示出現大於 4%數量成長或武器升級換代情形。



### 三、日本航空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日本航空自衛隊裝備的快速成長情形不若海軍明顯，但仍突出日本在戰鬥機、反潛機、預警機都有跨世代的升級，尤其 2018 年後出現快速成長跡象。首先，在戰鬥機方面，日本自 2018 年起開始接裝第五代戰鬥機 F-35A，除首度接裝具備匿蹤能力的戰鬥機外，在雷達探測距離、聯合作戰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跨世代升級(林泰和, 2017: 24-25)，且 2018 至 2021 年間的戰鬥機數量亦未有重大減少，故上述期間符合質量快速增長定義。在反潛及預警機方面，日本於 2014、2020、2021 年分別引進 P-1 反潛機、E-2D 預警機、RC-2 電子偵察機等新機種，但整體數量由 2014 年 157 架下降至 137 架，故屬於更新換代範疇，未見快速增長跡象。

表 3-3：日本航空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348	168
2013	340(-8) 汰除 F-15J、F-4E	155(-13) U-125A Peace Krypton+2 Shin Meiwa US-2+2、汰除 P-3C
2014	340	157(+2) 首見 P-1+2
2015	353(+13) 修復 F-2A/B+16、汰除 F-4E	155(-2) P-1+5、汰除 P-3C、U-125A
2016	348(-5) 汰除 F-4E	154(-1) 汰除 Shin Meiwa US-2
2017	347(-1) 汰除 F-4E	148(-6) P-1+2、汰除 P-3C、US-1A
2018	332(-15) 首見 F-35A+4、 汰除 F-15J、F-2A/B、F-4E	147(-1) P-1+3、汰除 P-3C
2019	337(+5) F-35A+5	151(+4) P-1+4
2020	338(+1) F-35A+3、F-15J+12、F-2A/B+3 汰除 F-4E	148(-3) 首見 E-2D+1 P-1+6、汰除 P-3C、RF-4E

2021	335(-3) <b>F-35A+5</b> 、汰除 F-4E	137(-11) 首見 <b>RC-2+2</b> E-2D+3、P-1+2、US-2+1 汰除 P-3C、RF-4E、US-1A
------	------------------------------------	--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四、日本陸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日本陸上自衛隊是軍備競賽現象最不明顯的軍種，僅 2019 年後的裝甲車有較明顯軍備競賽現象，整體數量由 2018 年 982 輛暴增至 2021 年 1,143 輛，每年都有超過 4% 快速成長，且新增車型聚焦於 16 式機動戰鬥車、AAV-7 兩棲突擊車，其中 16 式機動戰鬥車重量僅 26 噸，可放入日本 C-2 運輸機中快速投放至離島，亦因輪型甲車特性使其最高時速可達到 100 公里，預計將納入新的快速反應聯隊 (IISS, 2020: 241-242)，兩種車型大幅強化日本裝甲車機動性，且明顯用於對抗共軍對日本沖繩縣離島的威脅，故 2019 至 2021 年的日本裝甲車在數量及質量上都有顯著的軍備競賽跡象。

直升機雖然有新型訓練用直升機 TH-480B 服役及 SH-60 反潛直升機升級，但因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611 架下降至 2021 年 525 架，僅屬於小規模現代化範疇。主戰車則置重於增加 10 式主戰車，然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806 輛下降至 2021 年 580 輛，亦僅屬現代化範疇。

表 3-4：日本陸上自衛隊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611	806	974
2013	616(+5) 首見 <b>TH-480B+10</b> MCH-101+3、 UH-60J+1、EC135+6、 <b>SH-60B 升級成 K</b> 、 汰除 MH-53、 SH-60、AW-101	777(-29) Type-10+13、90+8 汰除 Type-74	987(+13) Type-96+13
2014	617(+1) EC135+2、 汰除 AH-1S	777	1023(+36) Type-87+50、96+20 汰除 Type-73、82

2015	622(+5) OH-1+12、CH-47+2、 UH-60+1、 <b>TH-480B+20</b> 、 升級成 <b>SH-60K</b> 、 汰除 AH-1S、OH- 6、SH-60、MH-53	688(-89) Type-10+13、淘汰 74	1022(-1) Type-87+12、96+22 淘汰 Type-74、82
2016	589(-33) AH-64+1、H225+1、 MCH-101+1、H135+3、 汰除 AH-1S、OH- 6、UH-60、MH-53	688 Type-10+14、淘汰 74	1026(+4) 首見 <b>BIMV+4</b> Type-96+11 汰除 Type-73、82
2017	585(-4) AH-64+1、UH-60+5、 MCH-101+2、 升級成 <b>SH-60K</b> 、 汰除 AH-1S、OH- 6、CH-47、MH-53	690(+2) Type-10+13、淘汰 74	982(-44) 首見 <b>AAV-7+4</b> Type-96+8 汰除 Type-82、87
2018	601(+16) CH-47JA+13、 SH-60K+2、AW101+1、 升級成 <b>SH-60K</b>	690	982
2019	599(-2) 汰除 UH-60、 AH-64 墜毀	667(-23) Type-10+10、淘汰 74	<b>1022(+40)</b> 首見 <b>Type-16+36</b> 、 <b>BIMV+4</b>
2020	561(-38) AH-64+1、OH-1+4、 UH-60+2、 升級成 <b>SH-60K</b> 、 汰除 AH-1S、OH-6、 CH-47、SH-60、UH-1	617(-50) 淘汰 74	<b>1073(+51)</b> <b>Type-16+51</b>
2021	525(-36) 升級成 <b>SH-60K</b> 、 汰除 AH-1S、OH-6、 CH-47、SH-60、UH-1	580(-37) Type-10+23、淘汰 74	<b>1143(+70)</b> <b>Type-16+22</b> 、 <b>AAV-7+48</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貳、台灣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台灣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台灣國防預算變化大致可以 2017 年為分水嶺，2017 年以前曾出現連續 4 年下降情形，但台灣政府自 2016 年起陸續啟動新型教練機、國造潛艦、天弓三型防空飛彈、雄風三型反艦飛彈等新型裝備建造計畫，並向美採購 F-16V 戰鬥機、M1A2 主戰車及多種空對地飛彈、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等遠距打擊武器（中華民國國防部，2021：62-63），使台灣國防預算由同年 99 億美元暴增至 2021 年 162 億美元，增長幅度達 63.6%，平均每年漲幅超過 12%。其中 5 年間就有 4 個年度增長率超過 4%，尤其 2020 年後更為因應共軍機艦擾台而連續兩年超過 15%，凸顯台灣國防預算 2016 年後出現明顯異常快速增長情形，且有持續惡化趨勢。

表 3-5：台灣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台灣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台灣 GDP 成長率	台灣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104.52	2.22%	2.21%
2013	103.21(-1.3%)	2.48%	2.09%
2014	101.26(-1.9%)	4.72%	1.92%
2015	100.07(-1.2%)	1.47%	1.91%
2016	99.02(-1.0%)	2.17%	1.87%
2017	<b>104.29(+5.3%)</b>	3.31%	1.82%
2018	<b>108.64(+4.2%)</b>	2.79%	1.79%
2019	110.10(+1.3%)	3.06%	1.80%
2020	<b>138.67(+25.9%)</b>	3.36%	2.18%
2021	<b>162.14(+16.9%)</b>	6.28%	2.06%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IMF（2012-2021）。

### 二、台灣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台灣海軍是三軍中軍備競賽情形最不明顯的軍種，4 種主要武器裝備數量都大致維持 2012 年規模，僅潛艦及巡防艦安裝新型飛彈、新增 3 艘巡防艦，但都沒有連續快速增長情形，故 2012 至 2021 年間沒有明顯軍備競賽現象。然而，2022 年之後恐將有大量新型艦艇服役，會否達到快速增長標準仍值得關注。

表 3-6：台灣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15	4	4	22
2013	15	4	4	22
2014	13(-2) 汰除中正、 中海	4	4	22 成功級加裝雄風 三型飛彈
2015	13	4 海龍級升級可 發射 UGM-84L	4	22
2016	13	4	4	23(+1) 首見迅海+1
2017	13	4	4	23
2018	9(-4) 汰除中海	4	4	21(-2) 汰除濟陽級
2019	9	4	4	23(+2) 成功級+2
2020	9	4	4	23
2021	9 玉山艦下水	4	4	23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三、台灣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台灣空軍的戰鬥機及反潛機分別在不同時期出現過異常快速增長情形。首先，在預警及反潛機方面，台灣 2014 至 2016 年間陸續新增 12 架 P-3C 反潛機，相較原先 S-2T 反潛機作戰半徑增加 4,000 海浬、滯空時間增加 12 個小時，並因掛載重量增加逾 24,000 公斤，可掛載更多聲納浮標及飛彈，增加搜索及攻擊範圍（馬煥棟、蔣忠諺，2017：110-116），屬於數量及質量快速增長情形。其次，在戰鬥機方面，雖然台灣仍維持逾 400 架規模，未出現重大變化，但自 2018 年起陸續升級經國號、F-16 型戰鬥機，強化雷達搜索能力、掛載彈藥種類、航電系統等，其中 F-16 雷達更換為主動相位陣列雷達（AESA），搜索範圍增加 30% 以上，並可同步進行搜索及追蹤，使台灣戰鬥機能「看得更遠，打得更遠」（郭宏達等人，2021：59-62），符合整體數量未減少、作戰能力大幅提升的質量快速增長定義。

表 3-7：台灣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418	38
2013	418	38
2014	416(-2) F-16A/B、Mirage2000-5 墜毀	26(-12) 首度 P-3C+1、汰除 S-2T
2015	416	<b>29(+3)</b> <b>P-3C+3</b>
2016	416	<b>37(+8)</b> <b>P-3C+8</b>
2017	415(-1) F-16 A/B 墜毀	37
2018	414(-1) <b>F-CK-1A/B 升級成 F-CK-1C/Dx71</b> Mirage2000-5 墜毀	26(-11) 全數汰除 S-2T
2019	412(-2) <b>F-CK-1A/B 全數升級成 F-CK-1C/D</b> F-16 A/B 墜毀、IDF 召回	26
2020	412 首見 <b>F-16A/B 升級成 F-16Vx4</b>	26
2021	411(-1) 汰除 F-5E <b>F-16A/B 持續升級成 F-16V</b>	26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四、台灣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台灣陸軍是軍備競賽最明顯的軍種，尤其是在直升機及裝甲車方面。首先，在直升機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258 架增加至 2019 年 320 架，增幅達 24.0%，期間每年在數量不減少情況下陸續新增阿帕契(AH-64E)攻擊直升機、黑鷹(UH-60M)運輸直升機等新機種，尤其阿帕契同時搭載毫米波雷達及 16 枚地獄火(AGM-114)空對地飛彈，可獨立搜索目標並增加對地攻擊彈藥數量，黑鷹直升機也因空中載運量提升，強化台灣人員及物資快速移動能力(中華民國國防部，



2017：62-63），反映直升機 2012 至 2019 年間出現整體數量未減少、新型或升級裝備仍不斷增加的質量快速增長情形。此外，裝甲車自 2013 年起陸續新增超過 400 輛新型雲豹裝甲車，使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1,461 輛增加至 2021 年 1825 輛，增長幅度達 24.9% 之外，雲豹裝甲車也因超過 100 公里極速、數位化作戰系統，大幅提升台灣陸上作戰武器的機動性（孫銘鴻，2017：13-18），故裝甲車 2012 至 2019 年亦出現數量未減少、新裝備持續服役的質量快速增長現象。由於新服役的直升機及裝甲車大幅強化台灣陸軍在多道路、多河川地形作戰機動性，明顯為反制共軍對台登陸作戰，故具抵禦中共軍事威脅之目的。

表 3-8：台灣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258	1420	1425
2013	260(+2) 首見 EC-225+3、 汰除 S-70C	1420	1461(+36) 首度 CM-32+36
2014	267(+7) 首見 AH-64E+6、 AH-1W+6、汰除 UH-1H	1190(-230) 汰除 M-24	1497(+36) CM-32+36
2015	286(+19) AH-64E+23、 汰除 CH-47、S-62A	1190	1533(+36) CM-32+36
2016	294(+8) 首見 UH-60M+8	1190	1655(+122) CM-32+122
2017	298(+4) UH-60M+4	1190	1695(+40) CM-32+40
2018	298	1190	1695
2019	320(+22) UH-60M+22	1190 美方出售 M1A1x108	1695
2020	239(-81) UH-60M+11 汰除 UH-1H、S-70C	665(-525) 汰除 M41A3	1793(+98) CM-32+98
2021	238(-1) UH-60M 墜毀	665	1825(+32) 首見 CM-34+32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

## 參、印度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印度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印度國防預算從 2012 年 409 億美元暴增至 2021 年 650 億美元，成長幅度達 58.9%，平均增長速度超過 4%，其中有 5 個年度單獨出現超過 4% 的快速成長，僅 2015 年有輕微衰退情形，故 2012 至 2021 年間都符合軍備競賽現象的條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軍費於 2013、2015、2017 年的印中邊境衝突後一年都出現至少 7.9% 以上異常快速增長，顯示印度是受到共軍威脅驅動而增加軍事支出。

表 3-9：印度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印度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印度 GDP 成長率	印度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409.86	5.46%	2.25%
2013	418.96(+2.2%)	6.39%	2.12%
2014	<b>452.12(+7.9%)</b>	7.41%	2.12%
2015	448.43(-0.8%)	7.99%	2.15%
2016	<b>514.53(+14.7%)</b>	8.26%	2.27%
2017	524.94(+2.0%)	6.80%	2.15%
2018	<b>578.30(+10.2%)</b>	6.45%	2.13%
2019	<b>607.94(+5.1%)</b>	3.74%	2.12%
2020	<b>641.38(+5.5%)</b>	-6.60%	2.47%
2021	650.79(+1.5%)	8.95%	2.21%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IMF（2012-2021）。

### 二、印度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印度海軍是軍備競賽最為明顯的軍種，尤其是在航母、潛艦、驅逐艦等裝備同時出現數量及質量快速增長情形。首先，在航母方面，印度已從 2012 年 1 艘增加至 2022 年 2 艘，其中新服役的維克拉瑪蒂亞號（Vikramaditya）及剛下水的國產維蘭特號（Vikrant）皆由原本 2,8000 噸的維拉特號（Viraat）增加至超過 4 萬噸，艦載機也由原本只有次音速能力的 AV-8 海獵鷹戰鬥機晉升為具備超音速、多功能打擊能力的 MIG-29 戰鬥機（IISS, 2015: 249），且最新型的國產航母維蘭特號預計部署在印度東南方的沿海城市拉姆比里（Rambilli），由於這座新基地面



向孟加拉灣，顯然是為應對日益頻繁出現在印度洋的共軍威脅，而非傳統勁敵巴基斯坦（IISS, 2015: 219），使印度海軍航母 2012 年以來都有快速增長跡象。其次，在驅逐艦方面，印度 2012 至 2017 年間共新增 4 艘驅逐艦，包含首度搭配閃電 8 型防空飛彈的加爾各答級（Kolkata）。2022 年更新增搭載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艦飛彈的維沙卡帕特南級驅逐艦（Visakhapatnam），防空飛彈射程從僅 10 公里的閃電 1，增加至射程達 100 公里的閃電 8 防空飛彈，反艦飛彈也由原本次音速的俱樂部反艦飛彈，晉升成具備超音速能力的布拉莫斯反艦飛彈（IISS, 2022: 267），顯示驅逐艦在 2012 至 2017 年間同時出現數量及質量快速成長情形。

印度在潛艦及巡防艦方面軍備競賽情形雖然不若驅逐艦明顯，但在部分年份也有快速增長跡象。在巡防艦方面，印度 2012 年以來新增 7 艘新型艦艇，但卻陸續淘汰舊型艦艇，僅 2013、2014 年因新增搭載布拉莫斯反艦飛彈及俄製無風 1 型防空飛彈的塔爾瓦級（Talwar），使印度巡防艦射程從 10 公里增加至 45 公里（IISS, 2020: 272），而在 2012 至 2014 年間具數量及質量上的快速增長情形。在潛艦方面，印度自 2019 年起首艘彈道飛彈核潛艇殲敵者號（Arihant）服役，搭載射程超過 700 公里的 K-15 彈道飛彈，使印度海軍首度具潛射核打擊能力，且連續 2 年新增自法國購入的鮭魚級柴電潛艦，除了原先基洛級具備的俱樂部型潛射反艦飛彈外，又增加一型搭載飛魚潛射反艦飛彈的潛艦（IISS, 2019: 268），反映印度 2019 年後在潛艦也出現快速增長情形。上述海軍裝備的大型化、遠距打擊化凸顯印度反制共軍在印度洋威脅的意圖，顯非為了對抗巴基斯坦威脅。

表 3-10：印度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航母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1 Vikrant 續建	11	15	10	13
2013	1 Vikrant 續建	11	15	<b>11(+1)</b> <b>Shivalik+1</b>	<b>15(+2)</b> <b>Talwar+2</b>
2014	1 Vikrant 續建	10(-1)	14(-1) 基洛級失事	11	<b>16(+1)</b> <b>Talwar+1</b>
2015	<b>2(+1)</b> <b>Vikramaditya+1</b> Vikrant 續建	10	14	<b>12(+1)</b> 首見 <b>Kolkata+1</b>	16 Kamotra+1 汰除 Nilgiri
2016	2 Vikrant 續建	10	14	<b>13(+1)</b> <b>Kolkata+1</b>	16
2017	1(-1) 汰除 Viraat Vikrant 續建	10	14	<b>14(+1)</b> <b>Kolkata+1</b>	16 Kamotra+1 汰除 Godavari
2018	1 Vikrant 續建	9(-1)	14	14	16 Kamotra+1 汰除 Godavari
2019	1 Vikrant 續建	9	<b>16(+2)</b> 首見 SSBN <b>Arihant+1</b> 、 <b>Kalvari+1</b>	14	16
2020	1 Vikrant 續建	9	<b>17(+1)</b> <b>Kalvari+1</b>	13(-1) 汰除 Rajput	16
2021	1 <b>Vikrant</b> 下水	9	16(-1)	13	<b>17(+1)</b> <b>Kamotra+1</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三、印度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印度空軍是軍備競賽情形最不明顯的軍種，僅 2013 至 2016 年間在預警機及反潛機方面有較明顯的快速增長情形，新增包括美製 P-8I 反潛機及巴西製 EMB-145 預警機，較原先的 Tu-142、Do-228 反潛機增加合成孔徑雷達及紅外線感測器，擁有更大搜索範圍及更遠的航程（羅振瑜，2020：13-20），預警機數量亦由

2 架增加至 5 架 (IISS, 2012: 246; 2022: 270)，顯示印度強化應對共軍潛艦及空中威脅之能力。在戰鬥機方面，雖然印度自 2012 年以來大量由法製颯風 (Rafale) 戰鬥機、國產光輝 (Tejas) 戰鬥機取代舊型的米格系列戰鬥機，並新增超過 100 架 Su-30MKI，使印度空軍戰鬥機有跨世代升級，但因整體數量由 2013 年 824 架下降至 2021 年 710 架，屬更新換代範疇，快速增長跡象較不明顯。然而，印度 2018 年規劃採購 80 套 S-400 型防空飛彈 (IISS, 2019: 231)，加上開始接裝颯風、光輝等新型戰鬥機，逐漸開始出現快速增長的現象，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表 3-11：印度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784	28
2013	<b>824(+40)</b> Su-30MKI+41、 升級成 MIG-29UPG、汰除 MIG-21	29(+1) 首見 EMB-145+1
2014	826(+2) Su-30MKI+6、 汰除 MIG-21、MIG-27	30(+1) 首見 P-8I+1
2015	848(+22) Su-30MKI+15、MIG-29+7	<b>36(+6)</b> P-8I+4、EMB-145+1、A-50+1
2016	844(-4) Su-30MKI+10、首見 Tejas+1 汰除 MIG-21、MIG-27	<b>38(+2)</b> P-8I+3、汰除 Do-228
2017	759(-85) Su-30MKI+10、Tejas+1、MIG-29+14 汰除 MIG-21、MIG-27、AV-8A	39(+1) EMB-145+1
2018	785(+26) Su-30MKI+15、MIG-23+20、 Jaguar+16、汰除 MIG-27	35(-4) 汰除 Tu-142
2019	756(-29) Tejas+7、 汰除 MIG-20、MIG-21、MIG-27	35
2020	719(-37) 首見 Rafale+4、Tejas+7、 Su-30MKI+13 汰除 MIG-21、MIG-23、MIG-27	35

2021	710(-9) <b>Rafale+9</b> 、Su-30MKI+8 汰除 MIG-23、MIG-27、MIG-29	35
------	---	----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



#### 四、印度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印度陸軍快速增長裝備主要集中在主戰車及裝甲車方面，自 2016 年起，主戰車數量由 2015 年 2,874 輛增加至 2021 年 3,640 輛，大多為 T-90S 型主戰車，較原本的 T-72 型主戰車在攻擊能力上新增新型穿甲彈及遙控砲塔、防禦能力上增加新型複合裝甲及光電主動干擾系統、動力系統上換裝新型引擎，使馬力由 780 匹進步至 1,130 匹（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編輯群，2016），在數量不減少情況下持續換裝下一代的主戰車，符合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定義。此外，裝甲車由 2016 年 1,901 量暴增至 2019 年 3,436 輛，大量增加現有 BMP-1、BMP-2 數量，使印度裝甲車 2016 至 2019 年間在數量上出現快速增長情形。最後，在直升機方面，印度自 2020 年起開始大量新增美製 AH-64E、國產樓陀羅（Rudra）等攻擊直升機及 CH-47F 重型運輸直升機，反映印度有意增加空中對地攻擊及投射兵力能力，且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695 架增加至 2021 年 873 架，在數量不減少情況下持續新增新型攻擊及運輸直升機，導致 2020 年後直升機出現質量快速增長情形。鑒於印中間有領土主權爭議且近年時常爆發邊境越界衝突，印度陸軍新增的直升機、主戰車、裝甲車類型皆為可強化應對高山邊境環境的裝備，故上述裝備有利於印度應對共軍邊境威脅，該等裝備的快速增長亦符合軍備競賽的定義。

表 3-12：印度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695	3,233	1,901
2013	711(+16) Mi-17+6、Dhruv+10	3,274(+41) <b>T-90S+41</b>	1,901
2014	<b>802(+91)</b> 首見 <b>Rudra+2</b> Mi-17+62、 Dhruv+48 汰除 SA316B	2,874(-400)	1,901
2015	833(+31) <b>Rudra+1</b> 、Mi-17+39、Dhruv+10、 汰除 Ka-25	2,874	1,901
2016	841(+8) Mi-17+50、 Dhruv+20 汰除 Mi-8、SA316B	2,974(+100) <b>T-90S+100</b>	1,901
2017	842(+1) Mi-17+1	3,024(+50) <b>T-90S+50</b>	<b>2,836(+935)</b> <b>BMP-1+700、</b> <b>BMP-2+695</b>
2018	862(+20) Mi-8+25、 汰除 Mi-26	3,097(+73) <b>T-90S+75、</b> 汰除 Arjun	2,836
2019	795(-67) Rudra+3、Ka-31+2 汰除 Mi-8、Sea King	<b>3,565(+468)</b> <b>T-72M1+468</b>	<b>3,436(+600)</b> <b>BMP-2+600</b>
2020	<b>848(+53)</b> 首見 <b>AH-64E+8、</b> <b>CH-47F+4</b> Rudra+47、 汰除 Mi-17、 SA316B	3,565	3,436
2021	873(+25) <b>AH-64E+14、</b> <b>CH-47F+11</b>	3,640(+75) <b>T-90S+75</b>	3,436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肆、澳大利亞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澳大利亞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澳大利亞國防預算變化可大略分為兩個時期。2012 至 2015 年間減少約 50 億美元，處於連年下降的時期。然而，2015 年澳大利亞前首相滕博爾上台後一改前朝對中政策，並宣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NIDS, 2019: 18-21)，澳國國防預算便自 2016 年開始出現上升趨勢，至 2021 年期間由 220 億美元增加至 343 億美元，漲幅達 55.7%。其中有 5 個年度成長率超過 4%，尤其 2018 年因同時新增 F-35 戰鬥機、P-8A 反潛機、霍巴特 (Hobart Class) 級驅逐艦等新型裝備而成長 28.1%，僅 2019 年因經濟成長趨緩出現低於 4% 的成長率，已非單純軍事現代化，故 2015 至 2021 年間都構成軍備競賽現象的條件。

表 3-13：澳大利亞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澳大利亞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澳大利亞 GDP 成長率	澳大利亞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270.99	3.78%	1.76%
2013	245.35(-9.5%)	2.21%	1.54%
2014	225.12(-8.2%)	2.56%	1.38%
2015	220.34(-2.1%)	2.31%	1.79%
2016	<b>236.17(+7.2%)</b>	2.70%	1.87%
2017	<b>249.63(+5.7%)</b>	2.38%	1.80%
2018	<b>319.73(+28.1%)</b>	2.77%	2.25%
2019	299.12(-6.4%)	1.99%	2.16%
2020	<b>314.18(+5.0%)</b>	-2.18%	2.31%
2021	<b>343.06(+9.2%)</b>	4.69%	2.13%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 二、澳大利亞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澳大利亞海軍自 2015 年以來在兩棲突擊艦、潛艦、驅逐艦上都有快速成長跡象。首先，雖然澳大利亞仍維持現有 6 艘柯林斯級柴電潛艦，但自 2016 年起宣布將以 12 艘新型潛艦取代，未來潛艦數量將較以往多一倍，2021 年更轉向美、英採購核子動力潛艦，並將搭載巡弋飛彈，增加對地攻擊能力，戰力具有跨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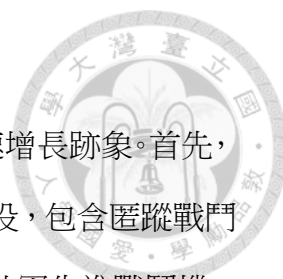


的升級 (IISS, 2017: 247; 2022: 228)。其次，在驅逐艦方面，澳大利亞海軍 2018 至 2021 年間由 0 艘快速增加至 3 艘，並首度搭載神盾雷達系統、標準二型防空飛彈、戰斧巡弋飛彈，除具備更強偵蒐、防空能力外，更首次具備對地攻擊能力 (IISS, 2018: 242; 2022: 228)，使澳大利亞驅逐艦 2018 年後在數量及質量上都符合快速增長定義。再者，在兩棲突擊艦方面，澳國以 3 艘新型坎培拉級兩棲攻擊艦取代原先托布魯克級重型登陸艦，搭載能力由原本 40 輛裝甲車及 500 人增加至 8 架直升機、100 輛裝甲車及 1,000 人 (IISS, 2014: 224; 2016: 233)，大幅強化澳國海軍遠距打擊能力，2015 至 2017 年間已符合數量未減少、武器升級換代的質量快速成長定義。上述大型化、遠距打擊化趨勢凸顯澳大利亞反制共軍企圖，而非應對周邊安全威脅。

表 3-14：澳大利亞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2	6	0	12
2013	2	6	0	12
2014	2	6	0	12
2015	<b>3(+1)</b> 坎培拉級+1	6	0	12
2016	2(-1) 汰除 Tobruk 級	6 採購 12 艘潛艦	0	11(-1) 汰除 Adelaide 級
2017	<b>3(+1)</b> 坎培拉級+1	6	0	11
2018	3	6	<b>1(+1)</b> 首見 Hobart 級+1	11 訂購 3 艘亨特級
2019	3	6	<b>2(+1)</b> Hobart 級+1	11
2020	3	6	2	8(-3) 汰除 Adelaide 級
2021	3	6 採購潛艦改成 核子動力	<b>3(+1)</b> Hobart 級+1 神盾雷達升級成 基線 8.1	8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三、澳大利亞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澳大利亞空軍也在 2015 年以後開始在戰鬥機方面出現快速增長跡象。首先，在戰鬥機方面，澳國 2016 至 2020 年間每年都有新型戰鬥機服役，包含匿蹤戰鬥機 F-35A 及具電子干擾能力的 EA-18G 電子作戰機，顯為對抗共軍先進戰鬥機，且整體數量未減少，符合質量快速成長定義。此外，在反潛機方面，澳大利亞亦自 2018 年連續 4 年新增 P-8A 反潛機，搜索範圍較原先 P-3C 擴大 30%（羅振瑜，2020：13-15），但僅 2018 至 2021 年間整體數量未減少而符合快速增長定義。

表 3-15：澳大利亞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95	25
2013	95	25
2014	95	24(-1) 汰除 AP-3C
2015	95	24
2016	97(+2) 首見 F-35A+2	22(-2) 汰除 AP-3C
2017	98(+1) 首見 EA-18G+1	22
2018	110(+12) F-35A+1、EA-18G+11	26(+4) 首見 P-8A+5、汰除 AP-3C
2019	117(+7) F-35A+7	28(+2) P-8A+2
2020	120(+3) F-35A+6、 汰除 F/A-18A、EA-18G 墜毀	19(-9) P-8A+4、汰除 AP-3C
2021	100(-20) F-35A+14、汰除 F/A-18A	20(+1) P-8A+1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

### 四、澳大利亞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澳大利亞陸軍在軍備快速增長方面不若海空軍明顯，除主戰車裝備未見重大變化外，直升機及裝甲車亦僅在部分年份出現零星異常增長情形。首先，在直升

機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170 架下降至 2021 年 152 架，期間增加 MH-60R、CH-47F、NH90、Bell 429 等反潛及運輸機種，其中僅 2016 及 2017 年出現新機種服役的快速增長跡象。其次，在裝甲車方面，澳國在 2013、2018 年引進霍克死亡蛇、拳師犬等新型裝甲車，在機動性、防地雷等方面具明顯升級（李思平，2018），且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1,475 輛增加至 2020 年 1,805 輛，2013、2020 年更單獨出現超過 4% 成長，僅 3 個年度未有新裝備服役，整體符合快速成長定義。

表 3-16：澳大利亞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170	59	1475
2013	165(-5) CH-47D+1、 汰除 Sea King Mk50A	59	<b>1688(+213)</b> <b>M113+88、Bushmaster</b> <b>IMV+125</b>
2014	164(-1) MRH-90+7、 汰除 S-70B、S-76	59	1688 <b>Bushmaster IMV+263、</b> 汰除 M113
2015	168(+4) 首見 MH-60R+4	59	1684(-4) 汰除 ASLAV-25
2016	169(+1) <b>MH-60R+11、CH-47F+5、</b> <b>NH90+8、Bell 429+1、</b> 汰除 AS350BA、S-70B	59	1679(-5) 汰除 Bushmaster IMV
2017	<b>177(+8)</b> <b>MH-60R+9、NH90+5、</b> <b>H135+1、</b> 汰除 Bell 206	59	1704(+25) <b>Bushmaster IMV+25</b>
2018	176(-1) H135+14、 汰除 S-70B、AS350BA	59	1714(+10) 首見 <b>Hawkei+10</b>
2019	153(-23) 汰除 Bell 206	59	1726(+12) <b>Hawkei+12</b>
2020	152(-1) NH90+3、汰除 429	59	<b>1805(+79)</b> 首見 <b>Boxer CRV+1、</b> <b>Hawkei+78</b>
2021	152	59	1805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伍、越南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越南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越南國防預算由 2012 年 33.55 億美元暴增至 2021 年 63.45 億美元，漲幅達 89.1%，平均每年漲幅達近 9%，其中有 8 個年度成長率超過 4%，且期間有 3 個年度出現超過 10% 的高速成長，僅 2015 年因同時與美國、日本、印度簽署國防合作共同願景聲明，在軍事外交方面有所進展而出現低於 4% 的成長率，明顯已非單純軍事現代化，並構成軍備競賽現象的條件。

表 3-17：越南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越南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越南 GDP 成長率	越南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33.55	5.51%	2.43%
2013	<b>39.38(+17.4%)</b>	5.55%	2.52%
2014	<b>42.48(+7.9%)</b>	6.42%	2.49%
2015	38.29(-9.9%)	6.99%	2.00%
2016	<b>40.73(+6.4%)</b>	6.69%	2.02%
2017	<b>43.19(+6.0%)</b>	6.94%	2.00%
2018	<b>47.84(+10.8%)</b>	7.20%	1.58%
2019	<b>52.21(+9.3%)</b>	7.15%	1.59%
2020	<b>57.27(+9.7%)</b>	2.94%	1.68%
2021	<b>63.45(+10.8%)</b>	2.58%	1.73%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IMF（2012-2021）。

### 二、越南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越南海軍 2012 年以來快速增長的武器裝備主要集中在潛艦及巡防艦上，在潛艦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4 年 2 艘連續 4 年增加至 2018 年 8 艘潛艦，共成長 300%，符合數量快速成長定義。此外，整體質量亦由購自北韓的 2 艘 100 噸級南聯級潛艇升級成 3,000 噸級，且武器除了重型魚雷之外，首度配備 3M-54 俱樂部超音速巡弋飛彈，使越南潛艦可同時執行反艦及對地攻擊任務（IISS, 2022: 222-223; 陳亮智，2019：35-38），此等跨世代進步也符合質量快速成長定義。在巡防艦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8 年 8 艘連年成長至 2021 年 12 艘，成長幅度達 50%，

且新增發射俄製 53 型重型魚雷的功能 (IISS, 2019: 315)，符合數量及質量上快速成長的定義。綜觀上述發展，加上 2014 年因新增 2 艘兩棲突擊艦而構成的數量快速增長，越南海軍 2014 至 2021 年間連續 7 年有特定武器裝備在數量及質量上有快速成長跡象，包含強調反艦能力的潛艦、驅逐艦，以及具備兩棲奪島能力的兩棲突擊艦，明顯有強化越南反制共軍在南海擴張的意圖。

表 3-18：越南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6	2	0	9
2013	6	2	0	8(-1) 汰除 BPS-500
2014	<b>8(+2)</b> Nau Dinh 級+2	2	0	8
2015	8	<b>4(+2)</b> 首見河內級+2	0	8 升級 RBU 6000 反潛火箭
2016	8	<b>6(+2)</b> 河內級+2	0	8
2017	8	<b>7(+1)</b> 河內級+1	0	8
2018	7(-1) 汰除 LST-510	<b>8(+1)</b> 河內級+1	0	8
2019	7	8	0	<b>10(+2)</b> Gepard+2 加裝 533mm 魚雷發射管
2020	7	8	0	<b>12(+2)</b> 浦項級+2
2021	7	8	0	12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三、越南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越南戰鬥機整體數量雖然較 2012 年 231 架大量減少，但空軍戰力卻因大量自俄國添購 Su-30MK2 戰鬥機而未減反增，且在 2016 至 2017 年間出現整體數量未減少、升級裝備服役的快速增長情形。首先，越南 Su-30MK2 戰鬥機由 2013

年 16 架增加至 2017 年 35 架，與 Su-27 共同占越南空軍過半數量，不同於 2012 年以 MiG-21、Su-22 為主的機隊。此外，Su-30MK2 戰鬥機的引進使越南空軍主力戰鬥機由第三代晉升至第四代，相較前一代戰鬥機在作戰半徑、攜彈量及種類有重大進步，並同時具備對空、對地、對海攻擊能力 (IISS, 2012: 293; 2022: 317)，凸顯越南空軍戰鬥機確實出現跨世代升級的質量快速成長。

與此同時，雖然越南空軍迄今沒有預警機，但越南政府自美國 2014 年解除部分對越軍售禁令後曾表態考慮採購 P-3C 或 P-8A 反潛機 (IISS, 2015: 207)，且仍評估採購 Su-35、F-16 等新型戰鬥機 (Gady, 2016)，加上近年來越南空軍積極更新自身戰鬥機至第四代等級，顯示越南具強化應對南海潛在海空衝突的意圖，針對共軍威脅的意味明顯。

表 3-19：越南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231	4
2013	97(-134) <b>Su-30MK2+7</b> 汰除 MiG-21UM、Su-22	0(-4) 汰除 Be-12 反潛機
2014	97	0
2015	97	0
2016	<b>101(+4)</b> <b>Su-30MK2+6</b> Su-22 相撞墜毀	0
2017	<b>107(+6)</b> <b>Su-30MK2+6</b>	0
2018	74(-33) 汰除全數 MiG-21UM	0
2019	73(-1) Su-22 墜毀	0
2020	72(-1) Su-22 衝出跑道毀損	0
2021	72	0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四、越南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越南陸軍為越南三軍中快速成長跡象最不明顯的軍種，僅主戰車在 2020 年大量新增 T-90 主戰車而符合快速成長的定義之外，其餘年份的主戰車、裝甲車、直升機方面未見明顯快速成長跡象，反而因淘汰過時裝備在數量上有大量減少的情形。然而，此亦彰顯越南的建軍重點集中在可用於南海作戰的海空軍裝備上，而非與鄰國在陸地上的衝突。

表 3-20：越南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91	1935	1780
2013	76(-15) EC225+2、 淘汰 Ka-25、Mi-8、 Mi-6	1935	1780
2014	76	1890(-45) 汰除 T-34	1780
2015	75(-1) Mi-171 墜毀	1890	1780
2016	74(-1) UH-1H 墜毀	1890	1780
2017	74	1890	1780
2018	74	1890	1780
2019	48(-26) 汰除全數 Mi-24	1890	1780
2020	48	<b>1999(+109)</b> 首見 T-90+64、 T-34+45	1780
2021	48	1999	1780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陸、菲律賓軍備競賽現象與發展



### 一、菲律賓國防預算增長情形

菲律賓國防預算 2012 至 2021 年由 17.61 億美元暴增至 56.51 億美元，漲幅達 220.9%，其中 7 個年份的成長率超過 4% 及當年 GDP 成長率，2019 年的成長率更因菲中禮樂灘事件而成長高達 80.7%，且國防預算 GDP 占比也由 0.7% 逐步上升至近 1.5%，已非單純軍事現代化，並構成軍備競賽現象的條件。

表 3-21：菲律賓國防預算增長情況

年份	菲律賓官方國防預算 億美元/成長率	菲律賓 GDP 成長率	菲律賓國防預算 GDP 占比
2012	17.61	6.90%	0.70
2013	<b>20.69(+17.5%)</b>	6.75%	0.73
2014	20.35(-1.6%)	6.35%	0.65
2015	<b>21.96(+7.9%)</b>	6.35%	0.75
2016	<b>24.75(+12.7%)</b>	7.15%	0.81
2017	<b>27.82(+12.4%)</b>	6.93%	0.87
2018	25.92(-6.8%)	6.34%	0.76
2019	<b>46.84(+80.7%)</b>	6.12%	1.25
2020	<b>52.69(+12.5%)</b>	-9.57%	1.47
2021	<b>56.51(+7.2%)</b>	5.60%	1.48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 二、菲律賓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菲律賓海軍迄今仍沒有潛艦及驅逐艦等裝備，但 2012 年以來已在兩棲登陸艦及巡防艦有重大突破。在兩棲登陸艦方面，新增 2 艘 7,200 噸塔拉克級 (Tarlac) 兩棲登陸艦，載運量由前一代三寶顏級 (Zamboanga) 16 輛主戰車及 200 人增加至 2 架直升機、13 輛主戰車及 500 人 (IISS, 2020: 305; 2015: 281)，2017 至 2018 年間出現整體數量未減少、升級裝備服役的質量快速增長情形。在巡防艦方面，2020 年起連續兩年新增搭載法國西北風級防空飛彈、南韓海星反艦飛彈、反潛魚雷的現代化巡防艦何塞·黎剎級 (Jose Rizal Class) 及浦項級 (Pohang Class)，並於 2021 年再向南韓加購 2 艘浦項級巡防艦 (IISS, 2020: 296)，促使菲律賓海



軍巡防艦由 2019 年的 0 艘增加至 2022 年的 4 艘，主要武器亦由以往的槍砲升級至飛彈化，凸顯巡防艦在 2020 年後同時出現數量及質量快速增長情形。此外，菲律賓海軍現代化規劃也將潛艦納入 (IISS, 2020: 224)，加上兩棲突擊艦及巡防艦上的重大軍力升級在南海島礁衝突的潛在應用性，顯示菲律賓海軍自 2017 年以來都有針對中共軍力增長做出明顯回應。

表 3-22：菲律賓海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兩棲突擊艦	潛艦	驅逐艦	巡防艦
2012	7	0	0	1
2013	6(-1) 汰除 Zamboanga	0	0	1
2014	6	0	0	1
2015	5(-1) 汰除 Zamboanga	0	0	1
2016	5	0	0	1
2017	5 首見 Tarlac LPD+1 汰除 Zamboanga	0	0	1
2018	6(+1) Tarlac LPD+1	0	0	1
2019	6	0	0	0(-1) 汰除 Rajah Humabon
2020	6	0	0	1(+1) 浦項級+1
2021	6	0	0	2(+1) 何塞·黎剎級+1 首見防空及反艦飛彈 加購 2 艘南韓巡防艦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三、菲律賓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菲律賓空軍自 2012 年以來在預警機及反潛機方面並未見明顯增長，僅新增 2 架螺旋槳式的西斯納 208 偵察機 (Cessna 208)，但在戰鬥機方面卻有明顯成長。首先，菲律賓空軍自 2017 年陸續新增 12 架 FA-50 及 6 架 A-29B 戰鬥機，使戰

門機數量從 2016 年 0 架暴增至 2021 年的 18 架，符合數量快速增長的條件。其次，菲律賓空軍同時於 2017 年採購 130 枚 AIM-9L 空對空飛彈、125 枚 AGM-65 空對地飛彈 (SIPRI, 2022a)，使整體戰力由以往螺旋槳動力、主要武器為槍砲的機隊，晉升成具備超音速飛行能力、可發射空對空及空對地飛彈的部隊，也反映菲律賓戰鬥機 2017 至 2021 年間在質量上也有快速成長跡象，並具有反制共軍在南海軍事活動的意圖。

表 3-23：菲律賓空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戰鬥機	預警機及反潛機
2012	0	12
2013	0	11(-1) OV-10 墜毀
2014	0	10(-1) OV-10 墜毀
2015	0	10
2016	0	10
2017	<b>2(+2)</b> 首見 FA-50+2	10
2018	<b>12(+10)</b> FA-50+10	<b>12(+2)</b> 首見 Cessna 208B+2
2019	12	12
2020	12	11(-1) OV-10 墜毀
2021	<b>18(+6)</b> A-29B+6	11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四、菲律賓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菲律賓陸軍的軍力快速成長主要集中在直升機及裝甲車上，在直升機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3 年 67 架增加至 2016 年 93 架，期間連續 3 年出現超過 4% 快速增長，加上菲律賓陸軍自 2020 年起新增 AW-159、AH-1 眼鏡蛇等攻擊直升機，使菲律賓直升機隊除了原先的空中運輸能力之外，亦具有對地發射飛彈的能力，大幅強化空對地攻擊機動性，反映菲律賓直升機在 2014 至 2016 年間及 2020 年

後都有快速增長情形。此外，菲律賓又於 2019、2022 年加購 16 架、32 架 S-70i 直升機 (Giovanzanti, 2022)，恐加劇直升機軍備競賽情形。在裝甲車方面，整體數量由 2012 年 438 輛增加至 2017 年 550 輛，成長幅度達 25.8%，其中 2014、2017 年出現超過 4% 成長，且新增具兩棲攻擊能力的 LAV-150 兩棲突擊車、大幅增加 M113 型裝甲車，另於 2020 年首度引入 AAV-7 兩棲突擊車，明顯強化菲國陸軍應對共軍在南海進行兩棲作戰的能力，但僅 2014、2017、2020 年符合快速成長定義，並未出現連續異常快速成長跡象。

表 3-24：菲律賓陸軍主要武器增長情形

年分	直升機	主戰車	裝甲車
2012	63	7	438
2013	67(+4) W-3 Sokol+4	7	444(+6) ACV300+6
2014	<b>75(+8)</b> Mi-171+4、W-3 Sokol+4	7	<b>462(+18)</b> LAV-150+18
2015	<b>82(+7)</b> AW-109+3、UH-1H+4	7	436(-26) 汰除 LVTP-5
2016	<b>93(+11)</b> AW-109+4、UH-1H+2、 Bell 412EP+5	7	436
2017	93	7	<b>550(+114)</b> M113A2+114
2018	79(-14) 汰除 UH-1H	7	542(-8) M113A 1 升級成 M113A2x24、 汰除 LAV-150、M113A2
2019	79	7	542
2020	<b>87(+8)</b> 首見陸軍 AW-159+2、 AW-109E+6	7	550(+8) 首見 AAV-7A1+8
2021	90(+3) 首見 AH-1F+2 及 R-44 Raven II+2 汰除 AUH-76	7	550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 第二節 國內經濟之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

本節將從印太 6 國 2012 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及對外軍事合作情形，探討各國軍備發展之有利及制約因素。首先，一國國防預算增長率若大於國民生產總額（GDP）增長率，則代表該國為應對特定威脅選擇將更多資源投入國防建設上，而非單純現代化。其次，一國政府稅收下降，或政府支出赤字增加，將制約該國發展軍備之能力，若在上述情況下仍出現軍備快速增長現象，可反映為應對特定安全威脅。最後，各國對外軍事合作範圍變化可說明印太 6 國除強化軍備發展外，是否有以對外結盟方式進一步強化自身應對共軍威脅之能力，進而加劇既有軍備競賽情形。

### 壹、日本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2018 年後日本經濟成長環境不佳但軍費仍持續成長

日本國防預算成長率在 2018 年前大部分年度皆低於當年 GDP 成長率，未見超過經濟成長的軍備快速發展情形，但 2018 年後連續 3 年國防預算成長率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尤其 2019 年後日本經濟連續 2 年負成長、政府赤字連續 2 年超過 40 兆日圓，國防預算卻仍由 2017 年 460 億美元回升至 2021 年 490 億美元以上，凸顯 2018 年後的日本國防預算在經濟發展環境不佳情況下加快增長速度的跡象。

表 3-25：日本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兆日圓)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兆日圓)
2012	590.77	1.38%	152.352	-41.021
2013	487.09/-17.5%	2.01%	158.546	-38.719
2014	476.85/-2.1%	0.30%	170.030	-29.137
2015	411.43/-13.7%	1.56%	180.873	-19.788
2016	<b>464.56/+12.9%</b>	0.75%	183.068	-19.595
2017	460.04/-0.9%	1.68%	185.762	-17.139
2018	<b>470.11/+2.2%</b>	<b>0.58%</b>	190.742	-13.753
2019	<b>482.29/+2.6%</b>	<b>-0.24%</b>	191.079	<b>-16.924</b>
2020	<b>496.53/+2.9%</b>	<b>-4.50%</b>	191.418	<b>-48.174</b>
2021	492.54/-0.8%	1.62%	192.638	<b>-41.275</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備註：粗體字表示國防預算增長率大於 GDP 增長率或經濟數據不佳年度；表中經濟數據節錄自 IM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nstant Prices, Percent Change; General Government Revenue, National Currency; General Government Net Lending/ Borrowing, National currency。

## 二、美日持續擴大安保適用範圍，並積極強化與印太國家軍事協作性

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最重要的軍事合作夥伴為美國，兩國於 1960 年簽署《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同意美軍駐紮在自身領土上，並承諾任何對日本領土的武力攻擊將遭到美日兩國共同應對 (MOFA of Japan, 1960)。另雙方於 2007 年及 2011 年擴大美日防衛合作範圍至飛彈防禦系統、太空、網路等領域。自此美日同盟已成「維護亞太區域和平不可或缺之基礎」，雙方軍事合作關係擴大至全球範圍 (Storey, 2013: 149-155)。此條約等同於美國與日本之間共同防禦條約。

此外，2012 年以後美日安全合作仍持續升級，駐日美軍規模由 2012 年 4 萬人擴增至 2022 年 55,000 人，並增加部署 F-35 戰鬥機、全球鷹無人機等新裝備 (IISS, 2012: 255; 2022: 279-280)，美國總統拜登也在 2020 年重申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此將係 2014 年歐巴馬總統首度指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日本管轄區域、川普總統跟進後，美方再度重申立場 (Harding & Sevastopulo, 2020)。

除了美國之外，日本自 2012 年以來亦積極加強與印太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



主要包含印度、澳大利亞及東協國家，其中最重要的平台為 2007 年成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雖然該對話 2007 至 2017 年期間因中共反對而未召會，但自 2017 年起恢復召開，每年定期舉行外交、國防部長、工作階層會議，2021 年「四方安全對話」更晉升成領導人會談層級，美、日、印、澳 4 國領導人首度在華府舉行面對面會談，合作議題亦從安全問題擴大至疫苗供應、基礎設施建設、氣候變遷、5G 及資訊技術合作等領域(White House, 2021a)。

與此同時，日本 2013 年設立一個新的防衛副大臣職務，專門負責國際軍事合作，2014 年也透由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協助印太國家提升防衛能力，並以執行自由航行、參與聯合軍演、援助東南亞國家等方式，加強與部分南海聲索國之間的安全合作(郭育仁，2016：1-8；杜曉軍，2013，148)。首先，日本分別於 2000 年、2018 年與印度及澳大利亞建立 21 世紀新全球夥伴關係，並於 2018 年先後與印、澳建立外交、國防 2+2 對話機制，尤其日澳於 2020 年簽署《互惠准入協定》，方便兩國部隊互訪及聯合演訓，成為兩國首度與美國以外國家簽署準軍事協定，2015、2016 年更與印度、南韓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rossman eds., 2019: 31-48；吳峻愷，2020)，與上述國家建立更緊密政治安全合作。其次，日本於 2015 至 2018 年間與印度、印尼、菲律賓、越南簽署《防衛裝備品暨技術轉移協定》，提供海巡艦艇、US-2 水上飛機、TC-90 海上偵察機等裝備，並派軍艦訪問，以協助該等國家提升海空監視偵察能力(Grossman eds., 2019: 37-61)。

日本除提供印太國家武器裝備、建立國防外交高層對話機制、簽署情報合作協定外，亦積極參與聯合軍演。美日持續舉辦環太平洋演習(RIMPAC)、東方之盾、年度演習軍演(Orient Shield and ANNUALEX)等固定軍演機制，近年更擴大邀請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歐洲國家參與，其中環太平洋演習成員已擴大至 25 國以上，演訓項目包含海上防空、反潛、攔截、補給等(Francisco, 2019: 56-63；向凌，2021)。此外，日本亦分別於 2015、2017、2021 年開始參與美印馬拉巴爾(Malabar)、美菲肩並肩、美泰金色眼鏡蛇(Cobra Gold)等演習，擴及聯合軍

事行動、軍民合作、災害救治、人道救援等內容( Garrison, 2021; Rajagopalan, 2021; 張芮甄, 2021), 不斷加強與印太國家軍事協作性。上述擴大美日安保合作範圍、深化與「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安全關係、供應東協國家武器、加強與印太國家軍事協作能力等作為, 明顯是日本為抵禦共軍威脅所做之軍事外交努力。

## 貳、台灣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台灣政府支出 2017 年後更聚焦於強化國防

台灣國防預算與經濟發展關係如同國防預算增長趨勢, 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2017 年以前每年 GDP 成長率都超過當年國防預算增長率, 反映台灣在經濟成長時期並未將多出的預算放在國防支出上。然而, 2017 年後除了每年國防預算都呈現正成長外, 幾乎每年國防預算增長率都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 尤其 2020 年後 GDP 成長率持續攀升情況下, 國防預算增長幅度卻更快, 達到至少每年 15% 以上, 凸顯 2012 年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皆有利於發展軍備, 但 2017 年後更加集中於發展國防軍備, 2020 年後更有加速惡化的趨勢。

表 3-26：台灣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兆台幣)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兆台幣)
2012	104.52	2.22%	2.321	-0.633
2013	103.21/-1.3%	2.48%	2.458	-0.495
2014	101.26/-1.9%	4.72%	2.509	-0.443
2015	100.07/-1.2%	1.47%	2.662	-0.304
2016	99.02/-1.0%	2.17%	2.691	-0.385
2017	<b>104.29/+5.3%</b>	3.31%	2.753	-0.364
2018	<b>108.64/+4.2%</b>	2.79%	2.849	-0.343
2019	110.10/+1.3%	3.06%	2.932	-0.336
2020	<b>138.67/+25.9%</b>	3.36%	3.036	<b>-0.579</b>
2021	<b>162.14/+16.9%</b>	6.28%	3.459	-0.261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 IMF (2012-2021)。



## 二、台灣加大向美軍購頻率並強化台美實質安全合作


台灣基於主權國家地位普遍未受國際承認，除了與邦交國軍事交流之外，僅與美國建立以軍購為主的軍事合作關係，與其他國家則未有任何共同防禦條約、高層對話機制、聯合軍事演習等合作關係。首先，在軍購方面，除了 2016 年之外，美國於 2015 年後的每年都有新增對台軍售項目，包含 F-16V 戰鬥機、M1A2 主戰車、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等平台，以及 AGM-84、AGM-88、AGM-154 等對地攻擊飛彈，反映美國對台軍售頻率較往年提高，且更朝向供應攻擊性武器（請見下表），使台美軍備供應關係較過去更加緊密。

表 3-27：2012 年以來美國宣布對台軍售項目列表

日期	美國宣布對台主要軍售項目	軍售金額
2015/12/16	派里級巡防艦、AAV7 兩棲突擊車、刺針飛彈、拖式飛彈、標槍飛彈等	18.31 億美元
2017/6/29	AGM-88、AGM-154 飛彈；MK48、MK54 魚雷；標準二型飛彈等	14.2 億美元
2018/9/24	F-16、IDF、C-130 等飛機航材零附件	3.3 億美元
2019/4/15	路克基地飛行員訓練續約	5 億美元
2019/7/8	M1A2T 主戰車及運輸車、刺針飛彈	22.24 億美元
2019/8/20	F-16V 戰鬥機及發動機等相關裝備	80 億美元
2020/5/20	MK48 魚雷	1.8 億美元
2020/7/10	愛國者飛彈系統零附件	6.2 億美元
2020/10/21	海馬士多管火箭系統、AGM-84 飛彈	18.11 億美元
2020/10/26	陸基魚叉飛彈系統	23.7 億美元
2020/11/3	MQ-9B 無人機	6 億美元
2020/12/7	戰地通訊系統	2.8 億美元
2021/8/4	M109A6 自走砲及彈藥補給、救濟車	7.5 億美元
2022/2/7	愛國者飛彈系統零附件	1 億美元
2022/4/5	愛國者飛彈系統零附件	0.95 億美元
2022/6/8	艦艇零附件	1.2 億美元
2022/7/15	主戰車及裝甲車零附件等	1.08 億美元
2022/9/2	AIM-9X、AGM-84 飛彈、長程預警雷達更新等	11.06 億美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參考自 DSCA（2015-2022）。





除了軍購關係之外，美國參眾兩院分別於 2018 及 2019 年通過《台灣旅行法》、《台灣保證法》，並於 2021 年成立台美海巡工作小組，促進台美高層交流，亦簡化對台軍售程序（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132-133；2021：138-139）。此外，2022 年美國國會推動《台灣政策法》，美國總統拜登更多次宣稱將派兵協防台灣，將美國對台政策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李澄欣，2022），歐盟、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及 G7、「四方安全對話」等國際組織亦多次表達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意願（鍾志東；萬敏婉，2022），凸顯台灣 2018 年後除更加提升與美國軍事合作關係外，亦獲得更多國際關注，未來可能作為台灣拓展與美國以外國家之間軍事合作關係之基礎。綜觀上述作為，皆為台灣積極拉攏國際盟友，以共同嚇阻中共對台動武之軍事外交努力。

## 參、印度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印度經濟成長自 2017 年連續 4 年下滑國防預算卻持續成長

印度國防預算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連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2016 年以前皆低於或等同當年 GDP 成長率，但 2016 年起印度 GDP 成長率連續 4 年下滑，國防預算卻仍維持正向成長，其中 4 個年份出現超越當年 GDP 成長率、超過 4% 快速增長跡象，尤其 2020 年同時出現 GDP 成長率轉為負成長、政府稅收下降、赤字較前一年增加近 10 兆盧比，國防預算卻仍成長超過 5%，顯示印度 2016 年後國防預算增長速度已超過正常現代化範疇，有明顯針對特定威脅快速增加軍費的軍備競賽跡象。

表 3-28：印度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兆盧比)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兆盧比)
2012	409.86	5.46%	19.7034	-7.5073
2013	418.96/+2.2%	6.39%	22.0181	-7.8630
2014	<b>452.12/+7.9%</b>	7.41%	23.8754	-8.8162
2015	448.43/-0.8%	7.99%	27.3425	-9.9227
2016	<b>514.53/+14.7%</b>	8.26%	30.9570	-10.9589
2017	524.94/+2.0%	<b>6.80%</b>	34.1876	-10.6424
2018	<b>578.30/+10.2%</b>	<b>6.45%</b>	37.7083	<b>-12.0501</b>
2019	<b>607.94/+5.1%</b>	<b>3.74%</b>	40.0079	<b>-15.0429</b>
2020	<b>641.38/+5.5%</b>	<b>-6.60%</b>	<b>36.2266</b>	<b>-25.2602</b>
2021	650.79/+1.5%	8.95%	46.6761	<b>-24.4735</b>

資料來源：IISS（2012-2021）；IMF（2012-2021）。

## 二、印度積極與「四方安全對話」及東協成員國合作應對共軍威脅

印度自 1947 年獨立以來長期奉行不結盟外交政策，直至 1991 年冷戰結束後出現變化，由於與中共及巴基斯坦兩國邊界領土爭議，再加上巴中加強政治及經濟合作關係，印度開始推行「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並加強與以美國為首的印太國家合作 (Grossman eds., 2019: 112-116)。美印 1992 年開始舉行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 (Malabar)，2000 年兩國簽署《21 世紀十年國防夥伴協定》，並陸續向印度出售 P-8 反潛機、C-17 運輸機、阿帕契攻擊直升機等武器，使印度不再只依賴俄國提供軍武。美印更在 2016 年簽署《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並於 2019 年簽署《美印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顯示 2012 年後兩國的合作仍持續升溫 (Grossman eds., 2019: 149-151; Rajagopalan, 2021)。

與此同時，印度身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之一，也持續強化與日本及澳大利亞間的軍事合作關係。日印關係 2015 年晉升成特殊戰略全球夥伴關係，2015 年簽署《防衛裝備品暨技術轉移協定》，商討出售 US-2 水上飛機、蒼龍級潛艦可能性，並於 2016 至 2017 年間互相接待對方三軍司令訪問，2017 年籌辦首屆日印國防工業論壇、2018 年開始建立參謀總長層級互訪機制，2019 年更進行首屆

國防、外交部長級 2+2 對話機制。日印兩國 2012 年以來亦積極加強軍事協作性，日本自 2015 年起成為馬拉巴爾軍演永久會員，2012 年日印首度舉行聯合海上軍演(JIMEX)、2015 年舉行首屆陸上聯合反恐演習(Grossman eds., 2019: 117-122)，使日印軍事合作關係逐步擴及至高層對話、提供軍事裝備、舉行聯合軍演層級。

印度與澳大利亞也在 2012 年之後持續深化合作關係，雖然兩國曾因澳國 2007 年淡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及鈾原料出口分歧而有齟齬，但兩國自 2014 年莫迪成為 28 年來首度訪澳的印度總理後關係大為改善。印澳 2014 年簽署安全合作架構協定、建立外長對話機制，同年澳大利亞政府表態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2015 年兩國舉行首屆雙邊海上演習(AUSINDEX)、2018 年建立國防及外交部長級 2+2 對話機制、舉辦首次陸上聯合演習，促成澳大利亞同意出口鈾原料至印度，並重回「四方安全對話」機制(Grossman eds., 2019: 122-128)。印澳兩國更於 2020 年簽署《共同後勤保障協定》，澳大利亞也在同年成為馬拉巴爾軍演正式會員，並共同參與防空、反潛、反艦、聯合火力打擊等實戰演習，甚至共同研擬行動計畫(IISS, 2022: 219; Rajagopalan, 2021)，凸顯印澳自 2012 年以來也在高層對話、舉行聯合軍演領域深化安全合作關係。

除了美、日、澳等「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外，印度 2012 年以來亦同步加強與其他印太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尤其是東協國家。印度自 2013 年起開始協助越南、菲律賓、印尼訓練基洛級潛艦船員及 Su-30 戰鬥機飛行員，並於 2018 年首度與越南、印尼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強化東協國家的作戰能力。此外，印度亦以提供軍事貸款方式，協助越南採購海巡艦艇，並推銷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艦飛彈，直接以提供軍備方式提升東協國家軍事實力(Grossman eds., 2019: 128-144)。

上述顯示，印度 2012 年以來積極深化與美國及印太國家之間的軍事合作，遍及高層對話、武器裝備供應、聯合軍演等面向，顯然是為應對共軍威脅，而非應付傳統勁敵巴基斯坦，故印度 2012 年以來明顯有藉由軍事外交途徑，進一步增強抗衡中共軍事威脅的戰力。

## 肆、澳大利亞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澳大利亞 2016 年後有 5 年國防預算成長率超過 GDP 增長

澳大利亞國防預算與其 GDP 成長率無重大關聯，顯非因經濟成長帶動軍事現代化。首先，澳大利亞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 GDP 成長率皆為 2%，國防預算增長皆為負成長，並無快速增長情形。然而，2016 至 2021 年共計 6 年期間有 5 年國防預算成長率高於當年 GDP 成長率，尤其 2020 年澳大利亞 GDP 成長率出現負成長，且政府赤字自 2012 年以來首度超過 1,600 億澳幣，當年國防預算增長率卻仍高達 5.0%，顯示澳大利亞 2016 至 2021 年間係為面對特定安全威脅，才在經濟成長率下滑、政府赤字增加情況下增加軍費支出。

表 3-29：澳大利亞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億澳幣)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億澳幣)
2012	270.99	3.78%	5009.83	-531.88
2013	245.35/-9.5%	2.21%	5281.04	-440.97
2014	225.12/-8.2%	2.56%	5475.58	-470.95
2015	220.34/-2.1%	2.31%	5668.97	-456.85
2016	<b>236.17/+7.2%</b>	2.70%	5936.64	-411.51
2017	<b>249.63/+5.7%</b>	2.38%	6334.22	-309.67
2018	<b>319.73/+28.1%</b>	2.77%	6767.60	-238.44
2019	299.12/-6.4%	<b>1.99%</b>	6907.43	<b>-873.19</b>
2020	<b>314.18/+5.0%</b>	<b>-2.18%</b>	7094.97	<b>-1687.69</b>
2021	<b>343.06/+9.2%</b>	4.69%	7632.62	<b>-1674.09</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 二、美英續強化與澳軍事合作，印太國家成澳國積極合作對象

澳大利亞軍事合作夥伴仍以美、英兩國為主，近年則積極加強與印度、日本等印太國家合作。首先，與美國軍事合作方面，澳大利亞即於 1951 年與美國、紐西蘭簽署《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旨在其中一方遭受攻擊時進行馳援，並允許對方使用各自境內設施，且因紐西蘭在 1980 年代禁止核子動力艦艇進入其國境而退出，該條約最終形同美澳之間共同防禦條約 (Brown & Rayner,

2001; Baviera, 2012: 119-120)。此外，美澳之間也自 2005 年開始進行護身軍刀演習 (Talisman Sabre)，執行海空協作、登陸作戰、後勤支援等演習科目，並於 2021 年首度邀請日、加、紐、韓、英等國參與 (DOD of Australia, 2021)。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美國宣布在達爾文增加 2,500 人海軍陸戰隊駐軍，並部署遠程轟炸機 (IISS, 2016: 218)，2021 年美澳更與英國成立「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AUKUS)，協助澳大利亞建造 8 艘核動力潛艦，並推動網路安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深海科技領域的三方合作 (李靖棠, 2021)，顯示美澳兩國軍事合作仍持續升級。

其次，與英國合作方面，由於澳大利亞原為英國殖民地，兩國自 1956 年後皆為五眼聯盟 (Five Eyes) 重要成員，建立定期情報交換機制 (Tossini, 2020)，並於 1971 年共同成立五國聯防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透過定期舉辦聯合軍演的方式彌補英國自亞洲撤軍及東協區域安全機制不足的安全真空，同時補充美國的區域安全網路 (Emmers, 2012: 87-89)。<sup>8</sup>2021 年澳大利亞更與美、英合作打造下一代核動力潛艦，在 2012 年後仍持續深化英澳軍事合作關係。

然而，澳大利亞 2012 年後更聚焦於加強與日本、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合作。日澳之間從原先的三方會談機制，晉升為互相提供軍事裝備及兩軍共同執行任務的合作關係，包含 2014 年兩國建立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後，日、澳分別同意出售蒼龍級潛艦、大毒蛇裝甲車給對方，並於 2013、2020 年分別簽署《物品勞務相互支援協議》、《互惠准入協定》，係兩國首度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簽署類似準軍事協定 (Grossman eds., 2019: 187-195; 吳峻愷, 2020)，進一步強化雙邊軍事合作關係。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與印度關係也自 2000 年代澳國退出「四方安全對話」、出售鈾原料爭議後大幅改善，兩國分別於 2013、2014 年建立年度防長會議、簽署澳印安全合作架構，2015、2016 年更首度舉行海上聯合演習 (AUSINDEX) 及特種部隊聯合演習 (AUSTRAHIND)，並於 2020 年首度獲邀參與美印馬拉巴爾

---

<sup>8</sup>五國聯防係由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共同成立的軍事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國防部長每三年會定期會面、五國共同組成的聯合空防司令部亦定期舉辦演習，甚至召集各國國防及外交官員舉行專業論壇，迄 2022 年仍持續運作，在反恐及海洋巡邏具有貢獻。

軍演、2021 年首度召開國防及外交部長 2+2 會議等 (Grossman eds., 2019: 168-177; Madan, 2020; 林行健, 2021), 反映澳印兩國軍事合作 2012 年起已從原先反恐合作擴大至高層對話、聯合演習層級。

此外, 澳大利亞 2012 年以來也積極強化與東南亞國家軍事合作關係, 澳菲《軍隊互訪協定》2012 年生效後, 2014 年澳大利亞便加入美菲肩並肩演習, 2015 年兩國更建立全面夥伴關係 (Grossman eds., 2019: 197-200)。澳越則在 2012 年簽署國防合作備忘錄後, 分別於 2013、2017 年建立年度防長會議、國防政策對話等機制, 並自 2018 年起晉升成戰略夥伴關係, 協助訓練越南軍官 (Grossman eds., 2019: 208-214)。綜觀上述情勢發展, 充分顯示澳大利亞為應對共軍與日俱增的威脅, 2012 年以來積極與印太國家加強軍售、聯合演習、高層對話等方面合作, 以強化澳大利亞應對中共威脅之能力。

## 伍、越南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越南 2012 年以來國防預算增長率大多超過 GDP 成長率

越南國防預算變化與其經濟成長率並無太大關連, 2012 年以來有 6 個年份國防預算成長率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 尤其 2018 至 2021 年間 GDP 成長率連年下降, 國防預算卻連續 4 年成長超過 9%,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使 2020 及 2021 年的 GDP 成長率降至低於 3%, 且政府稅收下降、赤字連續兩年超過 300 兆越南盾, 越南仍維持將近 10% 的國防預算成長率, 充分顯示越南 2012 年以來的國防預算增長速度超過自身經濟成長速率, 已非單純軍事現代化。

表 3-30：越南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兆越南盾)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兆越南盾)
2012	33.55	5.51%	733.45	-222.52
2013	<b>39.38/+17.4%</b>	5.55%	827.31	-266.81
2014	<b>42.48/+7.9%</b>	6.42%	875.74	-247.68
2015	38.29/-9.9%	6.99%	996.23	-258.70
2016	40.73/+6.4%	6.69%	1075.25	-178.43
2017	43.19/+6.0%	6.94%	1231.42	-123.61
2018	<b>47.84/+10.8%</b>	7.20%	1363.87	-71.57
2019	<b>52.21/+9.3%</b>	<b>7.15%</b>	1496.32	-30.58
2020	<b>57.27/+9.7%</b>	<b>2.94%</b>	<b>1476.55</b>	<b>-311.40</b>
2021	<b>63.45/+10.8%</b>	<b>2.58%</b>	<b>1340.49</b>	<b>-349.35</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 二、美印日與越南強化安全關係並成武器供應國之一

越南雖奉行不參與軍事結盟、不允許外國設置軍事基地、不從事針對第三國軍事行動的三不政策，但仍長期向俄羅斯採購武器，並參與多項區域性聯合軍演機制，包含 2002 年成立的東南亞合作訓練機制 (SEACAT)，<sup>9</sup>進行突發事件及海上犯罪行為的應變演練 (Correll, 2021)，以及 2006 年成立的亞洲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 (RECAAP)，<sup>10</sup>旨在強化區域國家反海盜能力 (ReCAAP, 2007)。2012 年後越南更參與 2017 年在泰國灣舉行的首屆東協海軍多邊聯合演習 (AMNEX)，與寮國外的東協 9 國進行海上軍事演習，並於 2018、2019 年以東協成員國身分與中共、美國分別舉行海上聯合演習，強化多邊海上合作及互相協作性 (Bana, 2017; ASEAN Regional Forum, 2020: 216)。

除了俄國及東協國家之外，越南 2012 年以來積極與美國、印度、日本等國強化軍事安全合作，並與上述 3 國分別簽署國防合作共同願景聲明。首先，越南

<sup>9</sup>東南亞合作訓練係由美國於 2002 年成立，與越南、印尼、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 21 國共同針對反恐、反海盜等海上犯罪議題進行合作。

<sup>10</sup>亞洲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是亞洲第一個針對反海盜目的而成立的區域政府間組織，包含除印尼、馬來西亞以外的東協 8 國及美國、中共、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孟加拉、斯里蘭卡、丹麥、荷蘭、挪威、德國、英國、南韓等 13 國共 21 國，並在新加坡設立情報共享中心。

與美國自 2015 年簽署國防合作共同願景聲明後，2016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訪問越南期間取消越戰以來的對越軍售禁令，2017 年美國提供越南海巡艦船，2018 年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更成為越戰後首艘停靠越南港口的美國航母（Grossman eds., 2019: 282-284），美越關係取得越戰以來的最大突破。

其次，越南與印度亦在 2015 年簽署國防合作共同願景聲明後，建立年度高層會議、以基洛級潛艦及蘇愷戰鬥機訓練為主的軍事交流、港口互訪共識等合作機制，尤其印度繼 2014 年提供越南 4 艘海巡艦艇後，2016 年再度提供越南 5 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印度製造武器，2018 年追加 1 億美元採購海巡艦艇，並於 2019 年討論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飛彈的可能性（Grossman eds., 2019: 264-268），顯示印度與越南關係已從以往的軍事交流層級提升至供應武器層級。此外，日本亦於 2015 年與越南簽署國防合作共同願景聲明後，分別於 2014、2017 年各提供越南 6 艘海巡艦艇，2018 年更與越南簽署《國防設備與技術轉移協定》、在越南港口首度停靠潛艦，並在 2019 至 2022 年期間協助越南發射衛星（Grossman eds., 2019: 271-274），反映日本也成為提升越南軍事能力的武器供應國之一。

上述顯示越南除了維繫與俄國、東協既有安全合作關係之外，2012 年以來亦在共軍南海威脅日益增加下，與美國、印度、日本加強實質安全合作，尤其是在海上武器供應方面，明顯針對與越南有南海主權衝突的中共，並使得越南不再依賴俄羅斯提供軍事武器。

## **陸、菲律賓經濟影響及與外國軍事合作情形**

### **一、菲國政府赤字連續 6 年增加國防預算卻不減反增**

菲律賓國防預算增長並未與 GDP 成長率成正比，2012 年以來 7 個國防預算增長率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其中有 5 個年度國防預算成長超過 10%。此外，菲律賓政府支出自 2016 年起連續 6 年出現赤字，赤字規模亦同步連年上漲，國防支出卻仍持續成長，僅 2018 年例外，反映菲國並非根據政府稅收變化調整軍



費支出。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菲律賓更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GDP 衰退達到近-10%，政府稅收下降、政府支出赤字亦暴增至超過 1 兆披索，但國防預算仍然成長逾 12.5%，充分顯示菲律賓在經濟發展不利自身軍力增長之際，仍有意針對特定安全威脅強化軍備，已非單純軍事現代化。

表 3-31：菲律賓經濟發展與軍力增長關係

年份	國防預算金額 (億美元)/成長率	GDP 成長率	政府稅收 (億披索)	政府支出盈餘 赤字(億披索)
2012	17.61	6.90%	19659.9	-325.2
2013	<b>20.69/+17.5%</b>	<b>6.75%</b>	21745.0	+225.9
2014	20.35/-1.6%	<b>6.35%</b>	23948.6	+1091.4
2015	<b>21.96/+7.9%</b>	<b>6.35%</b>	25814.5	+817.0
2016	<b>24.75/+12.7%</b>	7.15%	27690.9	<b>-534.5</b>
2017	<b>27.82/+12.4%</b>	<b>6.93%</b>	30942.4	<b>-615.9</b>
2018	25.92/-6.8%	<b>6.34%</b>	35248.1	<b>-2835.6</b>
2019	<b>46.84/+80.7%</b>	<b>6.12%</b>	39060.4	<b>-3235.9</b>
2020	<b>52.69/+12.5%</b>	<b>-9.57%</b>	<b>37029.5</b>	<b>-10284.2</b>
2021	<b>56.51/+7.2%</b>	5.60%	39502.9	<b>-12532.2</b>

資料來源：IISS (2012-2021)；IMF (2012-2021)。

## 二、美澳與菲安全關係持續升級，日韓更成菲國軍備主要供應國

雖然美軍自冷戰結束後撤出蘇比克灣及克拉克空軍基地，但美國仍是菲國最重要的安全夥伴。《美菲聯防條約》於 1952 年簽署，美菲兩國同意任何針對對方在太平洋上的武力攻擊將視為對自己的安全威脅，並將採取共同行動應對，包含對雙方人口密集城市、島嶼、海上船隻及飛機的攻擊（Official Gazette of the Philippines, 1951），等同於美國與菲律賓之間共同防禦條約。此外，美菲之間也有肩並肩年度演習（Balikatan Exercise），該演習於 1991 年開始，係美軍撤出菲律賓後雙方最大規模的年度軍事演習（U.S. Embassy in Manila, 2021），顯示美菲具長久軍事合作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前總統杜特蒂上台後美菲安全關係仍不斷升級，包含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2021 年強調《美菲聯防條約》適用於南海，美國將與菲律賓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法（White House,

2021b)，承諾美國會在菲律賓遭受中共攻擊時提供軍事支持，且杜特蒂也並未撕毀讓美軍得以自由進出菲律賓從事兵棋推演和軍事演習的美菲《軍隊互訪協定》（Garamone, 2021），顯示美菲軍事合作範圍及規模自 2012 年以來仍持續強化。

除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之外，菲律賓同時也是東南亞合作訓練（SEACAT）、東協海軍多邊聯合演習（AMNEX）的成員國之一，並為美國所主導的卡拉特聯合演習（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sup>11</sup>創始國之一（Baviera, 2012: 148）。2007 年與澳大利亞簽署菲國第二份《軍隊互訪協定》後，2017 年首度與印尼、馬來西亞進行三國聯合海上巡邏任務（Grossman eds., 2019: 304-306），反映菲國 2012 年後仍積極參與區域多邊演習活動，強化與印太國家軍事協作能力。

然而，2012 年以來最大變化是與澳大利亞、日本、南韓深化軍事安全合作。首先，美菲肩並肩演習 2014 年、2017 年首度納入澳大利亞、日本兩國，英國也在 2022 年加入（張芮甄，2021），顯示上述演習將不再侷限於美菲兩國間。與此同時，日本及南韓成為菲律賓軍備重要供應國，南韓除了提供戰鬥機及軍艦之外，也向菲律賓提供軍用卡車、登陸艇等設備，2019、2020 年更分別在菲律賓設立工廠生產武器彈藥，並交付新型巡防艦。日本亦於 2015 年與菲律賓簽署協定同意日本派遣 P-3C 在南海進行巡邏、開放向菲律賓提供軍事裝備後，相繼於 2016 年租借 TC-90、海警船給菲律賓軍方巡邏使用，並於 2017 年派遣軍艦停靠菲國港口，直至 2018 年仍持續參與肩並肩演習、派遣軍艦停靠（Grossman eds., 2019: 310-321），凸顯菲國與周邊國家軍事合作 2012 年以來每年都有大幅增加，日本、南韓更躍升成為菲律賓先進海、空軍武器裝備的主要供應國之一，以強化菲律賓軍方應對共軍在南海軍事活動的能力。

---

<sup>11</sup>美國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等 6 國自 1995 年起開始分別進行雙邊演習，協助訓練東南亞國家提升海上偵察、攔截、作戰、救援能力，後來孟加拉、柬埔寨、東帝汶等國陸續加入。

### 第三節 軍備競賽過程之分析



本節將承繼上述兩節分析結果，對比同期各國對中共威脅認知及共軍軍力的快速增長情形，指出印太 6 國分別在哪些時段、何種領域，與共軍同時出現國防預算或三軍裝備異常快速增長情形，藉此說明哪些國家正與中共從事軍備競賽。另本文將從各國同期出現國防預算增長率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或經濟數據惡化情況，以及與外國新建立聯合軍演、高層對話、武器裝備供應機制等拓展軍事合作情形，證明印太 6 國發展軍備是否具急迫性，進一步佐證該等作為與應對共軍威脅之關聯。

#### 壹、日本海軍 2014 年以來每年都有快速增長跡象

日中關係繼承二戰之後的歷史恩怨，2012 年以來除了日本國防白皮書每年都有提到共軍威脅外，兩國亦因釣魚台主權爭議而爆發多次對峙事件，導致日本對共軍每年都有很明顯的威脅意識。雖然日本在國防預算成長率上未見明顯軍備競賽現象，但海上自衛隊自 2013 年以來每年都有武器裝備出現異常快速增長的情形，而 2019 年起則是航空、海上、陸上自衛隊三軍同時有至少一項武器裝備有快速增長現象，尤其日本 2019 年進入經濟負成長、政府赤字增加等不利發展國防軍備的時期，加上共軍已成日本首要外部安全威脅，顯示日本 2014 年以來每年都對共軍威脅有明確回應，符合軍備競賽定義，且 2019 年後有惡化情形。

與此同時，日本除了透過增加駐日美軍、擴大《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等方式強化與美國軍事合作外，2012 年以來也積極加強與「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及東協國家軍事協作能力，主要包含建立高層官員對話機制、參與多邊聯合軍演、放寬武器出口規定等，凸顯日本仍不斷擴大軍事合作國家數量及範圍，藉此提升抵禦共軍威脅之綜合能力，並加劇軍備競賽情形。

表 3-32：日本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航空自衛隊	海上自衛隊	陸上自衛隊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強			驅			
2014	強			驅			V
2015	強			驅			V
2016	強	有		航母		負	V
2017	強			潛			V
2018	有		戰	航母		負	V
2019	有		戰	潛、驅、巡	裝	負	
2020	有		戰	潛、驅、巡	裝	負	V
2021	強		戰	潛、驅	裝	負	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貳、台灣軍備競賽現象聚焦國造機艦計畫及攻擊性武器

兩岸關係長期因中共宣稱台灣是其領土一部分而處於對立狀態，共軍亦多次聲稱不排除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導致共軍自 1949 年以來一直都是台灣最大安全威脅，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更加大對台軍事威嚇力度，台灣對中共威脅認知也轉趨強烈。上述情況也反映在國防預算增長率上，2017 年後的大部分時期都有快速增長情形，且超越當年 GDP 成長率，用於向美國採購空對地飛彈、反艦飛彈、多管火箭系統等攻擊性武器，以及國機國造、國艦國造等計畫，與 2017 年以前形成鮮明對比。此外，台灣 2013 年起每年都有至少一項裝備有快速增長情形，主要集中空軍及陸軍裝備的質量增長，包含戰鬥機、直升機、裝甲車等高機動性作戰武器，明顯為反制共軍對台動武所做的軍事準備。

這段期間台灣也持續深化與美國安全合作關係，除了增加對台軍購的頻率及規模之外，也透過簽署海巡合作協定、美國國內立法等媒介，強化台美政軍溝通管道，並增加國際社會對台海議題的關注，引發更多國家公開支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尤其是在 2015 年之後，凸顯 2015 年後台灣有更明顯的軍備快速增長情形及軍事外交突破，且係為抵禦共軍與日俱增的武力入侵威脅。

表 3-33：台灣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有				直、裝		
2014	有		預	巡	直、裝		
2015	有		預	潛	直、裝		V
2016	強		預	巡	直、裝		
2017	強	有			直、裝	負	V
2018	強	有	戰			負	V
2019	強		戰	巡	直		V
2020	強	有	戰		裝	負	V
2021	強	有	戰		裝	負	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參、印度軍備異常快速增長集中於海、陸軍

印中關係長期以來因邊界主權爭議關係不睦，近年更因中共支持巴基斯坦、印中在拉達克及洞朗地區屢次爆發衝突，印度對共軍威脅逐年增加，並導致印度國防官員首稱共軍已成印度最大安全威脅。對此，印度海軍除 2018 年外，每年都有至少一項裝備出現異常快速增長的情形，陸軍亦自 2013 年起連續 9 年大幅增加主戰車、裝甲車、直升機的數量及質量，軍備競賽現象較集中於海軍及陸軍裝備上，三軍 2012 年以來每年都有至少一項武器裝備出現異常增長情形，顯示印度有意抗衡共軍在爭議邊界及印度洋方向的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於 2018 至 2020 年間在經濟成長率連年下降、政府赤字持續攀升的情況下仍維持超過 5% 的國防預算增長率，並持續換裝新型海、陸軍裝備，凸顯印度國防發展並非單純軍事現代化，而是為了應對共軍威脅，即使在經濟成長環境不佳之下，仍然執意提升軍備數量及質量。此外，印度自 2012 年積極強化與印太國家合作，尤其是「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及東協國家，每年都新增至少一項軍事合作案，涵蓋高層對話、武器裝備供應、聯合軍演等領域，反映印度也藉由擴大軍事合作範圍方式，強化自身應對共軍威脅的綜合軍事能力。

表 3-34：印度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強		戰、預	驅、巡	主		V
2014	有	有	預	巡	直	負	V
2015	強		預	航母、驅	直		V
2016	強	有	預	驅	主	負	V
2017	強			驅	主、裝		V
2018	有	有			主	負	V
2019	強	有		潛	主、裝	負	V
2020	強	有		潛	直	負	V
2021	強			航母、巡	主、直	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肆、澳大利亞海、空軍 2016 年後出現明顯軍備競賽情形

澳中關係因 2015 年澳大利亞政府開始反制中共政經滲透，並引發中共經貿制裁報復而逐年惡化，兩國自 2015 年起陷入緊張關係。澳大利亞亦從 2016 年起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從連續 3 年負成長到 6 年間有 5 年成長率超過 5% 及當年 GDP 成長率，並每年有至少兩種武器裝備出現快速成長現象，尤其聚焦於戰鬥機、驅逐艦、潛艦、大型兩棲突擊艦等海空軍裝備。由於上述海空軍武器裝備皆具有跨世代升級、大型化、攻擊範圍更遠等特點，且澳大利亞周邊並無國家軍力足以對其構成威脅，再加上澳中關係逐年惡化，反映上述海空軍武器裝備的快速成長係為反制共軍日益增長的威脅，亦凸顯澳大利亞在 2016 至 2021 年間有軍備競賽情形。

澳大利亞自 2013 年迄今仍維繫並強化與美、英兩國軍事合作關係，2013 年後更積極與日、印等大國及越、菲等東南亞國家建立定期高層對話、聯合軍演、武器裝備供應、後勤補給等合作機制，跳脫原先僅聚焦於與美、英兩國軍事合作關係，顯示澳大利亞 2013 年後有意藉與印太國家深化合作，共同抵禦共軍威脅的企圖。此外，澳大利亞政府赤字自 2019 年起開始擴大，但國防預算及海空軍

裝備快速成長的現象仍然持續，反映澳大利亞在經濟發展狀況不佳情況下仍執意強化國防，展現抵禦中共威脅決心，亦突出澳國軍備競賽 2019 年後有惡化現象。

表 3-35：澳大利亞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有				裝		V
2014	有						V
2015	強			兩			V
2016	強	有	戰	潛	直	負	V
2017	強	有	戰	兩	直	負	V
2018	強	有	戰、預	驅、巡	裝	負	V
2019	強		戰、預	驅		負	
2020	強	有	戰		裝	負	V
2021	強	有	預	潛、驅		負	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伍、越南軍費及海軍幾乎每年都有快速增長跡象

越南 2012 年以來每年皆因外交緊張事件而對中共具明確威脅意識，2019 年後因官方言論對中轉趨強硬而更加強化。這段期間除了 2015 年以外，每年國防預算都有超過 4% 的快速成長，其中 6 個年度超過當年 GDP 成長率，加上 2014 至 2020 年間每年都有至少一項以戰鬥機、潛艦、巡防艦為主的海空軍裝備出現異常快速成長跡象，上述武器亦為南海作戰用途，充分顯示越南具明顯軍備競賽情形，且與抵禦共軍威脅高度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在 2020 年前的每年 GDP 成長率大多維持在 6% 以上，但 2020 年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越南政府收入連續兩年下降、赤字連續兩年上升，陷入不利於發展軍備的經濟環境中，越南這兩年的國防預算成長率卻仍超過 9%，加上越南對中共威脅意識自 2019 年轉為強烈，以及越南自 2014 年開始強化與美、日、印度等國軍事安全關係，不再只是仰賴俄國供應武器，越南受中共威脅引發的軍備競賽有逐年惡化的趨勢。

表 3-36：越南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有	有				負	
2014	有	有		兩		負	V
2015	有			潛			V
2016	有	有	戰	潛			V
2017	有	有	戰	潛			V
2018	有	有		潛		負	V
2019	強	有		巡		負	V
2020	強	有		巡	主	負	V
2021	強	有				負	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陸、菲律賓海空武器飛彈化具明顯軍備競賽現象

菲律賓 2012 年迄今每年都有對中共明確威脅意識，尤其 2013 年南海仲裁案開始後菲中關係逐年惡化，菲律賓對中共同時存在官方對立及外交緊張關係的強烈威脅意識。與此同時，菲律賓國防預算 2012 年以來有 7 個年份出現大於 4% 或 GDP 成長率的快速增長現象，且菲國軍方 2014 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新裝備入列，主要集中於海空軍武器裝備，明顯是為抵禦共軍對南海島礁的威脅，亦反映菲國三軍裝備自 2012 年以來每年都有明顯軍備競賽現象。

此外，菲律賓政府支出自 2016 年連續 6 年呈現赤字，且赤字規模逐年增加，其實不利於菲國強化軍備，但菲律賓仍持續快速強化國防實力，再次凸顯菲國是受到外部威脅刺激才發展軍備，非單純軍事現代化。這段期間菲國對外軍事合作每年都有所進展，除了維繫與美國的準軍事同盟關係外，更透過參與聯合軍演、採購軍武等方式，加強與澳大利亞、南韓、日本等國的軍事合作關係。綜合以上，菲律賓自 2013 年持續出現異常快速的國防預算增幅，三軍武器裝備亦朝飛彈化、兩棲攻擊化方向出現跨世代的跳躍式成長，且明顯為抵禦共軍南海威脅的裝備，尤其 2016 年後政府赤字規模逐年增加下仍持續快速發展軍備，並加強與外國軍



事合作關係，因此菲律賓自 2013 年以來都有明顯軍備競賽現象，2016 年後更有加速惡化的趨勢。



表 3-37：菲律賓軍備競賽指數

年份	威脅意識	軍費	空軍	海軍	陸軍	經濟影響	軍事合作
2013	有	有					
2014	強				直、裝		V
2015	強	有			直		V
2016	強	有			直	負	V
2017	強	有	戰	兩	裝	負	V
2018	強		戰、預	兩		負	V
2019	強	有				負	V
2020	強	有		巡	直、裝	負	V
2021	強	有	戰	巡	直	負	V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第四章 遏止印太軍備競賽之努力及侷限

面對共軍快速現代化及中共日益強勢對外作為，多邊安全機制是緩解各國對中共威脅認知的解方之一，在歐洲便有歐洲安全及合作組織，將區域內外的主要國家納入其中，共同抵抗外部威脅來源，並防範區域內國家再度交戰。當前印太區域雖然也有許多安全機制及相關倡議，然卻因中共消極參與而未能減緩各國對共軍現代化的疑慮，反而使印太軍備競賽逐年惡化。

基此，本章將在此基礎上，逐一探討印太國家藉由成立或倡議成立多邊區域安全機制，以解決區域政治分歧、軍備競賽的有關努力，分析其對遏制印太軍備競賽的成果、扮演何種角色，並指出此些努力成效仍不彰的原因。

### 第一節 印太重要安全機制及倡議

當前印太區域安全機制仍以東協為核心，大致可區分為東協區域論壇及東亞高峰會等東協主導的附屬安全組織、六方會談及南海行為準則等針對特定議題的多邊安全機制、中日韓高峰會、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為主的二軌機制，以及區域內外大國對成立區域共同體的相關倡議，涵蓋官方、二軌、尚未成立的多邊安全機制，主導國家及針對議題亦不同；故本節將介紹上述多邊安全組織及區域共同體倡議的成立緣起、成立宗旨及自冷戰結束以來的運作情形，探討其對解決印太區域軍備競賽可扮演之角色。

#### 壹、印太重要安全機制

##### 一、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東協區域論壇源自於 1991 年東協下轄智庫東協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提出，

希望透由擴大邀請具有貴賓或觀察員國家參與會議方式，共同討論安全問題，1992 年第四屆東協高峰會發表新加坡宣言，強調透過東協擴大外長會議強化在政治安全事務上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對話，1993 東協部長會議邀請中共、俄羅斯當作諮商夥伴，以及越南、寮國、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參加論壇，爾後於 1994 年宣布成立，包含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等東協 10 國及美、中、日、韓、俄、紐、澳、印度、蒙古、北韓、孟加拉、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帝汶、斯里蘭卡、加拿大、歐盟共 27 國（林正義，1996：1-3；朱安南，2005：54-56）。

首屆東協區域論壇主席聲明提到反對核武擴散、支持兩韓對話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原則，並致力為會員國家之間關係促進信心建立、預防性外交、政治安全等領域合作，同時研究具體防範核武擴散、維和合作、情報交換、人員訓練、加入聯合國武器登記等議題。第二屆則制定出首份概念性文件，確立各國在對等充分參與下，配合每年東協外長會議召開前由資深官員進行協商，以「信心建立－預防外交－解決衝突」的路徑解決區域分歧，並設立信心建立措施輔助小組、和平維持行動會議、搜救教員協調及合作會議 3 個小組會議，以強化對話諮商、聯合國武器登記、國防政策聲明、鼓勵各國進行軍事及人員交流，其中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扮演第二軌討論，輔助東協區域論壇的功能（林正義，1996：4-5）。2003 年東協峇厘島第二和諧宣言中提及 2020 年前完成超越軍事防衛聯盟與聯合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同時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修訂為開放性區域性組織，並開始每年出版年度安全展望（Annual Security Outlook）年報（朱安南，2005：53）。

在東協區域論壇架構之下，東協進一步於 2006 年成立東協防長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 Meeting），透過東協 10 國國防部長每年召會的方式增進對話、促進透明性、信心建立，以及設立海洋安全、反恐、維和任務、人道協助與救災、軍醫等五個專家工作組，2013、2016 年分別增設人道地雷行動、網路安全兩個專家工作組，在人道救援、災害防護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合作，並自 2010 年起

納入美、中、澳、韓、俄、印、日、紐等 8 國，成員共 18 國（吳尚書，2019）。

此外，東協防長會議在 2005 年通過《東協軍隊預備組關於人道主義救助和災難救援的參考條款》、《東協軍事醫學中心參考條款》、《東協軍隊與公民團體關於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參考條款》，明定東協軍隊如何藉官民合作，共同動員應對天然災害後，東協區域論壇於 2009 年 5 月舉辦「東協－志願反應展示」演習，係東協區域論壇首場演習。2011 年舉辦首屆「災害救助演習」，東協秘書處、東協人道援助協調中心、東協緊急迅速評估小組亦派遣代表參加，並成為東協首場大規模人道救援與天然災害演習。2013 年東協防長擴大會議陸續舉辦災害救援及人道援助、軍醫、反恐、海事安全等不同主題之演習，針對災害救援及人道援助建立情報交換、共同演習、召開會議等方面的常態合作機制（Zimmerman, 2014: 156-160），完善會員國之間對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合作模式。

除了非傳統安全演習之外，東協亦於 2017 年在泰國灣舉辦首屆「東協海軍多邊聯合演習」，包含東協 10 國及東協以外的 9 國共 19 國，強化多邊海上合作性及互相協作性，此係東協首度主辦海上演習（Nepomuceno, 2017），爾後更在此基礎分別與中共、美國舉行海上聯合演習（ASEAN Regional Forum, 2020: 216），以東協為主體加強與大國海上合作。然而，上述演習卻自 2017 年中斷，第二、三屆訂 2023、2025 年在菲律賓、馬來西亞舉辦（People's Army Newspaper, 2020）。

東協區域論壇及東協防長會議的設立係建立在東協和諧宣言及東南亞合作條約中的相互尊重主權獨立平等、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放棄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基礎上，藉由非正式、非對抗、追求共識的「東協模式」製造共同利益（朱安南，2005：54-56；Zimmerman, 2014: 160-165），並透過「信心建立、預防外交、解決分歧」的路徑，針對共同關心的政治安全問題建立建設性對話與諮詢平台，逐步形成共同認同及規範，進而在衝突前發揮調解、衝突後發揮促進和平的效果，以邁向更深層次安全合作（Choi & Tow, 2012: 32; Emmers & Tan, 2011: 44-60）。上述三階段中最重要莫屬信心建立階段，只要各國之間能形成共同利益

及認知，則可降低印太國家之間的威脅認知，進而有助於解決領土爭議及軍備競賽惡化的問題。



## 二、東亞高峰會 (East Asia Summit)

東亞高峰會源自前南韓總統金大中在 1998 年東協+3 峰會中提出透由成立「東亞願景小組」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於 2001 年成立「東亞研究小組」、2002 年完成評估報告，包含 17 個短期及 9 個中長期項目，涵蓋促進東亞研究、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強化文教機構對於促進東亞認同的作用等，研究如何透由讓東亞多邊組織更加制度化，在區域合作基礎上深化合作 (Emmers; Liow & Tan, 2010: 22-24)。東亞高峰會係以 1976 年東協高峰會及 1997 年第二屆東協非正式高峰會通過「東協 2020 年願景」，達成建立東協共同體的共識為基礎，其中峇厘島第二和諧宣言提及建立東協安全、經濟、社會文化 3 個共同體，後來因 1990 年代陸續納入中、日、韓 3 國形成東協+3 機制而轉型為成立東亞共同體，而非原本的東協共同體 (徐郁芬、楊昊，2006：86-89)。

首屆東亞高峰會於 2005 年 12 月在東協+3 (加上中、日、韓 3 國) 的基礎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形成東協+6 的形式召開，各國在東協部長會議後的吉隆坡宣言宣布開放性論壇有助促進印太國家之間的戰略、政治、經濟議題合作及形塑共同利益，故建立東亞高峰會的對話機制 (Emmers; Liow & Tan, 2010: 22-24)。2011 年美、俄成為會員國而變成東協+8 機制後，目前會員計有東協 10 國及包含中、日、韓、印度、澳、美、紐、俄等國在內的共 18 國 (張心怡，2012：52-53；Nita, 2021: 12-16)。

自 2005 年以來，東亞高峰會每年都由東協國家輪流主辦領導人論壇、部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大使會議，至 2021 年為止共舉辦 15 場會議，通常於第四季舉辦領導人峰會，部長則在針對上述討論議題進行細部討論，並決定各國領導人下屆討論的議題，資深官員則針對上述議題進行研究。東亞高峰會在環境能源、教育、財政、公衛、災害防護、連結性、糧食安全、經濟合作、海洋安全等領域

都設有小組會議，東協秘書處內亦有東亞高峰會小組（Nita, 2021: 6-18）。

東亞高峰會曾就禽流感防治、能源環境、氣候變遷、糧食安全、恐怖主義、基礎建設、智慧城市、跨境犯罪等方面發表過聯合聲明（Nita, 2021: 18-20），並於 2007 年成立經濟研究院（Emmers; Liow & Tan, 2010: 22-24），以加強研究如何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

東亞高峰會成立目標是納入符合與東協國家享有實質政經關係、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東協的完全對話夥伴國等條件的區域國家召開彈性領袖會議，針對廣泛議題進行對話，並由上而下發布宣言，以利在戰略、政治、經濟等共同利益之上促進和平對話、合作促進區域繁榮穩定（張心怡，2012：52-54）。另外，由於東協成員國之間性質不同，所以需要團結利用東協高峰會作為解決跨國議題橋梁，故納入東協之外的國家可協助建立東協共同體，使東協成為一個開放、包容、透明、外向之多邊區域合作與對話機制之主導者（Nita, 2021: 16），提升東協在印太政治安全事務中的領導地位。

### 三、中日韓高峰會（China-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Summit）

中日韓高峰會源自 1999 年中共、日本、南韓三國藉參加東協+3 會議之便，於會外召開三方會議，2003 至 2008 年期間陸續簽署「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國災害管理聯合聲明」、「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計劃」等協議，直至 2008 年起三國決定不再利用東協場合，而是在日本、中共、南韓三國境內輪流舉辦的方式進行。2009 年 10 月「中日韓合作 10 週年聯合聲明」，強調中日韓將秉承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將 3 國關係推向睦鄰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方向前進，2010 年 5 月更簽署「加強科技與創新合作聯合聲明」、「標準化合作聯合聲明」、「關於建立三國合作秘書處備忘錄」，並探討建立「三國防務對話」、提升三國警務領域合作（林正義，2010：36-38；廖舜右，2012：112）。



2011 年中日韓三國同意在南韓設立秘書處，同時通過「2020 年合作展望」，並建立外交、科技、資訊通信、財政、人力資源、環保、運輸及物流、經貿、文化、衛生、中央銀行、海關、智慧財產權、旅遊、地震等 17 個部長級會議及 50 多個交流對話機制（林正義，2010：36-38），尤其 2012 年 3 國同意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及簽署中日韓投資協定（朱鋒，2018：28），在經濟上取得重大進展。然而，雖然中日韓高峰會每年皆召開領袖峰會及資深外交官員會議，但曾於 2005 至 2007 年間、2013 至 2014 年間、2016 至 2017 年間，以及 2019 年後因故未召開會議（廖舜右，2012：121；朱鋒，2018：28-29；歐敬洛，2021）。

中日韓高峰會 2002 年成立目的旨在促進經貿、資訊產業、環保、人力資源開發、文化等 5 個領域合作，並從原本的經濟、文化領域逐步擴大為政治安全、經濟事務、科技環境、社會文化、國際議題 5 大領域（廖舜右，2012：117-120），希望先從經濟、文化領域方面破除三國之間的歷史仇恨及政治分歧，進而在區域議題及政治安全領域進行合作。

#### 四、議題性多邊安全機制

##### （一）六方會談（Six Party Talks）

六方會談源自 1984 年北韓同意加入與南韓、美國的三邊對話，以解決北韓退出《核不擴散協議》後發展核武計畫的問題，爾後 1988 年南韓提出加入日本、中共、俄國形成六方會談，美國 1996 年提出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工作小組，並在北韓觸發兩次核武危機後才在 2003 年召開首次六方對話，包含美國、中共、俄羅斯、北韓、南韓、日本 6 國（蔡東杰，2007：15-16）。六國在 2003 至 2007 年期間共召開 6 輪談判，其中 2005 至 2007 年期間取得最大進展，包括 2005 年的 9·19 共同聲明，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核計畫，以及 2007 年簽署落實共同聲明第一階段共同文件（2·13 文件）及第二階段共同文件（10·3 文件），北韓同意以核武去功能化，交換美國提供相關費用及將北韓自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移除，年底亦配合中美俄三國專家查核，並開始寧邊核設施去功能化、申報

所有核計畫及能力、接受國際原子能組織專家的審查，同時成立取消制裁、關係正常化、人質綁架、放棄核武、安全保障和東北亞安全機制建設等 5 個工作小組，探討建立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的可能性，以利透過六方會談平台同時處理區域內其他安全問題；但北韓仍於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機制，並持續其核武研發計畫（朱鋒，2007a：1-8；2007b：159-172），導致亦未再召開任何會議。

六方會談成立目的主要是為解決北韓擁核問題，企圖藉由 6 國協調北韓放棄核武及美國承諾不對北韓動武，達到促使北韓放棄核武計畫之路線圖，進而避免周邊國家相繼擁核，並讓兩韓簽署和平協議，解決韓戰爆發以來兩國政治對立的僵局（Liang, 2018）。上述顯示六方會談裁軍適用範圍僅止於朝鮮半島，且主要為北韓、南韓 2 國，故最多僅能促進朝鮮半島和平，而非擴及至整個印太區域。

## （二）「南海行為準則」之談判（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南海行為準則」之構想源自中共與東協國家爆發 1974 年西沙海戰、1988 年赤瓜礁戰役等衝突後，東協首次在 1992 年針對南海問題發表馬尼拉南海宣言，主辦國菲律賓強調希望與中共達成行為準則規範行為，後續更於 1999 年形成東協方案及北京方案，但雙方分歧包含範圍是否包含南海或南沙島礁、以雙邊或多邊方式解決、可否佔領無人島礁、是否與境外國家舉行演習、是否對漁業強制拘捕、是否達成準則等，故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與東協國家外長先於 2002 年在金邊簽署「南海行為準則宣言」，宣稱將致力於達成南海行為準則作為未來努力目標，並開始針對達成「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林廷輝，2019：105-106）。

中共與東協後續於 2005 年起草落實「南海行為準則宣言」指導方針、2011 年通過，內容包含設立海洋環境保護、科學調查、海上搜救、打擊跨國犯罪等四個小組，期間中共不願討論「南海行為準則」內涵，僅強調先落實「南海行為準則宣言」之指導方針，並拉攏柬埔寨、寮國阻撓東協 2012 年針對南海發表聯合聲明，導致東協外長首次無法達成共識。然而，東協之後仍達成「南海六點原則」共識，包含對全面履行「南海行為準則宣言」保證，落實「南海行為準則宣言」




指導方針、早日取得區域準則結論，尊重包括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採取自制及不使用武力，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等內容，並規劃以東協高級理事會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解決爭端機構及依據（林廷輝，2019：108-110）。

這段期間中共並未積極與東協國家就「南海行為準則」達成共識，直至 2013 年菲律賓向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中共方於同年 9 月召開第 6 屆落實「南海行為準則宣言」高官會，達成設立熱線、海上意外相遇準則、海事合作、海洋環境保護等方面共識，並每年與東協國家密集展開磋商，迄今召開 19 次高官會及 31 次工作小組會議。日後中共與東協 2017 年通過「南海行為準則」框架文本，2018 年完成「南海行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2019 年完成草案一讀，強調根據聯合國憲章、海洋法、東南亞友好和平條約及中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處理南海問題，包含建立具有法律拘束力、促進信任、管理衝突、確保航行自由等內容，並期望在 3 年內完成。中共不再堅持一對一談判，轉向同意透過「十加一」機制進行談判的態度轉折，係因中方認為菲律賓前總統杜特蒂上台後的菲中關係較為友好，草案內容較有利於中共主導，且菲國擔任 2017 年高官會及 2018 年東協主席國，進而導致「南海行為準則」談判在 2017 年後有所突破（林廷輝，2019：109-115；李毓峰，2018：125-130）。

「南海行為準則」的主要目的是為規範中共與東協國家之間因為領土爭議未解而發生的海上相遇事件，避免因此發生衝突，並非聚焦根本解決南海領土爭端，其中東協國家希望從中約束中共在南海行為，中共則盼藉此展現大國風範，同時排擠區域外大國介入與東協國家之間的主權爭議談判。而中共與東協國家向來沒有任何規範，經過「南海行為準則宣言」、「南海行為準則宣言」指導方針、「南海行為準則」草案一讀後，已在形成制度化規範南海行為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但自 2020 年起中共姿態轉趨強硬，迄今尚未見明顯進展。

## 五、二軌多邊對話機制

### （一）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源自東協 1988 年成立東協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ASEAN-ISIS)，整合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柬埔寨、越南、寮國 9 國相關智庫研究能量，以強化對東協外交政策研究。1992 年 11 月該智庫與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 (CSIS Pacific Forum)、日本國際關係事務研究所 (Jap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南韓首爾國際事務論壇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首爾召開一系列研討會形成漢城聲明，網羅非政府國際組織及政府官員以私人身份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對話機制，進行非官方多邊交流協商。1993 年 6 月發表吉隆坡聲明，宣布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建立以東協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為架構的非官方多邊對話機制，與東協區域論壇形成正式及非正式雙軌並行的安全合作機制(朱安南，2005：58-60)。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1993 年成立時即通過憲章規定成立目的、功能、會籍，並設立執委會秘書處及海洋安全合作、北太平洋工作、綜合性及合作性安全工作、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及透明化工作等 4 個工作小組，其中後者致力於擴大透明化及情報交流、支持全球核生化武器管制條約，以擴大現有安全合作基礎(林正義，1996：8-12)。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成立初期僅 10 個會員國，由學者組成會員委員會的方式申請入會，透過執委會設定議題，涵蓋預防外交、區域安全架構、海上秩序、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出口管制、能源等領域，以研究小組形式進行智庫對話，同時每年也會發行「區域安全概觀」(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報告。該理事會自 2010 年起被東協區域論壇官員諮詢意見，開啟一軌與二軌交流機制，並在 2007 及 2013 年兩度有官方人士出席小組會議，後續成員國亦由原先 10 國擴大至 21 國，但須為東協區域論壇會員(李瓊莉，2014：7-8；CSCAP, 2021)。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成立目的係為仿效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中的二軌智庫地位，提供亞太國家及地區建立信心及安全合作架構，以包容性原則鼓勵不同國家的代表討論區域安全問題及所

面臨挑戰、提供政策建議，並試驗區域安全合作極限（林正義，1996：8），以利將會中以私人身分參加的官員及學者所討論的結果，製作成備忘錄給東協區域論壇及相關政府部門參考（朱安南，2005：59）。上述顯示該理事會提供印太國家政府一個非正式、不具約束力之坦率交流平台討論區域安全問題，進而將討論成果給各自政府部門作為促進雙邊或多邊官方安全合作之基礎，以輔助既有官方對話機制。

## （二）香格里拉論壇（Shangri-la Dialogue）

香格里拉論壇成立於 2002 年，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新加坡國防部及多國政府、民間承包商共同舉辦，香格里拉論壇每年六月在新加坡舉辦，由各國國防官員、智庫學者、媒體記者、非政府組織人員透過發表公開演說、舉辦桌邊會議、提問等方式，共同討論亞太安全問題，過去曾討論議題包含朝鮮半島、台海、南海、反恐等，各國可自行決定派遣官員層級，其中美國率先派遣國防部副部長出席，爾後才改由國防部長出席（Taylor, 2011: 54-57；Lim, 2020），中共、緬甸、越南直到 2011 年才首度由國防部長層級官員出席（IISS Events, 2020）。

香格里拉論壇成立宗旨係透由非政府機構在第三國舉辦安全對話論壇方式，提供印太各國國防官員一個政策宣示、澄清意圖的平台，以及學媒界人士向各國官員提問的場合，會後無需發表聯合聲明，且討論內容對各國不具約束力，多國將該論壇視為試探彼此政策意圖、增進國防官員間溝通的對話機制（Lim, 2020）。

## （三）香山論壇（Xiangshan Forum）

香山論壇源自 2006 年中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聯合主辦的安全對話平台，原本每兩年舉辦一次，自 2014 年起改為每年舉辦一次，出席人士亦由原本的學者、媒體外，增加各國國防官員，尤其 2019 年俄羅斯國防部長出席是香山論壇首次有大國國防部長出席。2018 年更改名稱為北京香山論壇，最近一屆於 2019 年舉辦，由 76 個官方代表團共 530 人及 8 個國際組織代表在內的 1,300 名學者參與，其中包含 23 名國防部長。會中 4 個大會及 4 至 8 個分

論壇主題主要圍繞在大國關係與國際秩序、亞太地區安全風險、國際反恐合作、海上安全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然曾於 2017 年因軍改及反腐原因停辦，2019 年舉辦第九屆後亦因疫情原因迄未舉辦第十屆（陳世民，2019：15-16）。

香山論壇籌辦目的主要是為擴大印太國家之間交流、累積共識、增進互信、管控風險，「為維護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並與香格里拉論壇並存，「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亞太地區高端安全和防務對話平臺」，從中爭取中共話語權，避免國際輿論由西方聲音主導，以及提升共軍的正面形象（陳世民，2019：16）。上述顯示香山論壇同樣是增進印太國家之間互信的多邊對話平台，但由於其非官方性質、出席人士的代表性不足，導致該論壇仍非一個能調解區域分歧或阻止軍備競賽發生的有效多邊安全機制，頂多只是扮演多提供一個對話平台，以利達成共識的角色。

## 貳、印太重要安全倡議

### 一、「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最初於 2003 年東協第 9 屆峰會由印尼提出，原本是東協成立一個專門處理區域安全分歧的組織，並提高安全在東協重要性。後於 2009 年提出「2025 年東協共同體願景」，提倡建立以共同規則、共同認同及自由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和平穩定環境，並以東協為中心，加強包含東協秘書處在內的東協組織功能，以及與區域外國家合作，提升該區域的全面性安全（ASEAN Secretariat, 2015: 2-3）。其中政治安全部分包含政治發展、規則設定、衝突避免、衝突解決、和平重建等內容，強調放棄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解決分歧，以及毒品、人口販賣、恐怖主義、災害防護、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Caballero-Anthony, 2011: 34-35）。

「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成立目的是在東協國家之間創造公正、民主、和諧環境，形成一個強調全面性安全且具包容、和平、穩定、韌性的區域組織，

以利東協更有效回應安全挑戰 (Caballero-Anthony, 2011: 34-35)，同時也可保護區域內國家的公民免於種族滅絕、戰爭罪、種族清洗、反人道罪刑等人權問題 (Sukma, 2012: 136)，顯示東協有意藉由區域整合方式，解決東協內部各國政治體制差異、區域領土糾紛、人權紀錄不佳等問題，有意將東協的合作領域從經濟社會推進至政治安全領域。尤其首次嘗試對區域衝突發生前、中、後進行規範，以東協力量阻止成員國間的軍備競賽及衝突發生，也代表東協不只要功能性安全組織，亦有意朝一個區域安全架構方向努力。

## 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亞洲新安全觀」倡議 (New Vision of Security)

中共的「亞洲新安全觀」倡議源自前外長錢其琛於 1997 年在東協區域論壇中提出，隨後在此基礎上發表《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強調互利、互信、平等、協作及非傳統安全，並重申印太各國應摒棄冷戰思維、互相尊重安全利益、和平解決分歧、強化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秉持不結盟與不危及第三方利益等五原則，以達到持久和平 (楊名豪，2006：27-33)。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13 年 3 月延續上述倡議精神，提到命運共同體概念下的新安全觀，並於 2014 年在「海牙核安全峰會」及「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中首度提及「亞洲新安全觀」倡議包含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即以經濟發展與非武力方式保護東亞國家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共同應對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網路安全、能源安全、自然災害等方面挑戰，並強調「亞洲的事靠亞洲人民辦」，重申反對損害特定國家安全的行為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

中共外長王毅 2022 年更在習近平的「亞洲新安全觀」倡議基礎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其內涵包括堅持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作為理念指引；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反對恃強凌弱作為基本前提；堅持應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作為根本遵循；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作為重要原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反對戰爭和制裁作為

必經之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作為應有之義等 6 項堅持，除強調中共永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軍備競賽等 4 不外，亦重申中共對安全的認知包含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網路安全、生物安全等面向，以及促進多邊主義、反對外國介入自身內政等政策立場（王毅，2022）。

上述顯示中共有意藉由提出自身對促進區域安全之中國倡議，主導印太區域安全發展方向，同時消滅中國威脅論，減少國際對中共安全壓力，並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等重要國家戰略之推行（王緝思，2016：5-6）；然而，中共同時有意藉此反制美、日等國對中共發展軍力之質疑，並藉強調經濟、社會、文化、國際關係等面向之安全觀，稀釋軍事安全的重要性，為中共以和平崛起謀求經濟發展找到合理藉口，掩護自身欲加強掌控印太事務之企圖，並創造對中共有利的發展環境（楊名豪，2006：34-39），而非真正解決印太區域的政治分歧。

### 三、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自由繁榮之弧」倡議（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自由繁榮之弧」倡議最初源自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父親安倍晉太郎於 1986 年所提出之「創造性外交」，其核心理念包含強化與西方陣營理念合作、促進亞太區域及東方陣營互信、支持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交流、區域非武裝化及武器非擴散化等（Bochorodycz eds., 2018: 118）。爾後日本前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在安倍晉三第一個首相任期期間，於 2006 年在日本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首度提及「自由繁榮之弧」倡議概念，在安倍晉太郎基礎上指出日本應強化與共同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的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涵蓋區域包含北歐、波羅地海三國、中東歐、中亞、中東、印度、東南亞到東北亞，並在歐亞大陸外圍拉攏民主國家形成一條弧線（MOFA of Japan: 2006），這也成為美國「印太區域」概念之起源。安倍晉三在第二任首相任期期間再度提出此概念，但名稱變成「亞洲民主之鑽」，呼籲印太盟友合作，共同守護海上生命線，避免南海成為「北京湖」，進而防範中共海軍勢力擴張（Abe, 2012）。

日本提出「自由繁榮之弧」倡議之目的主要為拉攏澳大利亞、印度等民主國家，強化民主國家之間的認同感，以利達成共同立場，同時有利與俄國談判北方四島、向新興民主國家提供援助，增進日本參與國際事務印象（Bochorodycz eds., 2018: 123-124）。上述顯示該倡議是日本企圖團結全球民主國家，以促進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並藉此嚇阻中、俄等國軍事擴張行動，此舉亦強調日本在民主國家之中的領導角色，有意強化日本在世界民主陣營中的影響力。


#### 四、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東亞共同體」倡議(East Asian Community)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接續安倍晉三的「自由繁榮之弧」倡議，與時任外務大臣岡田克也 2009 年在訪美期間向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即比照歐盟，成立以中、日、韓為核心的共同經濟體，並先從統一貨幣開始，逐漸推進到政治安全領域，形成一個集體安全機制（Kraft, 2012: 64-67）。鳩山由紀夫 2009 年 9 月在「我的政治哲學」書中稱「東亞共同體」表示日本並未忘記自身亞洲身分，且必須做東、西方之間的橋梁，處理環境、武器大規模擴散、全球經濟危機等問題，同時成立類似歐盟的組織，推動共同匯率，在自主與和平共存的原則下促進貿易、財金、能源、環境、災害援助等領域合作及東亞區域整合，並共同承擔區域安全及經濟風險，以平衡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Bochorodycz eds., 2018: 164-168）。

鳩山由紀夫內閣陸續與越南、南韓、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印尼、俄羅斯等國進行對話，但原先只包含亞洲國家的立場，卻因美國反對而在 2009 年 10 月改成包含美國在內的「多層次功能性社群」，強調日本安全上仍需美軍協助（Bochorodycz eds., 2018: 169-174）。上述顯示鳩山由紀夫內閣較強調成立具亞洲特色的多邊安全組織，以解決印太安全問題，然在成員組成的立場上並未能達成前後一致。

#### 五、澳國前總理陸克文「亞太共同體」倡議(Asia Pacific Community)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2008 年 6 月首度提到在 2020 年之前



成立「亞太共同體」的構想，並將涵蓋美國、澳大利亞、中國、日本、印度、印尼等國，以利共同處理政治與安全議題，同時應對區域內的恐怖主義、經濟、環保、能源的挑戰，捍衛能源、資源、食品安全。陸克文更強調印太國家可以歐盟為範例，從建立開放的貿易體系開始 (Australian Parliament, 2009: 6-7; Kraft, 2012: 64-67)。對此，陸克文任命前澳大利亞駐印尼大使伍爾科特 (Richard Woolcott) 為特使，並就該議題與亞太國家交換意見 (劉德海，2010：15-16)。

陸克文強調「亞太共同體」倡議的成立目的係因現有區域組織未能涵蓋印太區域內的所有相關國家，例如美國、印度皆非東亞高峰會正式成員，印度亦非 APEC 成員國，故需成立一個涵蓋區域內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區域組織，以解決中共崛起、東南亞恐怖主義等挑戰 (劉德海，2010：15-19)。上述顯示澳大利亞也有意仿效歐盟成立一個以亞太國家為主的共同體，涵蓋經濟、政治、安全等層面，並藉此主導、參與亞太事務發展，同時解決區域內安全問題。



## 第二節 印太安全機制及倡議之成效評估

本節將討論前一節所論及的多邊安全機制及重要倡議在建構印太集體安全機制之成果及面臨制約因素，進而評估上述多邊安全機制對於防範印太軍備競賽之成效，並嘗試解釋印太多邊安全機制對解決區域安全問題迄今仍無法扮演應有角色的原因。

### 壹、印太重要安全機制之成效評估

#### 一、東協區域論壇運作仍停留在初始階段

東協區域論壇曾舉辦南海衝突研討會、討論朝鮮半島安全問題，並簽署東南亞非核武區、禁止核試驗、禁止殺傷性地雷等方面條約（林正義，1996：5-7），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重大進展，且有針對區域問題創立多邊意見交流機制，有助增加溝通機會創造良好氛圍，降低各國之間的對立，企圖找出共通點。但因東協區域論壇的成效仍取決於各國主權讓渡程度，部分國家不願評論敏感問題，達成協議後也沒有約束力，導致東協區域論壇雖然每年召開超過 200 個會議，仍淪為鬆散、缺乏決策核心的非正式官方論壇，「說的比做的多」（朱安南，2005：56-57），實質上為非強制性對話平台，對解決區域安全問題並無實質強制力。

此外，東協區域論壇近 30 年來的發展仍僅停留在「信心建立－預防外交－解決衝突」中的信心建立階段，迄今未能通過任何有效的軍備管制措施。在解決區域分歧方面，東協區域論壇只具有溝通平台的效果，兩岸及兩韓問題仍須依靠美國扮演關鍵角色（Tan, 2020: 31-33），顯示東協區域論壇仍然無法解決立即的軍事衝突。

與此同時，東協防長會議雖然舉辦多場演習，演習主題亦於近年從人道救援逐漸聚焦於聯合海軍演習，提高各國作戰部隊之間的互相協作性，但因東協防長

會議從未觸及共同防禦協定，且明文反對建立軍事同盟，當前亦僅在海洋巡邏、軍醫、人道救援、災害防護、維和部隊等低階政治議題進行合作(ADMM, 2021)，反映高階政治議題合作程度較低。

上述顯示無論東協區域論壇或東協防長會議對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合作機制相對成熟，但針對傳統安全議題仍停留在第一階段的信心建立階段，迄今在預防外交、解決分歧等毫無建樹，僅能透由增進軍備透明化、促進各國之間的溝通等方式，降低各國之間的誤判，仍無法解決各國之間的不信任及領土爭議問題，更遑論消弭各國的不安全感，以防範各國參與軍備競賽。

## 二、東亞高峰會成員國太廣，難以達成具約束力共識

東亞高峰會成功讓印太區域利益相關國每年定期舉辦領導人峰會，加強彼此之間的政治、經濟、安全領域的溝通，逐步形成共同願景，並在應對恐怖主義、傳染性疾病、能源等問題達成共識，但在促進區域安全方面僅在成立「東亞共同體」的說明中提及促進區域和平穩定，聯合聲明的合作內容亦僅限於非傳統安全領域，迄未就傳統安全議題達成實際共識(陳鴻瑜，2009：125-132)。顯示當前合作著重在非軍事安全領域，變成東亞高峰會為各國領導人設定合作議題、東協區域論壇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東協防長會議處理傳統安全問題的分工(張心怡，2012：64-65)，但仍無法形成有效集體安全機制。

即使是經濟或非傳統安全問題，東亞高峰會中的領袖宣言中多為外交辭令，政治宣示意涵仍大於討論實質合作細節，再加上缺乏執行機制，導致東亞高峰會的共識淪為目標遠大卻缺乏實務執行的決議(張心怡，2012：57)，仍無法針對多邊安全合作中的核心問題進行細部討論，進而無法解決印太安全問題。

此外，雖然東亞高峰會精簡東協+3、+6 會議，將區域內大國納入多邊機制，並確立以東協為中心的機制化對話機制，但仍受美中日三方角力及東協平衡外交的影響，尤其三方各自尋求對東亞高峰會主導權，並排擠對方影響力，導致東亞高峰會難以就安全問題形成共識(徐郁芬、楊昊，2006：95-9；Emmers; Liow &

Tan, 2010: 26-35)。上述顯示東亞高峰會在成員上雖然非常接近東亞共同體潛在成員國，但因其成員仍非純東亞國家，故仍受大國競爭影響，再加上東協的共識決議模式，導致成員國太多、大國關係不睦將限制東亞高峰會在安全領域成就，使每年領導人對話機制僅增加印太國家之間的對話平台，而未對區域安全議題發揮具強制力的決議，亦無法解決軍備競賽問題。

### 三、中日韓高峰會連成員內部分歧都無法解決

中日韓高峰會雖然已成立多個部長級會議及對話機制，但仍面臨若干問題，導致其無法在政治安全領域發揮任何作用。首先，雖然在經濟、文化方面的進展較多，但在政治安全領域仍僅簡略觸及災害救援、反恐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且僅止於交換意見層級，而未論及協調三方聯合行動（廖舜右，2012：1120），甚至迄今仍未能就三國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共識，顯示中日韓高峰會連經濟方面進展都有限，遑論政治及軍事方面。

此外，由於中日韓有歷史仇恨、領土爭議等分歧，2005 至 2007 年間因日中靖國神社爭議、2013 至 2014 年間因日中釣魚台及日韓獨島爭議、2016 至 2017 年間因韓中朴槿惠被彈劾及薩德系統事件，以及 2019 年後則因日韓於二戰期間強制勞工賠償及慰安婦爭議，而未能召開中日韓高峰會（廖舜右，2012：121；朱鋒，2018：28-29；歐敬洛，2021），顯示三國之間的各種組合都曾讓中日韓高峰會無法舉辦，亦凸顯三國當中的任何雙邊關係都有歷史仇恨或領土爭議問題，導致三方遲遲無法就政治安全問題達成共識，甚至連如期召開會議都面臨困難。

上述顯示中日韓高峰會雖然是一個藉由印太區域內大國團結形成一致立場的方式，進而促進印太區域安全的嘗試，然因三國之間彼此都有政治分歧，導致連三國之間的經濟層面合作都難以推進，遑論政治安全領域，甚至擴及整個印太區域範圍。中日韓高峰會連當前三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及政治緊張都無法化解，更無力觸及印太區域領土爭議及軍備競賽問題。

### 四、議題性多邊安全機制

### (一) 六方會談成員國仍無法阻止北韓發展核武

六方會談是僅針對北韓核武計畫的安全機制，但最終仍然未能有效阻止北韓核武計畫的發展。雖然 2007 年因美國同意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名單中除名，布希政府亦多次聲稱願意提供書面安全承諾、不謀求北韓政權更替，使北韓聲稱願意放棄核武設施，曾短暫取得正面的進展。但後續因北韓於 2005 年發布擁有核武宣言且於 2006 年首度核試爆，促發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718 號決議，譴責北韓行徑，並對北韓實施經濟制裁。2007 年北韓與美國關係又因澳門匯業銀行資金遭凍結及偽造美元事件而降至冰點，導致北韓於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會談機制，並重啟寧邊核設施，甚至在 2010 年製造天安艦事件及延平島砲擊事件，升高朝鮮半島緊張局勢（蔡東杰，2011：61-67；朱鋒，2007b：161-168）。爾後北韓又於 2016 至 2017 年重啟核試驗，促使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2018 至 2019 年間兩度於新加坡及越南河內舉行會談，試圖藉由美朝直接對話說服北韓棄核，但雙方仍未能達成共識，且即使中共多次呼籲，亦未能重啟六方會談（Kim, 2020: 122-124; Liang, 2018）。加上北韓 2022 年 9 月通過《核武政策法》，重申拒絕放棄核武立場，並明訂動用核武的時機（廖禹揚，2022），凸顯北韓態度一再反覆使得該會談未能達到勸阻北韓放棄核武的目標。

再者，由於六方會談牽涉多國，各國在朝鮮半島利益分歧也是導致國際無法團結施壓北韓放棄核武的重要原因，中共希望美國終止對北韓實施的制裁，甚至減少朝鮮半島駐軍；北韓則要求整個朝鮮半島裁軍及美國安全保證，甚至是利用核武計畫換取國際援助，而非真心放棄核武；日本則強調處理與北韓之間的人質問題；美國則堅持北韓需先履行承諾才願撤銷制裁；南韓亦不願配合美國關閉金剛山、開城工業區的要求（朱鋒，2007a：1-8；2007b：165），有利北韓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分歧，伺機要脅各國，推進自身利益。

此外，六方會談制度上缺乏強制力及仲裁者，只是一個依賴共識決的軟多邊主義，達成共識需全部成員同意，且各成員可說退出就退出，等同各國皆有否決

權，因此才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結果，例如 2007 年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北韓爆發洪災及糧食危機、南韓總統盧武鉉屬溫和派（朱鋒，2007b：157-159、167），進而導致六方會談連促使北韓放棄核武的目標都無法達成，更遑論解決兩韓軍事對峙緊張，以及整個印太區域的軍備競賽問題。

## （二）「南海行為準則」成效仍取決於中共配合意願

「南海行為準則」雖然即將通過，相較 20 世紀末中共與東協國家之間頻繁發生衝突而沒有相應規範，已取得重大進展，但未必能避免南海爆發衝突。首先，「南海行為準則」迄今尚未通過，且美中大國博弈促使東協國家態度日趨強硬，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印尼 2019 年相繼向聯合國提出外交照會，控訴中共侵犯自身南海主權，進而導致「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度緩慢（Hoang, 2020），未來是否能由東協各國立法機構通過仍存疑慮（林廷輝，2019：102-104）。其次，鑒於中共反對，草案中仍缺乏區域範圍定義、執法仲裁機制，且中共仍施壓東協國家將共同開發資源、聯合軍演、防止域外國家介入等內容納入，凸顯即使「南海行為準則」三讀通過，並由各國立法機構批准，具體執法成效及約束力仍取決於中共配合程度（林廷輝，2019：115-116）。再者，除了柬埔寨、寮國較親中，可能破壞東協團結之外，菲律賓、越南等國會否私下與中共就共同開採資源達成和解，亦可能破壞東協團結，形成對中共有利局勢（林廷輝，2019：116-120）。

綜觀上述情勢發展，「南海行為準則」雖然讓各國在南海活動更具規範，但仍未能防止南海島礁軍事化或爆發衝突，無法解決各國的安全疑慮及領土爭議，進而無法促使各國放棄在南海軍事投資。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係因南海仲裁案而對「南海行為準則」轉為積極態度，但中共仍盼透過與爭議相關方進行雙邊談判方式，取得談判優勢，而非被多邊安全機制約束自身行為，故中共未來仍將迴避關鍵問題，並按照自身利益來決定「南海行為準則」的履行程度，尤其聚焦排除美國等域外大國干預能力。此將導致各國仍將以充實自身軍事實力方式，累積解決南海領土爭議的籌碼，在缺乏強制力及仲裁機制情況下，連避免衝突發生亦無力

實現，遑論「南海行為準則」僅適用於南海範圍，而不包含印太區域其他熱點。

## 五、二軌多邊對話機制

### (一)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缺乏官方背書無力限制國家行為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非官方、包容性質使其在促進區域國家互信方面具有一定成效，尤其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及透明化工作小組強調亞洲文化價值優先、以各國共同合作意願為前提、重視雙贏及漸進方式達到建立信心與安全措施目的，並鼓勵各國發表國防白皮書、參與聯合國武器註冊、從事軍事互訪及軍事交流、參與共同軍演等活動，且納入北韓、印度等國家，對後續印太國家相繼發表國防白皮書、加強國防透明化、舉辦聯合軍演等方面具有重要影響（朱安南，2005：62-63）；然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除了促進印太國家的軍事透明化之外，並未能解決區域國家之間的領土爭議或軍備競賽問題。

首先，由於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非官方性質，其會議結論本身不具約束力，仍有賴各國政府或官方多邊機制決議方具強制力，故永遠無法獨力處理領土爭議或軍備管制等政治問題。其次，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仍未明確定義安全合作議題，且仍僅限東協區域論壇成員作為正式會員，迄今未包含台灣（Chong, 2022: 193-209; 朱安南，2005：62-63），導致該理事會決議未能擴及至印太整個區域，亦缺乏明確的長期合作目標。綜合以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具輔助東協區域論壇促進印太國家之間互信的功能，以利在互信基礎上形成共同認知，進而有助印太國家在多邊安全機制中就政治安全議題達成共識；然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本身並不具備達成具強制力之決議，故對區域國家領土爭議或軍備競賽議題最多僅止於促進互信的角色，無法限制國家行為，遑論阻止軍備競賽的發生。

### (二) 香格里拉論壇淪為各說各話對話平台無力解決爭議

雖然香格里拉論壇是一個討論區域安全議題且有印太各國國防官員出席的多邊安全機制，尤其 2009 年美、日、韓三國曾藉此平台討論北韓問題，且相較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每三年召開一次更頻繁召會，故為更重要的對話平台；然而，

由於該論壇是由國際民間團體主辦，非正式的多邊組織，且沒有發表聯合聲明，故不必有實質結論，討論成果也不具約束力，淪為各國官員「各說各話後就回家」處境（Taylor, 2011: 58-62；Lim, 2020），進而無法協助解決印太區域領土爭議或軍備競賽問題。

此外，香格里拉論壇時常演變成美中相互指控對方擴軍或就中國威脅論進行攻防的平台，不時出現不歡而散的情況，反而更加刺激大國競爭及國家之間的不信任（Taylor, 2011: 55-57），違背原先增進區域國家間互信及釐清彼此政策意圖的初衷。上述顯示香格里拉論壇是有印太國家國防官員出席的重要二軌機制，有助增進軍事互信及對話意願，但因缺乏官方背景，導致其未能形成具約束力之決議，且因多數會議淪為各國闡述自身立場情形，各國間不信任反而因此加深，故無法發揮多邊安全機制的功效。整體來說，香格里拉論壇或可作為催化印太多邊安全機制的重要踏板，但本身並無能力解決印太安全問題。

### （三）香山論壇公正性受質疑反成中共外宣平台

香山論壇與香格里拉論壇性質類似，扮演增進印太國家之間溝通的角色，但由於多項制約因素導致其影響力仍不如香格里拉論壇。首先，會議內容仍由中共全程掌控，舉凡人員邀請、議題設定、議程安排、發言順序、媒體發文及報導皆由中共一手操控，例如 2016 年紐西蘭、新加坡代表有關南海發言遭主持人批評（陳世民，2016：33）。2018 年甚至沒有南海議題，以及媒體採訪僅限親中學者，網路報導亦多為中共媒體（陳世民，2019：15-17），凸顯香山論壇的與會者無法真正坦率交流。其次，主辦的中國軍事科學學會是中共中央軍委下轄研究機關、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則多為退役軍方人士組成，公正客觀性有待質疑，且西方國家出席層級仍僅止於國防部局長級官員、駐陸武官、國防部直屬智庫人員，最高也是 2019 年的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出席層級偏低（陳世民，2019：17-18），反映香山論壇的代表性及議題開放性皆不如香格里拉論壇。再者，香山論壇並非每年舉辦，期間仍因各種原因而有 3 年停辦，顯示其仍非成熟的多邊安全機制。綜

合以上，香山論壇反而逐漸淪為宣揚中共觀點的統戰平台，企圖擴大國際親中輿論，故連溝通、增進互信的效果都有待質疑，遑論發揮調解區域分歧或阻止軍備競賽的效果。

除了香山論壇外，中共亦於 2020 年舉辦首屆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由南海研究院邀請美、日、澳、英、菲等 10 國共 500 名學者與會，討論建構多邊海事治理機制、共同開發南海資源、保護海洋環境等議題（中國南海研究院，2020），但這同時也淪為中共宣講自身政策與理念之學術平台，也並未具備協調區域分歧功能。另一個重要二軌對話機制是雅加達國際防務對話（Jakarta International Defence Dialogue），該對話於 2011 年由印尼國防部主辦，逾 40 國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其中包含高階國防部長及軍方代表，探討區域軍事合作及周邊熱點議題（Baviera, 2012: 130），但該對話問題與香山論壇相同，自 2014 年舉辦第四屆後迄未舉辦後續會議，顯示該對話並未形成固定機制，亦無法在促進印太多邊安全合作方面產生作用。

## 六、小結

印太的區域安全機制冷戰時期多以美國主導的「中樞和輪輻網路」（Hub and Spokes' Alliance Network）為主，此網路主要為美國與印太國家所建立的雙邊軍事關係，其中多為共同防禦條約，但彼此之間並無互相協作性。近年來逐步轉變至以少數國家所組成的「複邊主義」（Minilateralism），即透由統合更多國家之間利益、尋找區域內國家之共同點，做為進入多邊主義的過渡期，但同時可避免容納太多國家所衍生的利益調和問題（Tow, 2019: 232-241）；然而，「複邊主義」為人詬病係大國單純在各自陣營中建立「小圈圈」，增加互相協作性、擴大適用地理範圍，卻反而讓具有集體安全功能之區域安全機制更難形成。

雖然在 1997 年金融危機背景下，印太多邊機制發展在經濟方面有諸多進展，包含初步的關稅減免、貨幣交換機制、基礎建設投資貸款都有具體成果，尤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



2020 年完成簽署，但在政治及安全方面仍進展有限。當前有效多邊機制多為經濟、反恐、反海盜等非軍事或低政治領域合作，較為成功的經濟領域也並未進展至歐盟擁有共同市場、貨幣的程度。有效的軍事合作機制亦僅為官方對話或特定議題平台，或是由雙邊、少數國家所形成，且主要以美、中俄兩大陣營對抗為核心，成員國涵蓋性不足，其中成員甚至多為區域外國家，且彼此之間互相對抗，不利區域整合共同利益。專門處理特定議題機制亦無法解決問題，如六方會談、「南海行為準則」等，單純由印太國家組成的有效機制也僅處理低階安全議題，例如反恐及跨境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但也未見具體仲裁者去處罰違規國家，導致在處理區域政治分歧、領土爭議等問題時成效不足。

以實際案例而言，印太多邊機制未能解決 20 世紀以來的南海、台海、東海、印中邊界主權爭議，也無力阻止 1999 年東帝汶獨立公投衍生的暴力鎮壓、2007 年緬甸軍事鎮壓抗議群眾、2011 年泰國與柬埔寨因柏夏寺領土爭議爆發衝突，甚至連印尼火耕事件、金融危機等經濟社會領域危機都無法有效處理，各國寧可訴諸聯合國機構等全球多邊機制來解決爭端（Jones & Jenne, 2016: 219-231; Kraft, 2012: 68-71），也不願訴諸現有的印太多邊機制，凸顯現有的印太多邊機制存在許多問題，不但無法調解成員國之間的爭議，更無法阻止武裝衝突的發生。

## 貳、印太重要安全倡議之成效評估

### 一、「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目標過廣導致議題失焦

「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雖然在人權議題上有若干突破，包含 2009 年成立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AICHR），並於 2012 年通過《東協人權宣言》（AHRD），以及設立提升及保護婦女與兒童權利委員會（ACWC），看似在人權議題上形成制度性規範，也是東協在政治議題上具有企圖心的願景；然而，實際成效仍取決於東協國家主權讓渡程度（Caballero-Anthony, 2011: 38），且由於東協標榜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及共識決機制，政治發展中的人權投票機制、反對違憲及

非民主政權輪替有干涉內政嫌疑，導致部分國家不願配合，例如泰國、菲律賓傾向以武力解決南部叛亂問題，故認為只要沒有大規模屠殺即可（Caballero-Anthony, 2011: 34-35; Sukma, 2012: 144），而非真正促進東協區域人權發展。

此外，「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所強調全面性安全涵蓋範圍太廣，包含政權穩定、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等面向，導致共同體的目標過於失焦，無法聚焦於軍事安全議題，且雖然強調防範區域衝突、保護人權等目標重要性，但又只是一個政治藍皮書文件，缺乏具有執法與仲裁機關的法律約束力（Sukma, 2012: 140-143），導致該共同體空有藍圖，而沒有維護自身目標的手段。整體而言，「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倡議是東協企圖以一個區域組織整體去回應各國內部紛爭的努力，雖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代表東協以區域組織解決內部政治安全議題的意志；然目前該共同體仍以非軍事安全議題為主，且仍處於倡議性質，無力協調區域國家之間的分歧或促進區域和平。

## 二、「亞洲新安全觀」倡議聚焦宣揚中共主張僅具政治宣傳目的

中共所提「亞洲新安全觀」倡議或「全球安全倡議」迄今並未得到任何印太區域大國或東協支持，主要制約因素為美中大國競爭，各國多不願選邊站，且美、日、澳、印等國已組成「四方安全對話」，以因應與日俱增之共軍威脅，東協亦缺乏強勢領導人團結東協國家，形成一致對外政策（王緝思，2016：10），導致上述主張因未獲得印太國家廣泛響應而淪為中共之單邊主張。

此外，中共自身作為亦違反「亞洲新安全觀」倡議或「全球安全倡議」之核心意涵，1980年代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所強調「新安全觀」中的「共同安全」概念是反對以保證相互毀滅、嚇阻為核心的攻勢國防思維，而強調以防禦性武器為主，建構各國防禦優勢，以降低他國威脅意識（陳世民，2019：18-19）。但中共實際作為卻非如此，例如仍持續排斥美國等區域外國家參與印太事務、對周邊國家以軍事力量進行恫嚇、不承認具國際法效力之南海仲裁案、對不符中共利益之周邊國家政策實施經濟制裁等，事實上違反自身開放包容、反對恃強凌弱、遵循

聯合國憲章宗旨、反對制裁等立場，反而突出中共「說一套，做一套」本性。與此同時，「亞洲新安全觀」倡議或「全球安全倡議」本身並未提出能有效化解印太國家彼此之間敵意、軍備競賽等問題，而更像是為突出中共對印太事務領導力，增強中共對印太區域發展話語權，導致中共「亞洲新安全觀」倡議或「全球安全倡議」屢遭各國質疑，而未能獲得印太各國配合及支持，無法發揮促進印太區域安全或阻止區域軍備競賽發生之作用。

### 三、「自由繁榮之弧」倡議僅衍生成印太戰略及「四方安全對話」

「自由繁榮之弧」倡議在歐洲及中東國家曾取得部分成效，尤其歐洲國家於安倍晉三在北約演講後，同意對北韓核武計畫持一致立場，並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中東國家簽署石油協議（Bochorodycz eds., 2018: 124-130），反映日本在拉攏歐洲、中東國家方面確實取得部分成效。

然而，日本在拉攏其他國家方面卻不如歐洲、中東國家順利，當時中共認為日方此舉在圍堵自己，俄國則認為該倡議恐排擠俄羅斯在東亞利益，而澳大利亞政府在前總理陸克文領導下，與印度一致認為不應排除中共參與對話，因此不願參加「四方安全對話」，導致「自由繁榮之弧」倡議無法獲得重要民主大國支持（Bochorodycz eds., 2018: 129-131）。

此外，日本外交部門也因安倍晉三不願傾聽外交官僚的意見，一意孤行主導外交政策，而未積極推動安倍晉三的「自由繁榮之弧」倡議，除了親台、親美派人士及自民黨保守人士之外，日本政府官僚自身都因擔憂太針對中國，且恐激怒二戰期間被日本侵略國家而反對該倡議，導致「自由繁榮之弧」倡議在安倍內閣2009年敗給民主黨後並未繼續推行（Bochorodycz eds., 2018: 117-130）。然而，該倡議成功說服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對話」，並成美國印太戰略起源（Madan, 2020）。

上述顯示，「自由繁榮之弧」倡議是因日本政府內部自身都反對的情況下，而沒有積極推動，更遑論爭取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民主國家支持。該倡議雖然曾團結歐洲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協調一致立場，甚至衍生出「四方安全對話」，

但仍未就對中武器禁運立場達成共識 (Bochorodycz eds., 2018: 124-125)，凸顯該倡議也尚未就防止軍備競賽方面達成任何成效，反而因該倡議遭美方轉變為具有圍堵中共性質的印太戰略，而使印太區域軍備競賽問題更加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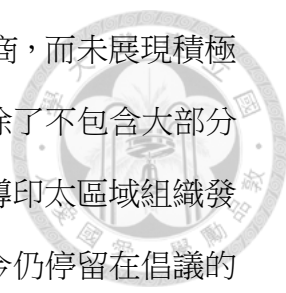
#### 四、「東亞共同體」倡議因美國及內部官僚消極以對而無疾而終

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倡議最終同樣也面臨日本內部及美、中等國反對，而未能達成目標。在內部反對方面，日本部分內閣成員擔憂若無美方角色恐破壞美日同盟關係，並讓焦點聚焦於美軍是否遷離駐日基地，進一步損害日本安全，導致日本政府內部是親美及中間派都反對，僅自由派支持以發展經濟目的，降低與美國間的安全同盟；另日本各政府部門間缺乏政策協調、沒有行動計畫，尤其鳩山由紀夫自身一方面強調亞洲性，卻對於是否包含亞洲之外的國家未能達成前後一致之立場 (Bochorodycz eds., 2018: 158-163)，也使該倡議因內部缺乏共識而失敗。

此外，在外部反對方面，由於此構想因排除美國而遭美方強烈反對，中共亦因日方後續同意納入美國，且不願日本主導東亞區域組織而並未明確表態。東協則因強調東協主導角色，亦未給予支持，導致鳩山由紀夫之「東亞共同體」倡議也因國際反應不佳而無疾而終 (Bochorodycz eds., 2018: 166-168)。上述顯示鳩山由紀夫內閣在安倍晉三「自由繁榮之弧」倡議失敗後，嘗試以建立亞洲特色多邊組織方式，解決東亞國家之間的安全議題，但仍因日本國內外都無法達成共識，而未能協助調解區域分歧，更未能解決印太軍備競賽問題。

#### 五、「亞太共同體」倡議未獲國際響應僅停留在倡議階段

陸克文「亞太共同體」倡議最終因未能獲得印太區域內主要國家及東協響應，而無法繼續推動。首先，中共因不滿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渲染中國威脅論，僅重申應以既有區域機制為主，消極以對；時任美國總統布希 (George Bush) 則因忙於總統大選、不滿澳國撤出伊拉克而未表態支持；日本係因認為澳國政府過於親中，且日澳因為鯨魚捕殺事件、澳國總理外交出訪未先赴日等因素而不積極；東



協則因堅持東協中心性，並向澳大利亞政府抱怨未先與東協協商，而未展現積極態度（劉德海，2010：17-18）。綜觀上述發展，陸克文的構想除了不包含大部分東協國家，而難以獲得東協支持外，亦因大國不願澳大利亞主導印太區域組織發展，而不願積極響應，最終導致陸克文「亞太共同體」倡議迄今仍停留在倡議的階段，未能發揮促進區域和平、阻止軍備競賽發生的功能。近年澳國政府因積極配合美國印太戰略，而更難得到中共、東協國家支持，亦無後續推動規劃。

## 六、小結

印太區域重要多邊倡議的成效多僅在經濟整合及反恐等低政治領域，例如「東亞高峰會」如期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轉變為 RCEP、印太戰略也形成美、日陣營的主要印太政策主軸。然而，上述主張仍未能形成一個能有效解決區域政治問題的集體安全機制，主要原因為成員國無法包含區域內所有國家，且各自有主導區域的政治考量，其中美、日與中、俄陣營相互排斥，東協也強調其中心性，不願接受區域大國領導，反而形成各自陣營強化自身「小圈圈」的指引。此外，倡議中的許多概念仍很模糊，沒有具體願景、仲裁者進行爭端解決、對違反規則國家發揮強制力等，且部分國家對印太區域的投入程度隨政黨輪替有所改變，引發區域內國家的擔憂，進而使得上述倡議未能獲實踐及區域內國家大規模響應。

表 4-1：印太重要安全機制及倡議之發展及成效評估

機制及倡議名稱		主要進展	成立宗旨	成效評估
東協相關組織	東協區域論壇	促進公開透明、禁止核武試驗、建立軍演機制	以信心建立、預防外交、解決分歧促進和平	仍停留在信心建立階段且未能調解分歧
	東亞高峰會	每年舉辦領導人、部長、資深官員層級會議	納入利益相關國進行領袖對話	成員國太廣導致領袖宣言多為外交辭令
	中日韓高峰會	建立秘書處及 17 個部長級會議、50 項對話機制	化解三國間敵意並促進政治安全合作	多次因政治分歧停辦，且合作仍停留在經濟領域
議題性組織	六方會談	成立 5 個工作小組，並曾就北韓棄核議題達成共識	促成北韓棄武及美國承諾不對北韓動武	北韓 2009 年退出，迄今已進行 6 次核試驗
	南海行為準則	完成草案一讀，設定完成磋商時間目標	建立避免各國在南海發生衝突之機制	迄今尚未簽署且定義不明、無仲裁者
二軌多邊機制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設立 4 個工作小組，並定期舉辦研究小組會議	以非正式討論促進官方合作	會議結論不具約束力
	香格里拉論壇	每年邀請印太各國國防部長進行安全對話	提供政策宣示、澄清意圖、媒體提問的平台	不用發表聯合聲明，淪為各說各話平台
	香山論壇	每年邀請各國國防官員進行安全對話	擴大交流、累積共識、增進互信、管控風險	中共控制人員邀請、議程、媒體報導
相關安全倡議	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	成立保護人權及婦女與兒童委員會	將東協合作領域從經社領域推進至政治安全領域	議題無法聚焦軍事安全且缺乏仲裁機構
	亞洲新安全觀	強調非傳統安全、零和思維、改善民生等概念	建立中國主導之安全機制並反制中國威脅論	中共說一套、做一套，導致未獲國際響應
	自由繁榮之弧	拉攏中東國家並衍生成四方會談及印太概念	以日本為首團結民主國家共同應對中俄挑戰	中、俄、澳、印及日本內部官僚反對
	東亞共同體	向印太國家宣揚亞洲版歐盟理念	成立中日韓為核心經濟體並擴展至安全領域	美國及日本內部官僚強烈反對
	亞太共同體	向印太國家宣揚亞洲版歐盟理念	建立類似歐盟的亞太經濟共同體	美、中、日及東協反對澳國主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 第三節 相關安全機制及倡議之侷限




本節將依照前面兩節所論及當前印太區域安全機制及相關倡議的源起及其成效，進一步從大國影響力、區域整合及體制、個別國家等方面，探討為何印太區域安全機制及相關倡議無法形成有效運作的體制，亦未能解決區域內主權爭端，並指出其所面臨之侷限及未來可能精進方向。

#### 壹、大國影響力因素

由於美國綜合國力獨霸全球，與大部份印太國家軍力差距較大，軍力不對稱的合作效益較小，美國寧可仰賴自身軍力解決問題。此外，美國也擔心加入多邊安全機制後其他印太國家會有搭便車（free ride）行為，致使美軍負擔過大的責任及財務支出（Lee, 2012: 73-75），因此寧可以雙邊軍事協定方式捍衛自身印太利益，不願與印太國家在多邊組織中平起平坐，故加入區域安全機制意願也較低（Hemmer & Katzenstein, 2002: 575-607; Baviera, 2012: 122-123）。這同時讓印太國家之間缺乏美國這種大國的支持，而更難形成一個有效的安全機制。

除了美國消極以對外，中共的排美立場也是區域安全機制形成的阻力之一。由於中共希望主導印太多邊機制發展的主觀意願，並對美、印、澳等域外國家的參與抱持懷疑態度，認為此舉旨在圍堵中國（Kraft, 2012: 79-80），再加上堅持以雙邊談判方式解決領土分歧的政策，以利用自身龐大國力對有相關爭議的國家「各個擊破」，藉此取得談判優勢，並避免因加入多邊安全組織所衍生的限制，而延遲自身軍事現代化步伐，進而損及國家利益（Baviera, 2012: 151）。因此中共在多邊安全組織的主要目標為排除區域外國家加入印太區域組織，同時藉機搶占主導權，而非真正有心建立有效運作的機制，尤其習近平上任後中共日益強硬的對外作為，成為區域安全合作的阻力之一。

雖然美中其實在特定議題上樂見對方參與印太多邊機制，例如中共寄望美國



利用既有雙邊機制及影響力牽制日本再軍事化及台灣推動獨立進程，美國也想將中共納入多邊體制中，藉多邊機制牽制其日益崛起的野心（Han & Luo, 2012: 115-116），但美中雙方在政治體制、經貿規則、台灣議題、軍事安全等領域有分歧，且兩大國都有各自的盤算，不願印太區域內國家真正獨立自主，進而影響自身在區域中的利益，反而相繼利用這個平台推進自身外交利益，聚焦藉此爭取在區域之主導權。例如美國利用印太多邊機制作為抵禦中共及維護自身全球霸權工具、中日兩國則將印太多邊機制用於釋放經濟誘因，擴大自身在印太影響力的平台（Jones & Jenne, 2016: 232-234），使得既有印太多邊機制皆淪為大國對印太國家施展大國影響力的工具，卻非真心維護區域和平穩定，且未使區域安全機制發展更加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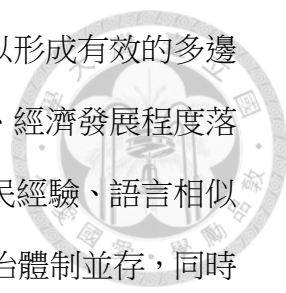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因擔心美國政治承諾不確定性而不願太過依賴美國的保護（Grossman eds., 2019: 6-7），並因東協擔心喪失自主地位、任由區域外的大國主導，而不願支持任何大國主導的多邊機制，反而更加著重平衡大國之間的關係（He & Feng, 2020: 164-167），導致區域安全組織中成員國太多，各大國、區域組織之間的利益不同，且各懷私心、各自角力，最終使得多邊安全機制遲遲難以成形，也難以發揮解決區域政治分歧的功能。

上述顯示無論區域內、外之大國或成員國，都因自身想主導區域組織發展之私心，而僅有限度支持區域多邊組織發展，對自身有利則支持、不利則消極以對，促使多邊組織難以具備有效調解能力。未來隨美歐與中俄兩大陣營對力持續升級，東協勢必得在兩大陣營中取得平衡，無法支持單一陣營的多邊主義方案，而印太多邊組織若無美中兩大國的支持亦將難以有效運作，故美中兩國的和解、合作意願將成印太安全機制是否能有效運行之關鍵。

## 貳、區域利益整合及體制因素

印太多邊機制整合的另一困難主要也來自印太國家之間缺乏共同性，且缺乏





共同利益或歷史記憶使得印太區域更不容易形成共識，進而難以形成有效的多邊機制。此外，相較歐盟多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文化背景相似、經濟發展程度落差較小的情況，印太國家間則存在政治體制、宗教信仰、被殖民經驗、語言相似性、經濟發展程度等方面的巨大不同。例如印太國家由多個政治體制並存，同時包含民主、軍政府、共產、君主立憲等制度，與歐盟成員國同屬民主國家不同(Tow, 2019: 236-240)，導致區域國家所追求利益不同而難以統合，更難比照歐盟形成政治安全共同體。

與此同時，印太國家並不存在共同敵人，各國對威脅認知與定義皆不同，且關係錯綜複雜，多個雙邊國家組合之間甚至互相具有領土爭議及歷史仇恨。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雖然有領土爭議，卻能聯合應對印尼火耕問題，並同時存在於五國聯防機制中(Baviera, 2012: 122-123)。中共及南韓與日本因歷史仇恨及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鬧翻，各自對彼此意圖懷疑，卻能合作共同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並組成「東協+3」的區域機制(Choi, 2012: 34-38; Iwama, 2012: 126-132)，凸顯印太國家之間因缺乏共同的歷史經驗，各自有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情緒，導致區域國家只能在有限議題上合作，迄今仍缺乏凝聚力與危機意識處理政治分歧。

上述區域爭端中，不同熱點之間也因歧異性太大，難以透過單一安全機制或解決方案處理，例如兩韓及兩岸之間是國家代表權的競爭，彼此之間並不承認對方的合法性，甚至阻止國際社會加入調解，而東海、南海、印中邊境則是跨國之間的爭議，不同案例之間的爭端起因、相關國家組成、多邊調解進度皆不同(Tan, 2020: 31-33)，印太區域爭端更加多元，單一多邊安全組織恐無法一體適用，無法一勞永逸解決。

當前印太較有效多邊機制仍以東協為主，雖然東協也標榜開放、包容等價值，但東協仍較注重領導人之間的非正式對話與共識決，而非正式法律制度，盼藉此避免公開不合，並顧及部分國家的顏面。例如東協區域論壇中其實有預防性外交、反恐、海洋安全、災害防護等合作對話平台，卻缺乏執行機構、明確的法律效力

及懲罰機制 (Kraft, 2012: 71-83)。這也進而造成東協的聯合聲明字眼變得模糊，無法發揮實際效果，且共識決制度也有利於外部國家尋找一個國家反對即可打破共識，例如東協區域論壇中的成員國太多，其章程中僅提到只要能「對區域安全有貢獻者」即可加入，定義模糊、籠統 (Choi & Tow, 2012: 27-29)，更不易達成有效的多邊協定。另中共多次拉攏柬埔寨、寮國等國反對東協外長會議納入南海議題，使東協難以利用多邊機制增加與大國協商籌碼，並淪為無強制力的對話，以及無主導者、無仲裁者、無執行者的低度法制化現狀 (Jones & Jenne, 2016: 214-219)，難以有效調解區域政治安全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印太有效多邊合作仍以雙邊機制為主，連政治敏感度較低的經濟合作都難以形成多邊合作機制 (Choi, 2012: 31-34)，僅存的多邊機制也多為僅針對特定議題的功能性組織，例如東協防長會議、東協區域論壇、東亞高峰會等組織各自因為不同目的而成立，但彼此之間卻功能重複 (Baviera, 2012: 126-127)，造成印太多邊安全機制疊床架屋的現狀，空有許多安全機制但卻無法發揮促進區域安全合作的效果。

上述顯示區域內國家具有共同背景及威脅認知是安全機制有效運作的關鍵，印太國家之間本身沒有共同歷史、文化將彼此連結，後續亦無共同威脅作為各國之間團結的目標，且各主權爭端性質多元，訴諸國際解決問題的意願也不同，皆讓印太多邊安全機制難產，未來恐須透由促進區域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交流，深化彼此之間的連結，累積形成共同體的互信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先形成經濟、社會領域的多邊機制，再進而擴充至政治、安全領域。

### 參、國家內部因素

由於印太國家之間貧富差距大，多數國家缺乏資源處理國內事務以外的問題也是印太安全機制難產的原因之一，例如越南、菲律賓等國軍事能力的不足，導致其難以參與共同演訓，反而著重補強自身裝備 (Grossman eds., 2019: 348-349)，

無力參與調解區域事務。與此同時，東協成員國中的軍政府國家忙於處理國內叛亂及犯罪問題，相繼意圖利用多邊機制協助自身解決執政難題（Baviera, 2012: 148），而非真正聚焦於解決區域安全議題。

全球化也使印太國家面臨更多挑戰，隨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社會連結逐步深化，更衍生海洋資源分配、跨國犯罪、偷渡、環境污染、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毒品氾濫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迫使許多國家將參與區域合作機制的重點放在解決上述問題，無法聚焦於軍事安全議題（朱安南，2005：129-134）。其中東協區域論壇以人道救援及災害援助為信心建立措施重點，東協防長會議也以處理天災、恐攻、氣候變遷、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為其成立宗旨，並以處理上述問題為目的舉辦跨國演習，無暇顧及其他國際安全議題（Zimmerman, 2014: 6-14）。

此外，印太國家中部分非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多著眼於如何鞏固國內政權，且害怕因讓渡過多主權而放鬆自身對國內控制，故較堅持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願讓渡太多主權，導致東協區域安全機制淪為互相鞏固既得利益的交易，藉以強化國內統治正當性（Roberts, 2012: 11-19; Jones & Jenne, 2016: 217），而非有心要發揮多邊安全機制的功能。上述反映印太國家之間的高政治領域合作反而因為會牽涉到國家生存根本，故該等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多不願釋出主權，也無多餘心力或資源投入區域安全事務，導致建立多邊安全機制如同「在空氣中建造城堡」（He & Feng, 2020: 163），並非印太國家有意願優先處理的問題，即便有意願也未必有能力及資源去支持區域安全機制的建立。

針對民主國家的部分，即便擁有人民利用選票所賦予的正當性，各部門間的官僚本位主義也時常會阻礙區域安全機制發揮功能，常見例子包括軍方代表無法討論政治問題、無權處理政治分歧，且部分外交系統亦不樂見其他部門與其爭搶外交上的功勞，例如日本外務省不希望美日安保協定升級，甚至兩度阻撓首相的安全倡議之推行、加拿大也不樂見加國國防部參與香格里拉論壇（Baviera, 2012:

128)，反映即使在民主國家中，也會有內部阻力阻擋區域安全機制發展之情形，而非僅存在於非民主國家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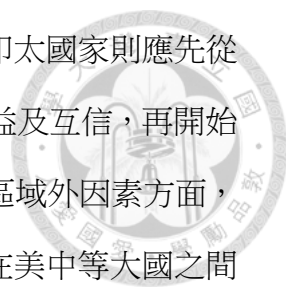
最後，個別國家的傳統文化因素在阻礙多邊安全機制形成也扮演一定角色，且不限於民主或非民主國家，例如印度、越南所堅持的不結盟、三不外交政策，以及其對俄國軍事裝備之依賴（Grossman eds., 2019: 254-255），導致上述國家基於維護其立國原則及軍事戰略，不願在多邊安全機制中投入太多心力，進而妨礙多邊安全機制之形成。

上述顯示國家實力及內部穩定也是區域安全機制成功的關鍵，印太國家若將重心聚焦於內部穩定，勢必無暇顧及國際議題，更不利於多邊機制之形成。與此同時，多邊安全機制需要成員國堅定參與意願及資源投入方能有效運作，若國家內部不具備成熟經濟條件，則區域安全機制亦難有約束力。未來隨各國經濟發展程度提升，勢必將有更多資源妥善處理內部經濟、社會問題，進而有更穩定環境、更多資源處理跨國安全議題。

## 肆、小結

總結而言，印太曾以各種機制及倡議試圖緩解區域內國家之間的威脅意識，但仍因各種因素無法發揮預期效果，進而導致印太軍備競賽情形逐年惡化。綜合學者間的看法，大致可區分為區域外因素、區域體制因素、國家內部因素來解釋印太多邊政治與安全機制無法有效發揮的原因。國家本身並無意願或能力去建立有效集體安全機制，區域國家間也沒有共同文化、歷史背景有利於建立區域安全機制，加上區域外國家的地緣政治博弈及阻撓，尤其習近平上任後中共日益強硬的對外作為，且消極參與印太多邊安全機制，使該等機制顯得零散、疊床架屋、不團結，無法發揮應有效果。

對此，學界分別針對上述三種因素提出漸進式解方，國家內部部分須著重在提升區域內國家經濟能力，拉近與其他國家之間差距，方能建立跨國軍事合作之



基礎，以及減緩執政者對政權不穩之擔憂。在區域體制方面，印太國家則應先從共同利益相近國家、處理經濟社會問題開始，逐步累積共同利益及互信，再開始在政治安全領域進行整合，並擴大至區域其他國家。最後，在區域外因素方面，中共應積極參與印太安全機制發展，以消除各國對中疑慮，並在美中等大國之間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加強對話、增加軍費支出透明性，緩解彼此之間的不信任，進而使雙方都不會藉由拉攏其他國家壯大聲勢，利用區域組織成為擴大自身影響力之平台，俾創造有利於形成集體安全機制之條件。若上述目標得以達成，則可降低印太國家對彼此的威脅意識，進而減少軍備競賽及衝突發生的機率。

# 第五章 結論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及共軍軍力增長即受到各方關注，國際擔憂中共崛起會否促使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進而在東亞爆發爭霸戰，尤其 2012 年習近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加劇印太國家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在上述背景下，鑒於印太區域是安倍晉三於 2007 年所提出的新概念，且過往文獻較少針對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或國防預算以外的指標進行分析，故本研究旨在釐清與中共具有領土主權爭議的 6 個國家於 2012 年至 2021 年間，是否在國防預算、武器數量及質量增長等方面，存在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現象，以提供各國制定國防、外交政策參考，並據此提出未來研究建議與精進方向。

## 第一節 研究成果與發現

本節將依照前述三章研究結果，回答第一章所羅列出的研究問題，包含當前中共軍力快速現代化情形為何、印太 6 國對中共的威脅認知是否明顯上升、印太各國軍備是否有相應出現異常增速情形、印太安全機制成效為何等，並得出結論如下。

### 壹、共軍軍力出現對外攻擊傾向的全方位異常快速增長

共軍 2012 年以來的軍備快速增長呈現全方位、大型化、遠距打擊化等特徵，除 2013 年的空軍外，4 個軍種在 2012 至 2021 年間都有至少兩種武器裝備處於異常快速增長狀態，且上述武器裝備都有明顯對外攻擊傾向、更加著重對外投射能力，反映共軍對外更加主動強勢，對區域國家安全威脅更大。

## 貳、印太 6 國普遍負面看待共軍現代化且敵意螺旋逐年惡化

面對共軍軍力快速增長及中共在東海、南海、台海、印中邊境等區域的日益強勢作為，各國對共軍威脅認知也明顯逐年升高。本研究中的印太 6 國 2013 至 2021 年間都能找到明確證據證明對中共存在威脅認知，部分國家甚至將中共視為長期威脅，一致負面看待共軍現代化。台灣、澳大利亞等國則明顯自 2016 年起因與中共關係惡化而陷入敵意螺旋，對中共威脅意識轉趨強烈，進而使軍備競賽情形更加惡化。

## 參、印太 6 國皆存在與中共軍備競賽現象尤以海軍最嚴重

面對上述安全威脅，印太 6 國分別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出現明確軍備競賽現象。日本海軍在 2012 至 2021 年間每年都有明顯軍備競賽情形，2019 年後則擴大成三軍都存在異常快速增長跡象。台灣自 2017 年起大量採購攻擊性武器，並加速推動國造機艦計畫，2018 年後更在國防預算及空軍領域出現快速增長及大量升級情形。印度海軍及陸軍除 2018 年外，每年都至少有一項裝備出現快速增長情形，明顯是為應對共軍在印度洋及印中邊境的威脅。澳大利亞 2016 年起每年至少有兩個軍種出現快速增長跡象，且國防預算幾乎每年都有異常快速增長情形，與 2016 年前判若兩國。越南除 2015 年外，每年國防預算都有超過 4% 的快速成長現象，且海軍 2014 至 2020 年間每年都有異常快速增長情形，凸顯共軍對其在南海方向的威脅。菲律賓除 2014、2018 年外，也每年在國防預算上出現異常快速增長情形，2017 年後的大部分年分更在至少兩個軍種出現快速增長現象，尤其 2012 年以來海空軍的飛彈化，更是跨世代的大幅度升級，明顯是為了應對共軍在南海的威脅。

整體來說，相較 2016 年以前最多僅一個軍種有 4 個國家同時出現異常增長，2016 年後反而出現惡化趨勢。除了 2019 年外，每年都至少兩個軍種有 4 個國家出現異常快速成長情形（詳如表 5-1 黃底標示部分），尤其海軍軍備競賽最嚴重，

2014 至 2021 年間海軍每年至少有 4 國同時出現軍備異常快速增長情形，其中 2015 至 2017 年間及 2019 年更是 5 國同時出現（紅字標示部分）。此外，國防預算成長率在 2016 至 2021 年間每年也都同時有 4 國以上出現異常增長情形。

鑒於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陸續在南海、東海、台海、印中邊境等方向有更強勢作為，且各國需要時間進行「行動－反應」，再加上各國增加的武器都是與反制共軍威脅有關的裝備，上述軍備增長情形凸顯印太 6 國確實有因共軍增長而出現對應的軍備競賽現象。

#### **肆、印太 6 國皆強化對外軍事合作且不受經濟成長趨緩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爆發後，除台灣以外的各國經濟發展都受到重大負面影響，卻未影響各國軍備發展意願，在特定領域的武器裝備上甚至出現更快增長現象，充分印證各國軍備發展並非正常現代化，而是為因應特定威脅的軍備競賽行為。與此同時，本研究中的 6 國自 2012 年以來都跳脫以往僅與特定國家建立軍事合作關係的架構，並積極強化與其他印太國家在高層對話、聯合軍演、裝備供應、後勤補給等方面的軍事合作關係，以增強抵禦共軍威脅的能力。

#### **伍、集體安全機制未能阻止軍備競賽惡化**

印太國家雖然嘗試透由以東協為主的多邊架構，建立如歐安組織的集體安全機制，但冷戰結束迄今仍因美中大國博弈、各國國家利益及能力的差異、亞洲人共識決及不干涉內政的文化等而一事無成。上述大國博弈及各國在利益、文化等方面的歧異皆不易在短期之內解決，各國亦將持續加強合縱連橫，對抗日益強勢的中共。



表 5-1：印太軍備競賽指數

年度	領域	中共	日本	台灣	印度	澳國	越南	菲律賓
2013	軍費	有					有	有
	空軍	1			2			
	海軍	3	1		2			
	陸軍	3		2	1	1		
2014	軍費	有			有		有	
	空軍	2		1	1			
	海軍	3	1	1	1		1	
	陸軍	2		2	1			2
2015	軍費	有						有
	空軍	2		1	1			
	海軍	2	1	1	2	1	1	
	陸軍	2		2	1			1
2016	軍費		有		有	有	有	有
	空軍	3		1	1	1	1	
	海軍	2	1	1	1	1	1	
	陸軍	2		2	1	1		1
2017	軍費	有		有		有	有	有
	空軍	2				1	1	1
	海軍	3	1		1	1	1	1
	陸軍	3		2	2	1		1
2018	軍費	有		有	有	有	有	
	空軍	2	1	1		2		2
	海軍	4	1			2	1	1
	陸軍	3			1	1		
2019	軍費	有			有		有	有
	空軍	2	1	1		2		
	海軍	2	3	1	1	1	1	
	陸軍	2	1	1	2			
2020	軍費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空軍	3	1	1		1		
	海軍	3	3		1		1	1
	陸軍	2	1	1	1	1	1	2
2021	軍費	有		有		有	有	有
	空軍	2	1	1		1		1
	海軍	3	2		2	2		1
	陸軍	2	1	1	2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備註：表中數字代表異常快速增長的武器項目數；黃底表示至少有 4 國同時出現異常快速成長情形；紅字表示至少有 5 國同時出現異常快速成長情形。

##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撰寫過程中仍面臨部分限制，並發現未來值得深入探討或可精進之處，故提出下述研究建議，以做為未來印太軍備競賽相關研究之參考。

### 壹、俄烏戰爭後應有更多印太軍備競賽相關研究

本研究只是針對印太 6 國的三軍主要裝備進行分析，但俄烏戰爭自 2022 年 2 月爆發後，加劇印太國家對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的擔憂，相繼藉強化自身軍力方式因應共軍威脅。尤其是中共 20 大報告中提及要「如期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加快把人民軍隊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楊安，2022），以及中俄間加強軍事合作之際，造成印太多國陷入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然印太仍有許多國家尚未被納入印太軍備競賽研究範圍，且俄烏戰爭後各國相繼發展無人載具，近年各國飛彈發展數量亦相當可觀，故若能將更多國家、武器裝備納入統計，則可能得以看出更明顯的軍備競賽跡象。

### 貳、軍備競賽須有更明確、一致定義

雖然本文以每年成長超過 4% 做為異常快速增長的指標，但該指標只是部分學者所提出的定義，尚未在學界形成共識，多數學者則未提出明確定義。再者，當前研究仍以國防預算做為判定是否存在軍備競賽的標準，但日本、台灣等國軍費快速增長跡象並不明顯，卻在特定武器領域上有快速增長情形，若單從國防預算數據，無從找出軍備競賽證據。因此，後續研究若能制定涵蓋國防預算及武器裝備增長的一致定義，或許能更精確觀察、追蹤變化。

### 參、軍備質量增長數據須納入統計範圍

由於當前新型武器性能更好、價格更高、採購數量更低，不能只從數量變化

做為軍備競賽的唯一衡量指標，例如 1 架第五代戰鬥機性能可以抵過數架第四代戰鬥機，整體數量減少不代表不存在軍備競賽情形，故可依不同武器攻擊、防禦、機動性等數據變化，衡量是否出現異常快速增長現象。然而，相較國際主要軍事年鑑對各國武器裝備數量都有詳細統計，當前武器裝備質量增長的相關數據仍散落在各網站，缺乏數據化統計，未來若能由國際知名軍事年鑑針對全球武器裝備的質量增長進行追蹤統計，則更有利於後續研究者從上述武器質量變化看出軍備競賽跡象。

#### **肆、經濟發展及軍事外交對軍備發展影響可建立具體指標**

面對大國軍事威脅，小國經濟體規模及稅收有限，時常只能以合縱連橫方式對抗大國威脅。在衡量經濟發展對軍備增長影響時，目前仍以 GDP 增長率為主，但一國政府稅收、赤字等數據變化反而更能影響各國發展軍備意願，而理察森於 1960 年代所制定的工業化程度、人口等指標又未能符合現代所需。與此同時，與外國軍事合作也不再侷限於是否簽定共同防禦條約或駐軍數量，聯合軍演、高層對話、武器裝備供應等指標亦可衡量各國拓展軍事外交情形，並有助於小國對抗大國威脅。因此，若能在經濟數據及對外軍事合作部分建立具體、可量化的指標及公式，則更能精確反映一國軍備競賽的實際情況。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日本防衛省，2012-2021，《2012-2021 日本的防衛：防衛白皮書》，東京：防衛省。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8/0822/c419481-30243512.html>，2018/8/22。

中國南海研究院，2020，〈首屆「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在海口舉行〉，

[http://www.nanhai.org.cn/news\\_c/1255/35/2.html](http://www.nanhai.org.cn/news_c/1255/35/2.html)，2020/11/7。

中國南海研究院，2021，〈2021 年「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在三亞舉行〉，

[http://www.nanhai.org.cn/news\\_c/1308/37/2.html](http://www.nanhai.org.cn/news_c/1308/37/2.html)，2021/12/9。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2021a，〈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中共人大網站，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1/ec50f62e31a6434bb6682d435a906045.shtml>，2021/1/22。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2021b，〈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共人大

網站，<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9dfede4d82aa4fc1ae8ca22e987e025b.shtml>，2021/4/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2019，〈海峽兩岸旅游交流協會關於暫停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游試點的公告〉，中共文旅部網站，

[https://www.mct.gov.cn/gtb/index.jsp?url=https://www.mct.gov.cn/whzx/ggtz/201907/t20190731\\_845439.htm](https://www.mct.gov.cn/gtb/index.jsp?url=https://www.mct.gov.cn/whzx/ggtz/201907/t20190731_845439.htm)，2019/7/3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聲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www.gov.cn/jrzq/2013-11/23/content\\_2533099.htm](http://www.gov.cn/jrzq/2013-11/23/content_2533099.htm)，2013/11/2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習近平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8.htm](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8.htm)，2017/10/1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3/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應菲律賓共和國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中共外交部網站，

[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201607/t20160712\\_8521047.htm](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201607/t20160712_8521047.htm)，2016/7/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20，〈民政部關於國務院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設立市轄區的公告〉，中共民政部網站，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2004/20200400026955.shtml>，2020/4/18。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21a，〈海關總署動植物檢疫司關於暫停臺灣菠蘿輸入大陸的通知〉，中共海關總署網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3688556zwgk/index.html>，2021/2/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21b，〈海關總署動植物檢疫司關於暫停臺灣番荔枝和蓮霧輸入大陸的通知〉，中共海關總署網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3892452/index.html>，2021/9/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共國防部網站，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2015/5/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7，〈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中共國防部網站，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7-01/11/content\\_476972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7-01/11/content_4769725.htm)，2017/1/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共國防部網站，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2019/7/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2010年中國的國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883535/883535.htm>，2011/3/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http://www.scio.gov.cn/tt/Document/1222670/1222670.htm>，2012/9/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http://www.gov.cn/zhengce/2013-04/16/content\\_2618550.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3-04/16/content_2618550.htm)，2013/4/16。

中華民國國防部編纂小組，2013、2015、2017、2019、2021，《中華民國102、104、106、108、110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

世界銀行，2012-2021，〈GDP增長率（年百分比）- China〉，世界銀行網站，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CN>，2022/7/31。

王毅，2022，〈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守護世界和平安寧〉，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24/c64387-32406880.html>，2022/4/24。

王緝思，2016，〈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目標、條件與構想〉，《國際安全研究》，2016(1)：4-12。

史書華、辜樹仁，2019，〈最危險的海峽：共機為何轉向台灣西南角？〉，天下雜誌，

<https://web.cw.com.tw/taiwan-strait-2021/index.html>，2021/10/27。

朱安南，2005，《東協區域安全機制的組建與發展－建構主義觀點》，台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朱鋒，2007a，〈六方會談的制度建設與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現代國際關係》，2007(3)：1-8。



朱鋒，2007b，〈六方會談與朝鮮棄核：多邊主義為什麼能發揮作用〉，《國際政治研究》，2007(4)：157-173。

朱鋒，2018，〈中日韓三國峰會重啟：歷史在呼喚什麼〉，《世界知識》，2018(10)：28-29。

伍逸豪，2021，〈習近平「審判台獨」出招，蔡英文「兩國關係」險棋〉，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44/5810317>，2021/10/12。

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編輯群，2016，〈北國戰神現印度：印國防部宣布加購 464 輛 T-90MS〉，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https://www.dtmdatabase.com/News.aspx?id=161>，2016/11/10。

向凌，2021，〈戰爭感迫近：五國 34 艦聯合軍演守護印太〉，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SDF-led-Annuaalex-2021-who-and-whats-new-20211130/6331158.html>，2021/11/30。

吳尚書，2019，〈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不只東南亞的安全架構〉，想想論壇，<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8006>，2019/12/11。

吳峻愷，2020，〈日澳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對印太區域和平貢獻之研析〉，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tw/News\\_detail/3277](https://indsr.org.tw/tw/News_detail/3277)，2020/12/10。

李宗憲，2019，〈杜特爾特春節致辭再談菲中關係：企圖扭轉民間反中情緒〉，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7153850>，2019/2/7。

李忠謙，2015，〈讓你看懂「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安保法案 Q&A〉，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65824>，2015/9/19。

李思平，2018，〈澳洲新一代戰鬥偵查車出爐：火力和裝甲都很可怕的拳師犬 CRV〉，尖端科技雜誌社，<https://www.dtmdatabase.com/News.aspx?id=713>，2018/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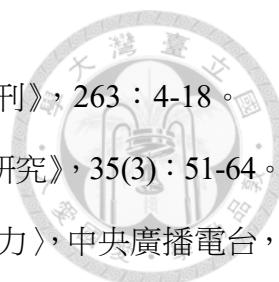
李毓峰，2018，〈淺析南海行為準則之進展與前景〉，《歐亞研究》，2：125-133。

李靖棠，2019，〈澳洲加入英美 AUKUS 研發計畫，耗資 1.8 兆採購 8 艘核子潛艦〉，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30520](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30520)，2021/11/22。



- 李澄欣，2022，〈拜登四度表態防衛台灣：美國「戰略模糊」趨清晰與「零成本」嚇阻北京〉，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2977018>，2022/9/21。
- 李瓊莉，2014，〈淺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APEC 通訊》，177：7-8。
- 杜曉軍，2013，〈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劉復國，吳士存（編），《2013 年度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報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安全研究中心，頁 146-162。
- 呂嘉鴻，2022，〈中國宣稱台灣海峽非國際水域—美中台角力是否進入「深水區」〉，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1822601>，2022/6/17。
- 林正義，1996，〈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35(12)：1-18。
- 林正義，2010，〈2010 年中日韓高峰會觀察〉，《戰略安全研析》，62：36-39。
- 林行健，2021，〈印澳首次 2+2 部長級對話：同意加強國防戰略合作〉，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110280.aspx>，2021/9/11。
- 林廷輝，2019，〈中國大陸與東協談判《南海行為準則》之進程與挑戰〉，《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報》，2019(8)：99-138。
- 林泰和，2017，〈日本部署 F-35 對亞太區域的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2017(2)：24-31。
- 尚國強，2020，〈德國首次公布印太政策準則：沉睡老鷹甦醒，將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232](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232)，2020/9/3。
- 邱國強，2021，〈中國通過陸地國界法，針對印度意味濃厚〉，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260079.aspx>，2021/10/26。
- 徐郁芬、楊 昊，2006，〈東亞高峰會的區域意涵：形構中的層疊型區域主義與台灣的因應策略〉，《新世紀智庫論壇》，38：86-99。
- 馬煥棟、蔣忠諺，2017，〈運用 P-3C 反潛機反制 AIP 潛艦之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51(3)：104-120。





- 孫銘鴻，2017，〈機步旅跨區增援作戰效能之研究〉，《陸軍步兵季刊》，263：4-18。
- 莫大華，1996，〈後冷戰時期東協的軍備競賽與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35(3)：51-64。
- 張子清，2020，〈杜特蒂南海仲裁態度轉向：或為緩和國內批評與壓力〉，中央廣播電台，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0431>，2020/9/24。
- 張心怡，2012，〈東亞高峰會的擴大對東亞區域整合之影響〉，《亞太研究通訊》，  
2012(10)：47-69。
- 張芮甄，2021，〈美菲宣布 2022 恢復大型軍演：將邀英國參加〉，新唐人亞太電視，  
<https://www.ntdtv.com.tw/b5/20211015/video/306981.html>，2021/10/15。
- 張詠晴，2021，〈作廢一帶一路協議－澳洲：牴觸國家政策〉，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485>，2021/4/22。
- 郭正原，2022，〈反制中國擴張野心：日本擬提前 12 式反艦飛彈改良計畫〉，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3&SerialNo=151383](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3&SerialNo=151383)，2022/8/10。
- 郭育仁，2016，〈解構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台北論壇》，2016：1-8。
- 郭宏達、何修竹、王乾恩、邱志典，2021，〈中共匿蹤戰機對我空軍之影響〉，《空軍軍  
官雙月刊》，221：55-72。
- 康世人，2019，〈拉達克劃為印度中央直轄區牽動中印敏感神經〉，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110090.aspx>，2019/8/11。
- 康世人，2020，〈邊境對峙，印度外長：中印關係 40 年來最艱難〉，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2090401.aspx>，2020/12/9。
- 陳世民，2016，〈第七屆香山論壇評析〉，《展望與探索》，14(11)：31-34。
- 陳世民，2019，〈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108(11)：15-19。
- 陳韋廷，2021，〈罕見強硬！陸砲襲菲船－杜特蒂中國東協峰會上公開譴責〉，聯合新聞  
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908965>，2021/11/22。
- 陳亮智，2017，〈美國重返亞洲對中日兩國戰略競爭的影響，2011-2016 年安全困境理論



- 的分析視野》，《歐洲研究》，47(4)：471-527。
- 陳亮智，2019，〈越南潛艦部隊與南海安全〉，《國防安全週報》，48：35-38。
- 陳政錄，2022，〈台灣海峽中線以東—陸稱軍演常態化〉，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520180>，2022/8/8。
- 陳品潔，2021，〈中俄軍艦順時針繞行日本：前所未見引日方高度關注〉，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917](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7917)，2021/10/25。
- 陳嘉生，2016，〈從軍改解析中共軍事戰略轉變〉，《中共研究》，50(1)：25-36。
- 陳鴻瑜，2009，〈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建構〉，江啟臣、洪財隆（編），《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論叢》，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頁 99-143。
- 黃艾比，2018，〈中國施壓美國航空業、駐約旦代表處，台灣從「中華民國」更名為「台北」〉，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59>，2018/04/28。
- 黃國樑，2022，〈陸運 20 載 FK-3 交貨—塞爾維亞為何捨近求遠不買俄 S400？〉，聯合新聞網，<https://vip.udn.com/vip/story/122151/6233843>，2022/04/12。
- 楊安，2022，〈習近平下令打造戰略威懾力體系 分析：中國恐加速核武擴張〉，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xi-s-work-report-revealed-beijing-s-intention-to-raise-nuclear-deterrence-20221021/6799980.html>，2022/10/22。
- 楊名豪，2006，《中共新安全觀下的朝鮮半島外交政策：以六方會談為例》，台北：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明珠，2021，〈日擬擴充戰機運用據點防衛釣魚台列嶼等西南群島〉，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11060233.aspx>，2021/11/6。
- 楊明珠，2022a，〈澳洲防長訪日受專訪—對中國擴軍感憂慮〉，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40409.aspx>，2022/6/14。
- 楊明珠，2022b，〈日媒：日本國防預算擬大增至 5 年共約 10 兆元〉，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10080011.aspx>，2022/10/8。



萬敏婉，2022，〈台海和平成焦點！UN 大會場內外國際呼聲不斷〉，TVBS 新聞網，

<https://news.tvbs.com.tw/focus/1917120>，2022/9/26。

廖禹揚，2022，〈北韓為核武立法規定使用條件－專家憂難再促進非核化談判〉，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9090195.aspx>，2022/9/9。

廖舜右，2012，〈中日韓峰會機制之發展研析〉，《全球政治評論》，39：105-122。

蔡東杰，2007，〈東北亞安全問題與區域治理機制發展〉，《全球政治評論》，19：1-20。

蔡東杰，2011，〈南北韓關係與六方會談發展前景〉，《戰略安全研析》，71：61-67。

劉俊彬，2011，《中國的軍備擴張對東南亞國家國防支出與經濟成長之關聯性》，桃園：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德海，2010，〈陸克文亞太共同體倡議之研析〉，《國際論壇》，12(4)：15-19。

潘振綱，2007，〈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發展與中共的角色〉，《展望與探索》，5(11)：39-51。

歐貝素，2015，〈中國裁軍 30 萬兵精不在多－和平崛起或精進戰力〉，《全球防衛雜誌》，

375：70-73。

歐敬洛，2021，〈日韓關係持續惡劣，日媒：中日韓領導人峰會 2021 年不會舉行〉，

香港 01，<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700633/日韓關係持續惡劣-日媒-中日韓>

領導人峰會 2021 年不會舉行，2021/11/14。

鍾辰芳，2021，〈學者：日美對台海安全清晰表態對北京有威懾作用〉，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japan-us-clarity-on-taiwan-could-have-](https://www.voacantonese.com/a/japan-us-clarity-on-taiwan-could-have-deterrence-effect-on-beijing-20210903/6212294.html)

[deterrence-effect-on-beijing-20210903/6212294.html](https://www.voacantonese.com/a/japan-us-clarity-on-taiwan-could-have-deterrence-effect-on-beijing-20210903/6212294.html)，2021/9/3。

鍾志東，2022，〈中國軍演反將加速台海議題國際化〉，國防安全研究院即時評析，

<https://indsr.org.tw/focus?typeid=26&uid=11&pid=410>，2022/8/8。

鍾佑貞，2021，〈尼加拉瓜斷交：中華民國邦交國降至 14 國〉，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112100076.aspx>，2021/12/10。

鍾盛康，2003，《美國、中共與我國軍備關係之研究》，桃園：國防大學管理學院資源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錦隆，2019，〈南沙對峙：中國和越南爭奪萬安灘〉，中央廣播電台，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28940>，2019/7/29。

羅振瑜，2020，〈海上監偵利器—世界各國先進海上巡邏機的發展與運用〉，《海軍軍官學校季刊》，39(11)：10-25。

羅添斌，2022，〈共機去年擾台 961 架次：IDF、F-16 零附件維持費要補 7.1 億元〉，

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05770>，2022/4/26。

## 貳、西文部分

Abe, Shinzo. 2012.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In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Latest Update 27 December 2012.

ADMM. 2017. "About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ADMM-Plus)." In

<https://admm.asean.org/index.php/about-admm/about-admm-plus.html>. Latest Update 6 February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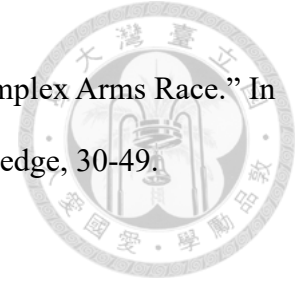
ASEAN Regional Forum. 2020. *Annual Security Outlook 2020*.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ecretariat. 2015.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APSC)*.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ecretariat. 2016.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Ball, Desmond. 1993. "Arms and Affluence: Military Acquisi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3): 79-94.

Ball, Desmond and Pantian Wattanayagorn. 1995. "A Regional Arms Rac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8(3): 147-174.



Ball, Desmond. 2010. "Arms Modernization in Asia: An Emerging Complex Arms Race." In *Global Arms Trade: A Handbook*, ed. Andrew Tan. London: Routledge, 30-49.

Bana, Sarosh. 2017. "ASEAN Navies Set Sail in 2017." In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sean-navies-2017/>. Latest Update 24 December 2017.

Baviera, Aileen S.P. 2012.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Disputes in East Asia: Comparing B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pproaches." In *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Contending Cooperation*, eds. Tow, William T. & Brendan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BBC News. 2016. "China Blow to India's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Hopes." 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6620949>. Latest Update 24 June 2016.

Bitzinger, Richard A. 2009. "A New Arms R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itim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The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4(2): 3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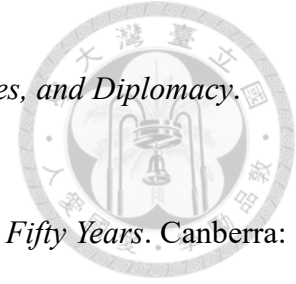
Bitzinger, Richard A. 2010. "A New Arms Race? Explaining Recent Southeast Asian Military Acquisi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2(1): 50-69.

Bitzinger, Richard A. 2016. *Arms Racing in Asia: The Naval Dimension*. Singapor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itzinger, Richard A. 2017. "Asian Arms Industries and Impact on Military Capabilities." *Defence Studies* 17(3): 295-311.

Bloomberg. 2014. "Kissinger Says Asia Is Like 19th-Century Europe on Use of Force." In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2-02/kissinger-says-asia-is-like-19th-century-europe-on-use-of-force>. Latest Update 2 February 2014.

Bochorodycz, Beata, Marcin Socha & Karol Zakowski. 2018. *Japan's Foreign Policy*



*Making: Central Government Reform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Diplomac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Brown, Gary & Laura Rayner. 2001. *Upside, Downside: ANZUS: After Fifty Years*. Canberra: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Trade Group of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Bull, Hedley. 1965.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Missile Age*. New York: Praeger.

Buzan, Barry.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Buzan, Barry. 1998. "Arms Races." In *Security Studies, A Reader*, eds. Christopher Hughes

and Yew-Meng Lai. London: Routledge.

Buzan, Barry & Gerald Segal. 1994.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36(2): 3-21.

Caballero-Anthony, Mely. 2011.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APSC)." In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ed. Ralf Emmers. London: Routledge.

Cheng, William. 2021a. "78 Protests Filed vs China Since Duterte Took Office: DFA." In

<https://news.abs-cbn.com/news/04/26/21/78-protests-filed-vs-china-since-duterte-took-office-dfa>. Latest Update 26 April 2021.

Cheng, William. 2021b. "Philippines' Top Diplomat Tells China to 'Get the F\*\*\*\* Out!'" In

<https://news.abs-cbn.com/news/05/03/21/philippines-top-diplomat-tells-china-to-get-the-f-out>. Latest Update 3 May 2021.

China Power Team of CSIS. 2015. "What Does China Really Spend On Its Military?" In

<https://chinapower.csis.org/military-spending/>. Latest Update 27 May 2021.

China Power Team of CSIS. 2018. "How Dominant is China in the Global Arms Trade?" In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global-arms-trade/>. Latest Update 27 May 2021.



- Choi, Ajin. 2012. "The Requirement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ory and Reality."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rchitecture and Beyond*, ed. T. J. Pempel. London: Routledge.
- Choi, Ajin & William T. Tow. 2012. "Bridging Alliances and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ism." In *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Contending Cooperation*, eds. William T. Tow & Brendan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 Chong, Ja-Jan. 2022. "All Dressed Up With Nowhere to Go: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Major Power Disinterest and the Limits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Multilateralism in Peril: The Uneasy Triangle of the US, China and the EU*, eds. Chien-Huei Wu, Frank Gaenssmantel & Francesco Giumelli. London: Routledge.
- Cole, Michael. 2020. "China Ends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Start of a Crisis?" In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ends-%E2%80%98median-line%E2%80%99-taiwan-strait-start-crisis-169402>. Latest Update 22 September 2020.
- Correll, Diana. 2021. "Navy, Partner Nations Launch SEACAT Exercise in Singapore." In <https://www.defensenews.com/news/your-navy/2021/08/10/navy-partner-nations-launch-seacat-exercise-in-singapore/>. Latest Update 11 August 2021.
- CSCAP. 2021. "About Us." In <http://www.cscap.org/index.php?page=about-us>.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21.
- Davis, Malcolm. 2014. "Arms Races, Security Dilemma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ast Asia Security Symposium and Conference, Queensland: Bond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Australia. 2000-2021. *Defense White Pape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Australia. 2020. *2020 Defense Strategic Update*.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2012. *Philippine Defense Transformation White Paper*. Manila: DND.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of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2009.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In <https://www.aph.gov.au/binaries/library/pubs/rp/2009-10/10rp13.pdf>. Latest Update 1 December 2009.

Diehl, Paul F. 1983. "Arms Races and Escalation: A Closer Loo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3): 205-212.

Emmers, Ralf. 2012. "The Role of the 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in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B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Contending Cooperation*, eds. William T. Tow & Brendan Taylor. London: Routledge.

Emmers, Ralf, Joseph Liow & See Seng Tan. 2010. "The East Asia Summit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010(3): 1-52.

Emmers, Ralf & See Seng Tan. 2011.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Preventive Diplomacy: Built to Fail." *Asian Security* 7(1): 44-60.

Flight International. 2012-2021. *World Air Forces*. Surrey: Flight Global Insight.

Francisco, Martinez Benavente. 2019. "RIMPAC: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Pacific?" *Revista de Marina Año 136(973)*: 56-63.

Gady, Franz-Stefan. 2015. "Vietnam's Newest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Spratlys."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6/this-is-vietnams-newest-tourist-destination-the-spratlys/>. Latest Update 6 June 2015.

Gady, Franz-Stefan. 2016. "Will Vietnam Buy a Squadron of Russian Su-35 Fighter Jets."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3/will-vietnam-buy-a-squadron-of-russian-s-35-fighter-jets/>.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16.

Galtung, Johan. 1984. "Trans-Armament: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Defe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2): 127-139.

Gan, Nectar & Brad Lendon. 2022. "China Launches Third, Most Advanced Aircraft Carrier Named Fujian." In

<https://edition.cnn.com/2022/06/17/china/china-new-aircraft-carrier-fujian-launch-intl-hnk/index.html>. Latest Update 17 June 2022.

Garamone, Jim. 2021. "Philippine President Restores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with U.S."

In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713638/philippine-president-restores-visiting-forces-agreement-with-us/>.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21.

Garrison, Spencer. 2021. "US, Royal Thai Armed Forces Complete 40th Exercise Cobra Gold."

In [https://www.army.mil/article/249675/us\\_royal\\_thai\\_armed\\_forces\\_complete\\_40th\\_exercise\\_cobra\\_gold](https://www.army.mil/article/249675/us_royal_thai_armed_forces_complete_40th_exercise_cobra_gold). Latest Update 24 August 2021.

Giovanzanti, Alessandra. 2022. "Philippines Signs Contract for 32 S-70i Black Hawks." In

<https://www.janes.com/defence-news/news-detail/philippines-signs-contract-for-32-s-70i-black-hawks>. Latest Update 22 February 2022.

Global Security. 2020. "Worldwide Intelligence Guide." I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intell/world/index.html>. Latest Update 26 Jul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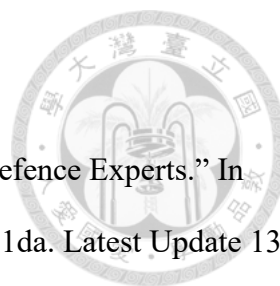
Gray, Colin S. 1972. "The Arms Race Phenomenon." *World Politics* 24(1): 39-79.

Griffiths, Emma. 2014. "Xi Jinping in Australia: Chinese President Tells MPs His Nation is Committed to Peace, But Ready to Protect its Interests." In

<https://www.abc.net.au/news/2014-11-17/xi-peace/5897680>.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4.



- Grossman, Derek, Scott Harold, Brian Harding, Jeffrey Hornung, Gregory Poling, Jeffrey Smith & Meagan Smith. 2019. *The Thickening Web of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Deepening Defense Ties Among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Gomez, Jim. 2021. "China Coast Guard Uses Water Cannon Against Philippine Boats."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china-coast-guard-uses-water-cannon-against-philippine-boats/>. Latest Update 18 November 2021.
- Han, Suk-Hee & Jian-Bo Luo. 2012. "China's Strategic Option: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Influence."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rchitecture and Beyond*, ed. T. J. Pempel. London: Routledge.
- Harding, Robin & Demetri Sevastopulo. 2020. "Biden Says US-Japan Defence Treaty Applies to Disputed Senkaku Islands." In <https://www.ft.com/content/3aec3bbd-a86d-4eef-9cf4-4b5e8f190013>. Latest Update 12 November 2020.
- Hartfiel, Robert & Brian L. Job. 2007. "Raising the Risks of War: Defense Spending Trends and Competitive Arms Processes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20(1): 1-22.
- Hayton, Bill. 2018. "South China Sea: Vietnam Scraps New Oil Project." 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43507448>. Latest Update 23 March 2018.
- He, Kai & Hui-Yun Feng. 202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6(1): 149-168.
- Hemmer, Christopher & Peter J. Katzenstein.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3): 575-607.
- Herz, John. 1959.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ille, Kathrin. 2021. "China Building New Missile Silo Site, Say US Defence Experts." In <https://www.ft.com/content/11a72ce9-d4c5-4e4b-b6d0-d6d391b471da>. Latest Update 13 August 2021.

Hoang, Viet. 2020.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A Long and Bumpy Road."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the-code-of-conduct-for-the-south-china-sea-a-long-and-bumpy-road/>. Latest Update 28 September 2020.

Huntington, Samuel P. 1958. "Arms Races: Prerequisites and Results." *Public Policy* 8(1): 41-86.

Hutt, David. 2020. "Vietnam May Soon Sue China on South China Sea." In <https://asiatimes.com/2020/05/vietnam-may-soon-sue-china-on-south-china-sea/>. Latest Update 7 May 2020.

IISS. 2012-2022.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2-2022*.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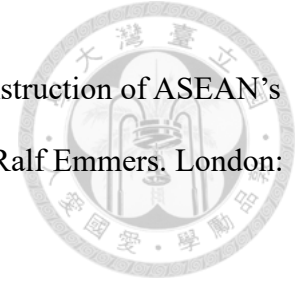
IISS Events. 2020.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In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20>. Latest Update 27 March 2018.

Ikenberry, John and Adam P. Liff. 2014.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2): 66-86.

iMedia. 2022. "H6K Mounted Ballistic Missiles Can Strike Aircraft Carriers, British Aircraft Carriers Invade, H6K Bombers Are Deployed in Place." In <https://min.news/en/military/115e1848bedde746f794de602c52b0f9.html>. Latest Update 30 July 2022.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2-202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select-country-group>. Latest Update 30 September 2022.
- Ives, Mike. 2017. "China Cancels Military Meeting with Vietnam Over Territorial Dispute." In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1/world/asia/china-vietnam-south-china-sea.html?\\_r=0](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1/world/asia/china-vietnam-south-china-sea.html?_r=0). Latest Update 21 June 2017.
- Iwama, Yoko. 2012. "What is a Liberal East Asia Policy? Japan and the DPJ Government."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rchitecture and Beyond*, ed. T. J. Pempel. London: Routledge.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 Jones, David Martin & Nicole Jenne. 2016. "Weak States' Regionalism: ASEAN and the Limit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Pacific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6: 209-240.
- Kane, Tim. 2012. "Development and US Troop Deploymen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3): 255-273.
- Kaplan, Morton.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Khalil, Shaimaa. 2020. "How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Have Hit Lowest Ebb in Decades." I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ustralia-54458638>. Latest Update 11 October 2020.
- Kim, Suk-Hi. 2020. "The Assessment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North Korean Policy." *North Korean Review* 16(2): 121-128.



- Kraft, Herman J.S. 2012. "Driv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Reconstruction of ASEAN's Identity." In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ed. Ralf Emmers. London: Routledge.
- Le Miere, Christian. 2014. "The Spectre of an Asian Arms Race." *Survival* 56(1): 139-156.
- Lee, Geun-Wook. 2012. "Between Multilateralism and Bilateralism."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rchitecture and Beyond*, ed. T. J. Pempel. London: Routledge.
- Lee, Yen-Nee. 2020. "Four Years On, Philippine President Duterte is Still Struggling to Show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o-China." In <https://www.cnbc.com/2020/09/08/philippine-president-duterte-fails-to-produce-results-from-pro-china-stance.html>. Latest Update 8 September 2020.
- Liang, Xiao-Don. 2018. "The Six-Party Talks at a Glance." In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6partytalks>.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18.
- Lim, Jina. 2020. "The Shangri-La Dialogue: Ensuring Singapore's Relevance in Defence Diplomacy." In <https://spj.hkspublications.org/2020/11/08/the-shangri-la-dialogue-ensuring-singapores-relevance-in-defence-diplomacy/>. Latest Update 8 November 2020.
- Lin, Ying Yu. 2016.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Reforms." In <http://thediplomat.com/2016/03/the-implications-of-chinas-military-reforms/>. Latest Update 7 March 2016.
- Madan, Tanvi. 2020.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Quad in Charts." In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10/05/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quad-in-charts/>. Latest Update 5 October 2020.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2002-2019. *Annual Report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New Delhi: MOD.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2005-2018. *Defense of Japan (Annual White Paper)*. Tokyo: MO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2009 & 2019. *Vietnam National Defence*. Hanoi: MOND.

MOFA of Japan. 1960.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ref/1.html>.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22.

MOFA of Japan. 2006. "Speech by Mr. Taro Aso,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minar: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Japan's Expanding Diplomatic Horizons." In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fm/aso/speech0611.html>. Latest Update 30 November 200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of Japan. 2000-2020.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Tokyo: NID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s. 2017.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or 2017-2022*. Manila: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s. 2018.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nila: NS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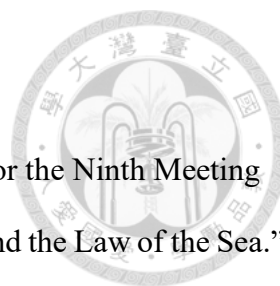
Nepomuceno, Priam. 2017. "PH Navy Ships in Thailand for ASEAN Naval Exercise." In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015769>. Latest Update 13 November 2017.

Nita, Yulinar Lutfia. 2021. *The Chang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US Decision to Join EAS*. Bachelor Degree Thesis, Faculty of Humanities, The President University, Cikarang, West Java.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Philippines. 1951.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 Philippines and USA.” In <https://www.chanrobles.com/mutualdefensetreaty.htm#MUTUAL%20DEFENSE%20TREATY>. Latest Update 20 November 2022.
- Parashar, Sachin. 2018. “Amid Instability, Vietnam President Quang Calls for Stronger Defence Ties with India.” In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amid-instability-vietnam-president-quang-calls-for-stronger-defence-ties-with-india/articleshow/63100779.cms>. Latest Update 28 February 2018.
- Patranobis, Sutirtho. 2021. “China Lodges Protest Over CDS Rawat Calling It India’s Biggest Security Threat.” In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china-lodges-protest-over-cds-rawat-calling-it-india-s-biggest-security-threat-101637847869334.html>. Latest Update 25 November 2021.
- People’s Army Newspaper. 2020. “ASEAN Navies Enhance Cooperation for a Cohesive and Responsive ASEAN.” In <https://en.qdnd.vn/military/intl-relations-and-cooperation/asean-navies-enhance-cooperation-for-a-cohesive-and-responsive-asean-523959>. Latest Update 6 November 2020.
- Perry, Nick & David Rising. 2022. “China’s Security Deal with Solomons Raises Alarm in Pacific.” In <https://apnews.com/article/business-solomon-islands-africa-guam-new-zealand-c7071aaac9c61b98b0783f663e9b921d>. Latest Update 7 April 2022.
- Pham, Linh. 2020. “ASEAN Quotes UNCLOS for South China Sea Claims in Hanoi Statement.” In <http://hanoitimes.vn/asean-quotes-unclos-for-south-china-sea-claims-in-hanoi-statement-312913.html>. Latest Update 29 June 2020.
- Rajagopalan, Rajeswari P. 2021. “The Quad Conducts Malabar Naval Exercise.”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8/the-quad-conducts-malabar-naval-exercise/>. Latest



Update 27 August 2021.

ReCAAP. 2007. “Report by the ReCAAP Information Sharing Centre for the Ninth Meeting of the UN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sultative\\_process/mar\\_sec\\_submissions/recaap.pdf](https://www.un.org/depts/los/consultative_process/mar_sec_submissions/recaap.pdf). Latest Update 30 January 2007.

Richardson, Lewis F. 1960. *Arms and Insecurity: 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Rider, Toby J., Michael G. Findley & Paul F. Diehl. 2011. “Just Part of the Game? Arms Races, Rivalry, an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1): 85-100.

Roberts, Christopher B. 2012. “State Weakness and Political Values: Ramifications and the ASEAN Community.” In *ASEA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 ed. Ralf Emmers. London: Routledge.

Robles, Alan. 2021. “Philippines Plans South China Sea Logistics Hub, as Beijing Accused of Increasing Boats.” In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33239/philippines-plans-south-china-sea-logistics-hub-beijing-accused>. Latest Update 12 May 2021.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2022a.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In <https://milex.sipri.org/sipri>. Latest Update 20 November 2022.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2-2022b. *SIPRI Yearbook*. Stockholm: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2c.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1*. Stockholm: SIPRI.

Storey, Ian. 2013. “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olitical Science* 65(2): 135-156.





Strangio, Sebastian. 2022. "US to Spend \$66 Million to Upgrade Philippine Security Facilities."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us-to-spend-66-million-to-upgrade-philippine-security-facilities/>. Latest Update 16 November 2022.

Suh, Jae-Jung. 2009. "Allied to Race?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rms Race." *Asian Perspective* 33(4): 101-127.

Suh, Jae-Jung. 2017.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THAAD, Japan's Proactive Peace and the Arms Race in Northeast Asi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15(9): 1-9.

Sukma, Rizal. 2012. "The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APSC):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the R2P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25(1): 135-152.

Takenaka, Kiyoshi. 2014. "Abe Sees World War One Echoes in Japan-China Tensions."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china-idUSBREA0M08G20140123>. Latest Update 23 January 2014.

Takenaka, Kiyoshi. 2015. "Philippine's Aquino Revive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Nazi Germany."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philippines-idUSKBN0OJ0OY20150603>. Latest Update 3 June 2015.

Tan, Andrew T.H. 2006. *Southeast Asia: Threat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Tan, Andrew T.H. 2011. *Security Strategi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Front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Tan, Andrew T.H. 2014. *The Arms Rac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Tan, Andrew T.H. 2015. *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Tan, See Sang. 2020. "Is ASEAN Finally Getting Multilateralism Right? From ARF to ADMM+." *Asian Studies Review* 44(1): 28-43.

- 
- Taylor, Brendan. 2011. “The Shangri-La Dialogue: Thriving But Not Surviving.” In *From 'Boots' to 'Brogues': The Rise of Defenc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eds. Bhubhinder Singh & See Seng Tan.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Till, Geoffrey. 2012. *Asia's Naval Expansion, An Arms Race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 Till, Geoffrey. 2013. “What Arms Race? Why Asia isn't Europe 1913.”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3/02/what-arms-race-why-asia-isnt-europe-1913/>. Latest Update 15 February 2013.
- Till, Geoffrey & Ristian A. Supriyanto. 2018. *Naval Modernis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Small and Medium Nav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Torode, Greg. 2016. “Vietnam Moves New Rocket Launchers into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chinasea-vietnam-idUSKCN10K2NE>. Latest Update 10 August 2016.
- Tossini, J. Vitor. 2020. “The Five Eyes - The Intelligence Alliance of the Anglosphere.” In <https://ukdefencejournal.org.uk/the-five-eyes-the-intelligence-alliance-of-the-anglosphere/>. Latest Update 14 April 2020.
- Tow, William T. 2019.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32(2): 232-244.
- United States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2012-2022. “US Foreign Military Sales.” In <https://www.dsca.mil/press-media/major-arms-sales>. Latest Update 20 November 2022.
-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Manila. 2021. “AFP, U.S. Military Hold Balikatan Exercise Under Strict Health Protocol.” In <https://ph.usembassy.gov/afp-us-military-hold-balikatan-exercise-under-strict-health-protocol/>. Latest Update 12 April 2021.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2021a. *Annual Defense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b.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Vavasseur, Xavier. 2021a. “China Commissions a Type 055 DDG, a Type 075 LHD and a Type 094 SSBN In a Single Day.” In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1/04/china-commissions-a-type-055-ddg-a-type-075-lhd-and-a-type-094-ssbn-in-a-single-day/>.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21.

Vavasseur, Xavier. 2021b. “China’s Future Carrier Airwing: New Stealth Fighter and AWACS Spotted In Flight.” In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1/10/chinas-future-carrier-airwing-new-stealth-fighter-and-awacs-spotted-in-flight/>. Latest Update 29 October 2021.

Wallace, Michael D. 1979. “Arms Races and Escalation: Some New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3(1): 3-16.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1979. *Anarchic Orders and Balances of Pow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White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2021a.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Latest Update 24 September 2021.

White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2021b.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pokesperson Emily Horne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Call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rmogenes Esperon of the Philippines.”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31/statement->



by-national-security-council-spokesperson-emily-horne-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call-with-national-security-advisor-hermogenes-esperon-of-the-philippines/. Latest Update 31 March 2021.

Williams, Brad. 2015. "Japan's Defence: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East*, ed. Andrew 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Yu, Tsung-Chi. 2003. "The Impact of US-China Relations on Taiwan's Military Spending, 1966-1992: An Analytical Error Collection Model." *Issues and Studies* 39(2): 145-187.

Zhu, Feng. 2009. "An Emerging Trend in East Asia: Military Budget Increases and Their Impact." *Asian Perspective* 33(4): 17-45.

Zimmerman, Erin. 2014.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s a Catalyst."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10(2): 150-165.